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邮发代号：82-507

ISSN 11-2617

# 炎黄春秋



## 甲申350年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文

### 邓小平

### 与三峡工程

# 3

###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 “我的路在中国”

# 94

总第24期





林则徐塑像

# 林则徐 生家鄉的 遺迹



林则徐的出生地林家支祠



林则徐墓

# 遺迹



西湖观在堂



祠堂花厅的陈列室

## 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功罪录

陈诚、何应钦、张治中……被称为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期间有的功勋卓著，有的隔风而逃，有的洁身自好，有的腐化堕落，……他们经历不同，性格迥异，在全民族抗战的壮烈舞台上，各自演出了不同的角色，读来惊心动魄。

## 力挽狂澜

——记“文革”时期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作者穆欣，是“文革”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后来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他目睹了周恩来与“四人帮”斗争的种种场面，……

##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荒唐的岁月，荒唐的景象，“文革”期间，大字报铺天盖地，形形色色的红卫兵小报铺天盖地而来，文章对种种畸形的现象有生动的描述，又对这种种现象有深刻的分析，发人思索。

##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

田家英，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多年，卓有才华，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他喜欢写诗词，与毛主席有密切的诗词之交，并收集有大量的毛主席手迹。本文对田家英与毛泽东诗词之交有十分翔实、动人的叙述。

## 韩美林说：

### “我的路在中国”

韩美林，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艺术大家。他从十二岁参加革命以来，历经坎坷磨难，然而他锲而不舍，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他对国家对民族一往情深，他说：“我始终坚信，我的路在中国。”

# 扉页导读

# 编读往来

刊物也要有自己的“个性”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个性”。一本刊物也要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唯其如此，它才能在百花齐放的刊物中呈现自己的风采，从而赢得读者的喜爱。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位朋友送我几期《炎黄春秋》杂志，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没想到一读却引了我很大兴趣。这本杂志内容充实，涉猎面广，文字生动，每期都有一些反映我国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人文风貌，而又鲜为人知的人和事的文章，真实具体，力求还事物本来的面目。并且还配有珍贵的照片或手稿，颇能引人入胜。它既能帮助读者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和感性认识，又能满足读者日益增涨的求知欲望。我认为，这一点在目前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令人无所适从的报刊市场中，显得尤为可贵。对于那些内容空洞低下，趣味不健康，甚至以编造事实来招徕读者的报刊，无疑是一种抵制。广大读者真正喜爱的还是这些有益于精神文明建设，能提高人们思想境界，又有审美情趣的有保存价值的刊物。

《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刊物，它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从已出版的刊物来看也是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但美中不足的是，个性还不突出，也不够鲜明。比如，封面和版式的设计，就与时下许多刊物差不多，属于分不出你我的“行货”。此外，在照片与插图的选择和安排，以及文风上，都希望能够标新立异，大胆地突出《炎黄春秋》自家的风格面貌。

北京读者 马友

马友同志的意见有一定代表性，从1993年第1期开始，我们已对封面设计做了改进。从内容到形式，大家对刊物还有什么意见，欢迎写信告诉我们。

——编者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乔木  
**特邀编委:**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张 揆 李 庄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碧 李 常 温济泽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 社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常务)  
           宋文茂  
           丁洪章  
**总编辑:** 洪 炉  
**总经理:** 徐 孔  
**副总编:** 刘家驹 社卫东  
  
**理事长:** 社导正  
**副理事长:** 贝兆汉 李广尧  
**理 事:** 白亚南 蔡道峰  
           林春露  
**秘书长:** 徐 孔  
  
**版式设计:** 石福生  
**责任校对:** 尉颖颖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770  
**社 址:**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北京图书馆分馆内  
**邮 码:** 100802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  
**总发行处:** 北京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出版日期:** 每月20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编辑部电话:** 601.6633-227  
**定价:** 3.20元

信息窗	文荟园	古镜台	时代潮	殒星篇	求实篇	人海潮
⑧〇 「炎黄春秋杯」有奖征联评选揭晓	⑦9 王莽热衷科学实验 ..... 石林 翟书忠	⑧0 蒙奸德王皇帝梦的破灭 ..... 李 平	⑦2 税收，最长与最短的思考 ..... 刘伯正 傅燕新	⑥4 将军作战在狱中 ..... 吴 越	⑤5 力挽狂澜 ——记「文革」时期周恩来 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 穆 欣	②2 韩美林说：「我的路在中国」 ..... 李南友

# 目 录

春 秋 笔	英 杰 篇	特 稿
<p>⑤⑩ 血溅居士林——孙传芳之死……………黄国平</p> <p>④⑩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古阳木</p> <p>③⑧ 一九四九·南京江面的壮举……………杨肇林</p> <p>②⑥ 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功罪录……………尹家民</p>	<p>②⑩ 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曾自 曹应旺</p> <p>①④ 邓小平与三峡工程……………卢江林等</p>	<p>④ 甲申三百五十年……………商 传</p> <p>⑩ 与领袖和革命家的第二次握手……………段苏权遗作</p>

《炎黄春秋》1994年 第4期

# 目 录



- 特稿
- 中国反腐第一案全景写真
- 英杰谱
- 叶剑英与古典诗词
- 求实篇
- 1954:《红楼梦》研究如何激起政治风波
- 春秋笔
- 罗广文将军起义纪实
- 蒋经国走完人生路
- 深入虎穴的特殊将军
- 省委书记——叛徒——烈士——?
- 同根结
- 根之源——李政道与中国
- 一位台湾老兵回乡探亲记
- 神州景
- 原始村遐想
- 文萃园
- 郁达夫埋名娶妻
- 老舍与梁实秋说相声
- 李自成在我国文学上的反映
- 古镜台
- 拒绝尊号的康熙皇帝



毛泽东和郭沫若亲切交谈

# 甲申

# 三百五十年

◎商 传

今年是甲戌年，距下一个甲申还有十年，虽然说不上是“又逢甲申”，但因为距李自成农民军推翻明朝的那个甲申整整 350 周年，也很值得纪念的。

350年前的那个甲申年，因明朝灭亡而闻名，甲申从此也便成为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代名词。倘若有兴趣去翻一翻明末清初的史籍，且不说象《甲申纪事》、《甲申传信录》、《甲申核真略》、《甲申朝事小纪》之类专书，更有数不清的如《甲申剩事》、《甲申之变》等等记史专题，而甲申二字更是到处可见。总之，人们已经习惯于将350年前那天崩地彻的时代称之为——

### 甲申之际

那一年是明朝崇祯17年(公元1644年)。

正月初一，京师北京在大风阴霾中迎来了岁首。这不祥的征兆被术士们解释为“风从乾起，主暴兵城破。”暴兵在这里指的是李自成的农民军，而不是清军，因为此时清军还远在关外，而李自成的农民军则占有全陕。不过当时他们并不知道，就在正月初一同一天，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起大顺农民政权，建元永昌，开始了对明朝统治者的最后冲击。城破未说明是何城，或是西安，或是太原，抑或即是京师北京。这附会当时形势的占卜之辞巧合了明朝的末日。

朝廷中一片惶然。二月初一早朝时居然发生了所谓“伪封”事件。一封不知所来的信函被人放到御案上，信中言词无忌，末尾竟然写道：“限三月望日至顺天会同馆暂缴。”望日即十五日。如果这“伪封”是真的话，这末句倒成了后来得到证实的预言，在时日上仅有一两天之差。

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攻抵居庸关，分守太监杜之秩、总兵唐通献关投降。十六日夜晚北京平则门(阜城门)外已经发现农民军前哨骑队，而这时候接到飞檄入关勤王的吴三桂才刚刚赶到山海关。十七日，农民军开始攻城，屯驻于城外的明京军三大营不战而降。一个名叫杨士聪的明朝官员以目击者的身份在日记中记下了北京城破前夕的狼狈之状：

午刻，西直门外有数骑突至，挥刀杀人，势欲入城。乃仓卒闭门，传兵上城，每八垛仅得一人。申刻，上令各监局掌印下至小火者俱上城，每一垛始得一人。

这些拼凑起来的守军无心为垂死的明廷作战，施放西洋大炮时里面不置铅弹，只见硝烟和震耳之声，不能伤人，并且挥手向农民军示意，待其稍退而后发。夜晚则僵卧城上，鞭起一人，他人复卧如初。崇祯皇帝已经被他的臣民们抛弃了。

三月十八日那天，天空中下着小雨，隆隆炮声不绝。崇祯帝朱由检又一次颁下了《罪己诏》，尽罢“三饷”

加派，他还想用检讨和许诺去唤起民众的支持。在同一天颁发的《亲征诏》中，他甚至应许肯于忠勇听用者“分茅昨土之赏，决不食言。”但是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下《罪己诏》作检讨，在朱由检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在他承认的所有“又朕之过也”的背后，则是“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依然是诸臣之过。因此当他询问战导之策而群臣默然时，他便叹道：“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而这点在当时又似乎为人所共识。甚至李自成农民军的檄文中亦云：“君非甚暗，孤立而场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但是这位尚非甚暗的国君竟被臣民所彻底抛弃，实在令人难解。对此后世史家多有精辟分析，郭沫若曾评价道：

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崇祯帝朱由检却是至死也未曾明白个中的道理。

午后，李自成遣降附太监杜勋入城，劝崇祯帝退位，并表示愿以农民军劲旅赴辽东，抵御清军。这是给崇祯帝的最后一次机会，他起初颌允，后又犹豫不決了，杜勋只得返回城外复命，议终未成。

傍晚，掌守彰仪门(广安门)太监曹化淳开门迎降，农民军攻入外城，开始攻打内城。守卫外城的铕炮火器转向内城施放，声震宫禁。

夜渐深，崇祯帝无法入睡，他出宫登上煤山(景山)，望见四面烽火彻天，知道大势已去。仓卒之中他曾想过出逃，并且微服率内监数十人前往朝阳、安定诸城门，但农民军攻势正盛根本无法出城，而徘徊之间，天色已渐明。崇祯帝赶回宫中时，望见正阳门城上已悬起白灯三盏，这是内城将破的信号，他彻底绝望了。当时宫中的惨状史书中记述颇详。崇祯帝先送太子及诸皇子往外戚周奎、田弘遇家，又逼迫周皇后自尽，周后自尽前批评崇祯帝道：“妾事陛下十有八年，卒不听一语，

至有今日。”崇祯帝呼左右进酒，连饮十数杯后，持剑将长平公主及袁贵妃等妃嫔砍倒。这时内城也已失陷，他亲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身边内监也仅留下王承恩一人。

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时的情景是十分狼狈的，身穿绛黄袍，披发于面，左足没有穿鞋。他在衣襟上留下的遗书中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近世史家孟森先生评论他“既不知人，又不自知”，果然如此，且至死不悟。

此时北京城德胜、朝阳、阜城、宣武、正阳诸门同时俱开，农民军进入了城中。

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头戴白毡笠，身穿蓝色缥布箭衣，乘乌骏马，率大队农民军由德胜门入城，沿街百姓焚香结彩相迎。这是明末农民起义最辉煌的时刻，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最辉煌的时刻。李自成骑马来到皇宫前，弯弓搭箭，在一片欢呼声中向承天门横额上射去。这位出身陕北的农民领袖用手中的刀箭拉开了历史上空前壮丽的一幕，但他和所有当时沉浸于兴奋和喜悦中的人们，都不曾想到，这竟然是——

### 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

在历代的农民领袖中，李自成属于那种奋战时间最久，经历最为坎坷，也是最为成熟的。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征不已。白水农民王二聚集数百饥民，王二高唱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遂入县城，闯公堂，杀张斗耀，揭竿而起。三年以后，也就是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投身于明末大起义的队伍之中。

李自成“幼曾为僧，俗名黄来僧。为姬氏牧羊奴。”后为银川驿驿卒。崇祯三年裁革驿卒，失去生计，遂率众投于义军。这经历颇类似太祖朱元璋。一个还俗的和尚创建了明朝，又由一个还俗的和尚将其推翻，这也真是历史的巧合。

从崇祯三年至十七年，这十四年间，李自成几起几落，先是被困车厢峡，再困于商洛山，又困于巴西鱼腹山中，少时仅存十馀骑，困难时几乎上吊自尽，胜利确实来之不易。但是自崇祯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三天之间便攻克京城，这军事上的突变带给农民军的除去兴奋和喜悦之外，还有过分的陶醉。这使得本应十分清醒的李自成变得头脑发昏起来。郭沫若曾用一篇生动的描写概括了农民军进城后的情况：“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

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几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抢掠民财者也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呈裹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虽然得到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

对于这种情况要负责任的首先应该是李自成，尽管史书中称：“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二十余人“如权将军刘宗敏、马岱、谷大成、李岩、李牟、牛金星、白广恩、祖光先、官抚民、梁甫、姜襄、余李、贺、田、郭、戈、王诸贼”。这都是当时人的耳闻记述，间有误传之处。李自成当时尚未登极称帝，农民军议政作风又与明帝迥异，加之李自成本人的纳人善言，在宫中旧宦官们看来，便成为诸人之与之抗衡的结论，其实李自成在这支义军中的威望是无人可以比拟的。他本是个为人宽容颇有民主作风的人。”自成少时饥困，盗主人羝羊，鞭之见血。既得志，不修布衣之怨，遇其家如故。秦人又以此异之。”这种作风用到起事后，便是宽容纳言。《明季北略》中记有一段《李岩归自成》的对话。

岩初见自成，自成礼之。

岩曰：“久钦帐下宏猷，岩恨谒见之晚。”

自成曰：“草莽无知，自惭菲德，乃承不远千里而至，益增孤陋兢惕之衷。”

岩曰：“将军恩德在人，莫不欣然鼓舞。是以谨率众数千，愿效前驱。”

自成曰：“足下龙虎鸿韬，英雄伟略，必能与孤共图义举，创业开基者也。”

遂相得甚欢。

这位李岩一直是有争议的人物，起初是争论这类知识分子参加农民革命应当如何评价，其后又有学者对李岩其人有无提出质疑。这些我们姑且不论，这中间所反映的另一个侧面则是李自成的礼贤下士。史书又有记李岩劝自成行仁义以收人心之举。

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今朝廷失败，然先世恩泽在民已久，近缘岁饥赋重，官贪吏猾，是以百姓如陷汤火，所在思乱。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扬言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



好官，仍前任事。酷虐人民者，即行斩首。一应钱粮，比原额只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服矣。”

自成悉从之。

这成为李自成在河南突然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

但是，随着义军进入北京，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自成恰恰是丢弃了这种可贵的民主作风。当李岩再次上书谏四事时，李自成即“不甚喜，既批疏后‘知道了’，竟不行。”可见李自成的失败不在他手下有数十人与之抗衡，而是他听不进下面的正确意见。

牛金星、刘宗敏这两个义军入京后的反面人物自不必去说他们。据史书记载，只有李岩、李牟是好的，他们不喜声色，部下兵马俱屯扎城外，只带家丁三四十名跟随，亦不在外生事。这其实本是农民军的优良传统，但这时却仅为二李将军属下能够执行，整个部队军纪已难维持了。

农民军初入城时，尚有军纪约束，但此时实际上已颇为混乱。襄城伯李建泰为崇祯皇帝守城督师，城破后农民军视之为敌将，对其处置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其夫人一个二十余岁年轻少妇剥去衣裤，裸体抱到马上游示，大呼此襄城伯夫人，以为取笑。这其实正是农民军中流氓无产者作风的表露。这种流氓习气在没有严格纪律的情况下很容易发展为涣散腐败。当时几十万军队驻在北京城内，将帅纷纷占据贵戚官邸，军士则分住民房，违纪事件时有发生，渐渐不能控制。

人们常常谈到农民军进入北京后迅速腐败的情形，但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甚恰当。我们很难想象，一支有严格军纪约束的庞大队伍会在一个月內腐败涂地。应该看到那原因是多方面的。

自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李自成率五百骑重入河南，义军队伍迅速扩大，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即此时先后投入农民军。这一发展虽然奠定了以后农民军胜利的基础，但其中鱼龙混杂，也难免带入一些不良风气。在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同腐败透顶的明朝廷作战过程中，这种情况尚不突出，而当革命取得胜利后，这种不良风气，便会迅速滋长起来。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朝末年腐败社会风气的影响。晚明的腐败是社会性的，从上到下，无官不贪，贿赂公行，奢靡攀比，已到了惊人程度。就以崇祯十三年为例，当年南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等地发生严重蝗旱灾害，以至草木皆尽，人相食。河南斗米三千钱，路无独行客，父子相食。豫北诸县，民死几尽，为三百年未见之奇荒。与此同时，朝中薛国观罢官一案中却显见官吏上下之贪黩。

御史史望，巡按淮扬，先后收受罚银及盐课三十余万，为人弹劾，后又查得史望勒索民于承祖万金之事。事发后，史望急携万金入京，向薛国观求解。史望后下狱瘐死，贿金尽入薛国观囊中，待到薛国观罢官离京时，重车累累，其贪黩奸利之事又为东厂侦知。这种大鱼吃小鱼，上下皆贪的情况在当时已屡见而不鲜。薛国观的罢官，其原因之一在于他曾建议保官员内戚借助军赏。武清侯李国瑞为孝定李太后兄孙，被勒助饷四十万。有人教他匿赏勿献，拆毁居第，将器物在街上拍卖，以示无有。结果招至上怒，被夺爵追勒而死。外戚人心慌慌，借皇五子病，诡称九莲菩萨孝定李太后降神显圣，责怪祯帝待外戚太薄，降灾于皇子。皇五子病死后，崇祯帝大惧，急封李国瑞七岁儿子为侯，还尽所有纳金，转而怪称罪薛国观。崇祯末年一再声称国用不足，但李自成入京后，从各库共得银三千七百万锭，金若干万。当时人称：“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括，使海内骚然，而肩輿如故，策安在也！”这样的政权又怎能长久呢？农民军进京后，转而向官员追饷，虽然出于对官员贪黩的报复，但一些将领乃至下级军官士卒亦间有营私之举，史称：“(刘崇敏)门立二磔人柱，……杀人无虚日。凡兵士掠财奸淫者，梟示甚多。”这在农民军中去恐怕是不多见的。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起义军领导人的腐败。李自成住进皇宫，一心当皇帝；牛金星此时已是“大轿门棍，洒金扇上贴内阁字，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俨然太平宰相。刘宗敏除去严刑追赃之外，已知的是强占吴三桂的爱姬陈圆圆，将本来犹豫未定的吴三桂推向了清军一边。

四月十一日，吴三桂降清的消息被证实，次日，李自成决定亲征。农民军于十三日出师，二十一日抵达山海关。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两天，农民军同吴三桂及清军进行过殊死激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战败退却。

败报传到北京，一时谣言四起，人心动摇，一些人打出“共辅太子”的旗号，明朝降官、降军纷纷逃散。

四月二十六日，李自成退回北京，无心据守，于二十九日匆匆举行登极仪式后，三十日即退出北京，继续向西，退据山陕。农民军如同昙花一现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随着清军的进逼，农民军节节败退。次年五月，李自成再由武昌、九江退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以二十八骑外出查看，遭地方团练袭击而死。也有人说，李自成未死于九宫山，而是出家于湖南石门县夹山寺，法名奉天玉和尚。但不管怎样说，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结

尾。尽管后来李自成的余部和另一支义军张献忠的部下同南明政权结合,掀起一次次抗清高潮,但那毕竟只是这幕史剧的尾声,在人们心中留下永远的遗憾。

三百年以后,甲申又轮了五个周期时,在中国大地上,仿佛又重现了三百年前甲申之祭的情形。只不过苟延残喘的不是腐败的明朝政府,而是国民党政府;带领人民争取民主和光明的不是李自成大顺农民军,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妄图吞并中国的也不再是兴起于东北的满族清政府,而是真正外来的敌人日本侵略者。历史真的在向中国人开玩笑了。

1944年1月15日,一些文化界进步人士聚集到重庆天官府四号郭沫若先生家中,商量如何纪念甲申三百周年。起初大家商量请南明史泰斗柳亚子先生开炮,写一篇带头文章,可是致信柳亚子先生后,却被婉言谢绝了。他主要考虑到自己不大能掌握唯物史观和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从研治南明史的立场出发,他认为不应将甲申作为明亡之时,到南明弘光朝廷和台湾郑氏的失败,还有几十年时间。这样一来,大家便把这“开炮”的重任寄托到郭沫若先生身上。

在当时抗日期间,史料书籍极为缺乏的情况下,郭沫若先生放下手边史剧的工作,开始收集资料,集中时间来完成这篇史学论文。他利用在友人家得到的乾隆抄本《剿闯小史》和《明史》、《明季北略》、《烈皇小识》、《甲申传信录》等有限史料,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

三月十日,初稿完成了,修改后于十六日送给董必武审阅。三天后,《新华日报》副刊上,人们见到了这篇划时代的大作——

### 《甲申三百年祭》

“甲申轮到它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郭沫若先生在文章开首这样写道:“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错误却不幸换来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潜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在郭沫若先生眼前展开的便是这一幕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从一段段史料字里行间,他看到了明朝政府的腐败,看到了那些在饥饿和死亡中挣扎的人民,看到了那些被指斥为“流寇”的农民英雄,也看到了这场天翻地彻农民革命中的种种失误以及人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在郭沫若先生笔下,那些被颠倒的历史,重又被颠倒过来。他首先批评了那“很博得后人的同情”的崇祯

皇帝,说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着错误的路径。”“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郭沫若先生引用了崇祯皇帝《罪己诏》中的“痛切”之言,然后指出:“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败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归根结底,这种腐败的根源还在于崇祯帝本人和他的那个统治集团。到崇祯帝上吊时,皇库中还积存着三千七百万锭白银,每锭皆五十两。“这样大的积余,如能为天下富家先,施发出来助赈、助饷,尽可以少下两次《罪己诏》,少减两次御膳,少撤两次天乐,也不至于闹出悲剧了。”这样腐败的政权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因此而产生的“流寇”自然都是铤而走险的饥民。起初这些乌合之众当然抵不过官兵,但他们不象官兵们那些奸淫掳掠、焚烧残杀,因此得到平民百姓的支持,也因此出现了“剿兵安民”的口号,这真是对时政的巨大讽刺。

郭沫若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阐述明末农民革命及明亡的历史,其结论引起人们深思是必然的,尤其是在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刻,更会激发起人们的联想。但正因如此,《甲申三百年祭》也就必然会触动当时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最敏感的神经。文章全文发表后第三天,《中央日报》便刊出一篇由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些思想》,对郭沫若先生和《甲申三百年祭》进行了疯狂攻击。陶文称:“有人出于一种反常心理,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这便是最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代表的思想。”“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造成了“亡国局面”。“郭沫若今天把流寇夸扬为革命,把策应欲寇,断送国家,灭亡民族的流寇,夸扬为革命,这不但是民族主义的羞辱,并且是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玷污。”将亡国的责任推到农民军身上,并非因为陶希圣等人不知明末史实。他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还在于要力图维护那个比明朝政府还要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到四月十三日《中央日报》社论中便明确说出所要“纠正”的思想,“这就是把今日革命抗战建国途中的中国,比拟于宋末或明末亡国时代的中国。”随之而后跳出来攻击郭沫若先生的那批御用文人说得更为露骨:“际此甲申三百年,特利用明亡的历史事实来作材料,而妄想以明朝来影射国民党政府。郭沫若向来是共产党的同情者,而又薄有文名,自为执行这个宣传政策的适当人物。所以郭沫若的失败主义不过是共产党的失败主义流露而已。”

对于这些攻击,郭沫若先生只以一笑置之。当时有

位朋友去看望他,对他说:“人家骂你‘为匪张目’。”话未讲完,郭沫若先生便凛然地说道:“我郭沫若就是为‘匪’张目啊!”这便是郭沫若先生的立场。正因为如此,《甲申三百年祭》在当时的解放区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四月十八日、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并加《编者按》指出:“在这篇论文里,郭先生根据确实的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始末作了对照的叙述和客观的评价——还给他们一个本来面目,郭先生虽然推翻了流俗关于李自成等的无知胡说,但是对于他的批评也是极严格的。”“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了爱国爱民族的热情,但是他究竟只是在科学地解说历史。”这篇《编者按》中还痛快淋漓地批驳了那些对马克思、恩格斯一无所知的御用文人小丑们侈言马恩的笑话。

毛泽东在当年延安干部会议上,号召大家以《甲申三百年祭》论述的农民军失败“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并且把这篇文章印成单行本,作为“整风”的参考文件。

八月下旬,周恩来托人从延安给郭沫若先生带来了《屈原》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郭沫若先生当天便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和许多延安的朋友一一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复信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也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

毛泽东根据当时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发展形势,提出以明末农民革命的教训为戒鉴,防止因骄傲自满导致革命功败垂成,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寓意却不仅如此。他不仅讲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最不喜欢听的明朝的腐败,讲到了共产党人可以引以为鉴戒的防止骄傲自满,他还更讲到了一种理想的民主政体。这也便是他在这篇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记述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军将领李岩的用心所在。

郭沫若先生之子郭汉英在回忆中谈到:“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的‘能纳人’,‘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向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

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禁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人’,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文章中不仅讲到李岩,而且讲到教李岩出狱并委身于他的红娘子。在写到李岩被牛金星所诱杀时,郭沫若先生是十分动情的,他说:“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大凡一位开国的雄略之主,在统治一固定了之后,便要屠戮功臣,这差不多是自汉以来每次改朝换代的公例。……然而对李岩们的诛戮却也未免太早了。假使李岩真有背叛举动,或拟投南明,或拟投清廷,那杀之也无可惜,但就是害害他的牛金星也不过说他不愿久居人下而已,实在是杀得没有道理。但这责任与其让李自 coming 来负,毋宁是应该让卖友的丞相牛金星来负。”“三百年了,种族的遗根幸已消除,而三百年前当事者的功罪早是应该明白判断的时候。从种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种族的罪人。而李岩的悲剧是永远值得回味的。”象郭沫若先生这样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上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同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其实还不仅仅如此,郭沫若先生还总结了李岩的悲剧同整个农民革命的关系。假使初进北京时,李自成听了李岩的建议,严格军纪,牢笼吴三桂,清军便不会那样快的入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威信,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战争转为抗清战争,清军也必无法于第二年进攻潼关,李自成也不至于陷于绝地。这便是“个人的悲剧扩大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才是真正要令人深省的。

从《甲申三百年祭》发表那时算起,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这篇划时代的历史学大作至今对我们仍有着深刻的教益。

愿大家牢记毛泽东的教导,以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论述“引为鉴戒”,使这一历史悲剧永不重演!

## 更正

1994年第一期58页第4行:“1928年至1955年间,姜道王明路线迫害……”应为1928年至1935年间……”



●段苏权遗作

## 与领袖和革命家的第二次握手

任弼时、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甘泗淇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领袖人物和革命家。他们是湘赣苏区与黔东苏区两大根据地的创建者，同时又是红六军团和红三军的创始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曾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1937年9月间，由于历史造成的变故，我在山西抗日前线与他们重逢，别而又聚，给我留下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 “开过追悼会再去抗日很有意义”

1937年8月，“七七事变”刚过，国内形势发生骤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华北，以武装斗争揭开了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序幕。这时，我因伤病还在湖南茶陵家乡养伤。此时尽管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举国上下的抗战情绪非常高涨，但在交通和信息比较闭塞的茶陵，人们对反共的白色恐怖依然心有余悸。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白天出门，夜不归宿，终日东躲西藏。

一天，我听说过去一起参加革命的严圻樟里战友谭毛苟从北边回来了，就专程前往他家了解情况。在他家住了两天，彼此谈得眉飞色舞。谭毛苟原来是红六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以后随部队长征去了西北。在途中，他因病掉队，被东北军俘虏，后来当了勤务兵。“七七事变”后，他请假回到家乡，打算不再回东北军。他还告诉我，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打垮东北军的进攻，释放

俘虏，做东北军的工作，促成“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红军现在都在陕北延安一带。

谭毛苟带来的消息，使我激动不已，启开了我久已埋藏心中找党找部队的愿望。经过他仔细盘算，我请父亲从亲戚家借得34元钱，我借了谭毛苟的准假证和军服、臂章，决定从速起程。不料父亲四处借钱，惊动了乡里，消息泄露出去，引起敌人注意。我临行那天，伪县政府派了3个持枪的士兵来拘捕，幸好我和父亲早起出门，经塔前去茶陵县城，敌人扑了空。士兵在我家到处搜查，邻居段普苟夫妇急中生智，支唔搪塞说：“他到鱼舫头上学去了吧！”就这样，士兵朝鱼舫头追去，父亲伴着我一跛一拐地走到县城。当夜，我和父亲借住在王家祠段光烈先生家，安安静静地度过一个夜晚。翌日清晨，父亲送我搭上去醴陵的公共汽车。分手时，他老人家满怀期望与我含泪告别，从此我们父子再没见面。到醴陵后，我又转车去长沙，经长沙，搭上北去的火车。

我原计划直接去延安。走到郑州，从小报上得知，八路军已开赴山西与日军作战，遂决定改路经风陵渡去太原。在火车上，沿途可见从北边来的难民、伤兵和逃兵，他们衣衫褴褛，惊慌失措，呻吟尖叫，样子很惨。我坐在北去的列车上，车厢里空空如也，而此刻南下的列车却拥挤不堪，乱作一团。

9月21日，我到了太原。下火车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地址，是在原太原市成成中学。找到地方后，因怕有误，开始没敢过去，躲在附近一条斜路上观察。办事处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里面是灰砖平房，院门口有卫兵站岗，身穿灰色军装，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开始我见到青天白日帽徽，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误闯到国民党的某个机关来了，下意识地退了300余米。后来碰到一辆人力车，便问车夫：“八路军办事处在哪儿？”车夫指指有卫兵的院子说：“就是那个门口，我带你去。”

办事处接待我的是一位参谋，他满腹狐疑地上下打量我，然后问：“你找谁？”我说：“找办事处负责同志。”他问：“你是哪个部队的？”我说：“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马上说：“正好，任弼时主任在这里，你认识他吗？”我连声说：“认识，他是我的老首长。”他说：“那你写个名字吧，我给你递进去。”参谋拿了我的名字进去，刹那间，里面传出话来：“告诉段苏权同志进来。”

我和弼时同志确实早就熟悉。1932年10月我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湘赣省委担任宣传部长时，我们就认识，他当时是中央代表、中共湘赣省委书记。那时党省委和团省委都设在江西永新县城，办公地点在一起。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去贵州与红三军会合，任弼时同志是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王震同志是副主席，我在六军团政治部担任宣传部长。

我听招呼走进办事处的院子，恰好遇见任主任，他吃惊地看着我，脸上露出异常兴奋的神态。在他的引导下，我走进一间屋子。这间屋子里有一张沙发，还有一张四方桌，显然是又办公又吃饭。我在方桌旁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弼时同志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以为你已经牺牲了，想不到你还活着。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广播中也听到，龙云同志（红18师师长）被俘，押到长沙被处决；王光澤同志（黔东独立师师长）在四川酉阳被俘，押到酉阳龙潭镇，蒋介石亲自下令处决了。唯独你在部队打散后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以为你已经被地主武装杀害了。在陕西铜川县陈炉镇红二方面军党代会上，我们悼念牺牲的同志，悼念名单中有龙云、你、王光澤等同志。听说你负伤很重，无法行走，现在是不是好了。”

我说：“其它都好了，只是踝子骨打碎了，不能恢复。另外在山洞里躲藏时缺吃少药，左脚感染化脓，冻掉三个脚趾，脚后跟又长了鸡眼，所以行走不便。”

弼时同志关切地说：“我看一看。”

我脱下鞋和袜子，弼时同志看后说：“这种情况行走太困难了……”这时外面忽然传来呜呜的防空警报声，远处天空渐有飞机的声音。弼时主任让我跟他

到外面隐蔽防空，我便跟着他走到一个巷子里。这是由两栋砖房的隔墙夹成的一条巷子，我们停下来翘首仰望，见蔚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两架中国战斗机和四架日本战斗机。中国战斗机向敌机冲去、开火，敌机盘旋后掉头追赶中国飞机，中国飞机向西南方向飞去。这是太原上空第一次中日两国空战。

我们重新回到屋里坐下，任主任点燃一支香烟，开始与我长谈。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经过百般周折，现在回到部队，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我很高兴。现在我就革命转变问题同你谈谈。过去，我们的任务是消灭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根据这个革命纲领，我们建立、巩固、扩大了中央苏区。后来又经受了长征的考验。现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所以我们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汉奸卖国贼，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发生了转变……他说，形势的转变，自然是一种极端艰苦的斗争过程，但是胜利前途的可能条件是具备的。

弼时同志最后说：“你到前方去，王震、肖克、甘泗淇同志会和你详细谈的，贺师长、关政委也会和你谈的，你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说：“没有了。遵照首长的指示，今后将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作战，报答首长对我的殷切希望。”任主任一边点头一边说：“相信。”

谈话间，桌上已摆好一盘炒鸡蛋，一碗白菜豆腐汤，一盘馒头。记得，那顿饭我一连吃了四、五个馒头。

下午3点钟，一二零师供给部派一辆卡车送军需品去三五九旅，弼时同志让我乘这辆车去三五九旅。分手时他递过一个包裹说：“陈希云同志（一二零师供给部长）送来一套军装，给你。你是开过追悼会再去抗日，很有意义！”我打开一看，是一套灰色斜纹布军装，心中立刻泛起一股暖流，这是党对我的信任啊！同时也联想起在贵州负伤时穿的也是这种军装。1934年我们在湘赣苏区突围前，在江西永新漕田、沙市伏击敌人，歼灭侯鹏飞旅，缴获了大量灰色斜纹布军装，红六军团就是穿着这种军装踏上了长征之路的。车子开动了，我坐在驾驶室内，回过头来，凝视着老首长弼时同志那慈祥的面孔，恋恋不舍地向他告别。此后，无论抗战的环境多么残酷，只要想起与弼时同志相逢，想起他的教诲，我就充满信心，去迎接新的战斗。

**“湘赣苏区我们还是要收回来的！”**

一二零师三五九旅驻在太原市东北的定襄县。我们的卡车驶出太原北门，先向忻口疾驰，经忻州去定

裹。一路上迎面不断驶来大大小小的车辆，卡车上装着行装，偶尔也有几辆黑色、红色小卧车，车内多是显贵或官太太、少爷、小姐，一幅落荒而逃的样子。路上行人稀少，偶有国民党军队向南行进，队伍泱泱拉拉，士兵衣冠不整，情绪低沉，有的倒背着枪，有的一手抱着东西，一手抓枪，还有的用枪挑着行李，象是往南撤退的模样。我此刻的心情恰与眼前情景相反，希望车子尽快到达前线，参加抗日，保卫华北。

卡车到达忻口后向右转，折向定襄县公路。这里路面狭窄，迎面来的车辆或队伍都要停住相让。入夜，我们驶进河边村，这里是阎锡山的家乡。休息了一会儿，卡车继续北驰。到东冶镇的时候，遇到一支整整齐齐的部队，他们情绪高昂，精神抖擞，有说有笑，和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我下车一打听，才知是八路军一二零师三五九旅七一七团第二营。在一位战士的引导下，我找到营长陈文彬，俩人一见面都兴奋不已。他和我同在茶陵做过共青团工作，后来他参加了湘赣少共国际团（即红十七师五十一团）。他告诉我，他的部队原想去五台，因接到命令又折返回来。陈营长后来在挺进冀中时，与日军作战，不幸殉国。

9月25日，我到了三五九旅七一七团闭部。团长刘转连也是我们在茶陵共青团工作的战友。由于战斗频繁，长途跋涉，我们有相当长时间未能见面。这次战友久别重逢，感到格外亲切。

刘团长说：“你回来让我太高兴了。对你来说，可以继续为党工作。对党和八路军来说，目前是大发展时期，尤其需要象你这样经过锻炼的干部。”刘团长告诉我，他的部队准备出忻州、崞县，从侧后打击日军，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保卫太原。

9月27日，我到达柏罗镇三五九旅旅部，见到了老首长王震旅长，他见到我特别高兴。他听了我的负伤和黔东独立师失利的汇报，表示十分同情和理解，还送给我一匹黄色小马。我们一同行军、宿营。

王旅长问：“茶陵还有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挨户团、守望队？碉堡是否还存在？”

我说：“红军长征后，国民党正规军大部分尾随追堵，一部分继续‘围剿’留下来的部分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挨户团已变成警察。在茶陵的守望队除茶乡外，都不存在了。碉堡虽在却无人看守，名为乡长办公用，其实乡长很少去。”

王旅长问：“保甲制度怎么样？”

我说：“茶陵的保长不做什么，甲长只是向碉堡报告从苏区或红军中回来人的情况。”

王旅长问：“我们留下来的部队还有多少？”

我说：“保存多少还不清楚，茶陵县委书记曾元度和县长曾云志牺牲了。茶陵县游击大队的人都牺牲了。”

王旅长问：“谭余保同志那里怎么样？”

我说：“1935年秋，我父亲住甘坳刘长仔家做小贩时，有一天半夜，湘赣省委书记、司令员兼政委谭余保带三个人来了，不期而遇。谭和我父亲都是大革命时的乡、村农协主席，一见面就谈了较长时间。谭说：‘我们听说苏权同志负伤回家了，现在伤势怎样？’父亲说：‘双脚都难以行动。’谭说：‘你告诉他好好养伤，将来好继续做革命工作。’天亮前，谭就离开了。可见部队剩下不多了。”

王旅长又问：“群众情绪怎么样？”

我说：“国民党把茶陵县苏维埃的牌子砸掉了，土地革命的果实一一被夺去，自由婚姻被拆散，小学被迫停课，夜校、文化娱乐被禁止，封建迷信复活了，群众觉得比土地革命前更苦了。乡长、土豪劣绅更凶狠，但也有温和一些的。从整个形势看，茶陵处于湘赣苏区边缘，敌人活动较猖獗，情况与其它县不大一样。例如，1931年至1933年期间是茶陵国民党乱烧乱杀的大屠杀时期。这时敌人的方针是：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漏网一个。义勇队对共产党员或政治嫌疑者可以随时随地屠杀。1933年至1934年，敌人乱杀稍缓，为清乡时期。这时敌人对共产党员或一般干部，采取“自首自新”的方针和罚金、打板子、找保人、请酒、赔罪等办法压制。1935年至1937年是敌人的善后时期。这时，敌人对重点人搜捕判刑，对一般红军人员则不太注意。群众对从苏区逃难回来或从红军中回来的人都持保护态度，无人检举。对红军中回来的更为谨慎，彼此相见，不打招呼，以避嫌疑。农民照常种田，上市买卖。对乡长、土豪劣绅的压迫、剥削则忍气吞声。失败主义阴影笼罩着茶陵人民，人们内心消极等待，唯盼红军主力回来。总而言之，茶陵的国民党势力强，红军长征后敌人更嚣张。”

### 峰回路转去延安

离开三五九旅，我骑马到了苛岚一二零师师部。这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我进去时，师里的几位首长正在研究部署根据地建设问题。肖克、甘泗淇与我一见如故，非常亲热。肖克同志把我介绍给贺龙、关向应同志。贺师长说：“你吃苦了。”我与贺师长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黔东南腰界红六军团和红三军会师大会上听他讲话。一同吃饭时，见到贺师长这样的老军长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对人又平易近人，实在令人敬佩。肖



克同志正在写类似《铁流》的小说，54年以后，《浴血罗霄》出版。肖克同志对红八军、红六军团战术思想和战斗力的提高，以及战斗作风的养成，做出了杰出贡献。

我向肖克副师长汇报了我个人的遭遇，以及黔东独立师的活动和失利经过，肖克同志指示：“现中央正在号召长征过来的同志写回忆文章，你若能将这些写出来发表，那就好了。”我说：“手头没有材料，难以准确，待后补写。”

甘泗淇主任也听取了同样的汇报。

一二零师党委听取我的汇报之后，肖克同志和甘泗淇同志还参考王震同志的信，对我的情况专门作了研究，并报告了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后来关向应政委代表师党委与我谈话，传达了师党委的决定，他说：“鉴于当前形势、任务、路线、方针和政策变化很大，所以师党委决定送你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高级队学习，你看有什么意见？”我当时非常激动，因为延安和抗大是当时革命者最向往的地方。

我说：“这是党对我的高度信任，完全拥护这一决定。感谢党对我的充分信任和无限关怀，我要在革命斗争中做出成绩，报答党。”肖克副师长将一二零师补发的40元路费交给我，并说你可寄回家去还债。翌日，我便随去延安的干部一起出发了。

我在延安抗大和马列学院共学习了两年多时间，这段经历，使我终生受益。后来，我所以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得益于延安学习打下的基础。延安学习毕业后，我回到一二零师，被分配到肖克同志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并在老首长直接指挥下开赴平北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回首往事，在山西与老首长们重逢是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一个革命者，命运多桀，经历坎坷，是难免的。困厄之际，最需要同志间的理解、信任、勉励和支持。弼时同志、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甘泗淇同志，正是以领袖和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在我最需要的时刻，给予我温暖和教诲，使我永远不失前进的信念和勇气。

（李杰、段洙萍执笔整理）

田家英与毛泽东

的诗词交

●曾自  
曹应旺



田家英自 26 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 18 年。

他热爱毛泽东。

在胡宗南进攻延安，田家英随毛泽东撤离延安时，写过一首表示对于敬爱的领袖尽全力爱戴保护的诗。这首诗田家英曾书赠给好友杨述。此后，在相伴毛泽东的日子里，田家英是一直按照这首诗的要求去做的。

一、田家英热爱毛泽东的诗、文、字

他热爱毛泽东著作。

建国前，他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题编排，整整齐齐地编了五大厚本，并一直带在自己身边。建国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作

为《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印成内部读物出版，这是第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他参加并负责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与注释工作，有几篇重要讲话，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都是他根据记录稿整理的。每一卷出版时，田家英都写评介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1964 年，田家英觉得“毛选”的份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

他热爱毛泽东手迹。

毛泽东爱好书法，平时工作、看书累了，总要提起笔来练一阵子，作为一种休息；有时情绪特别好，也要



泼墨挥毫。毛泽东的书法，轻若寒烟，重如崩云，点像苍海，划似银河，气势磅礴，堪称古往今来书法艺术中的珍品。田家英喜欢欣赏书法艺术，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他常把自己收到的书法价值高的草书送请毛泽东欣赏。毛泽东也让田家英代找各种草书字帖。1958年10月16日，毛曾为此致信田：“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在田家英的收藏中，最受珍视的是毛泽东的手迹。哪怕是片纸只字，他都从不放弃。他把毛泽东练字或为人题词选剩下的废页零张收集起来，拓裱整齐，收集了一大本。那些拓裱在单页纸上的毛泽东手迹，田家英将其存放在一个蓝色布面的长方形盒子里。对这些毛泽东手迹，田家英视为“国宝”，只有亲朋好友来，方肯拿出观赏。有一次，他到杨述处，看见杨述保存的毛泽东给新华社写的原稿手迹没有裱，他就要求裱起来。

### 他热爱毛泽东诗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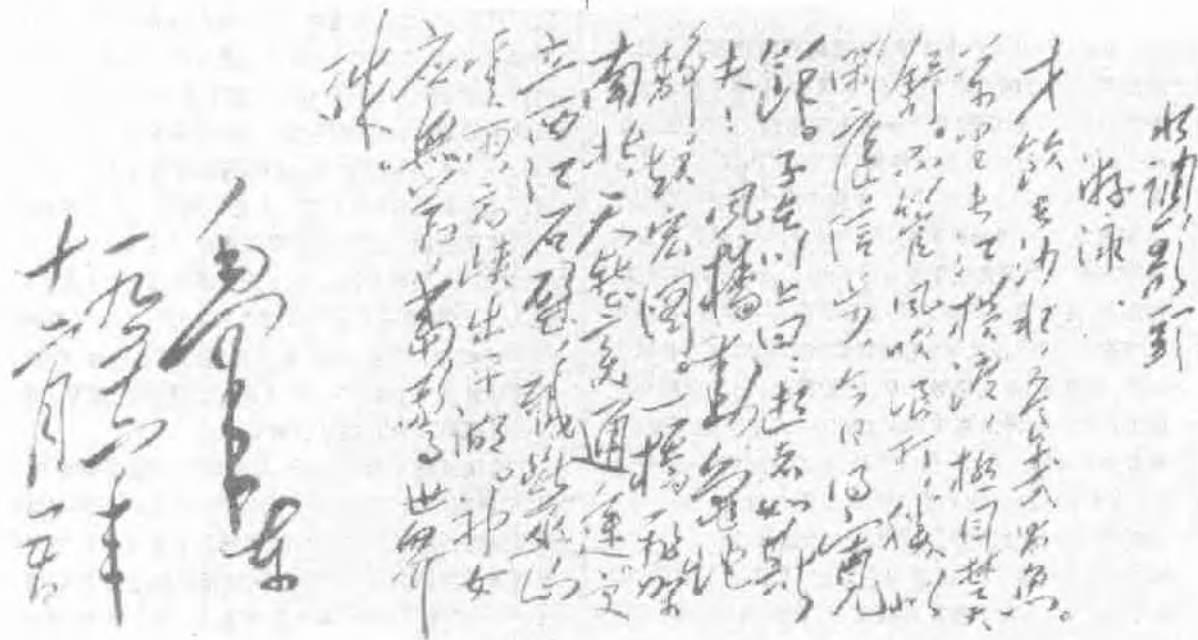
毛泽东练字时常常书写自己过去的诗词。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手迹也以毛的诗词为多。现存中央档案馆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是1964年装裱成册的。共10首：《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清平乐·会昌》、《沁园春·雪》、《七律·人民解放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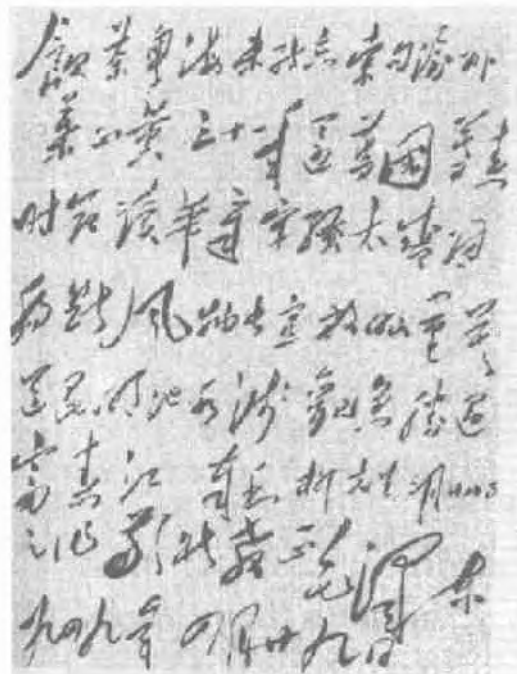
占领南京》、《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忆秦娥·娄山关》、《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田家英不仅在亲朋好友面前而且在自己的孩子面前不时发出对毛泽东诗词的赞美之声。一次，田家英在杭州雪夜访史菲，看到史菲正在翻读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木刻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不禁动情地说：“当代人中间，学识称得上博大精深的首推两个人，一是毛主席，一是鲁迅。”1963年，毛泽东读了上海市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报道后，于建军节那天题写了《八连颂》，是用铅笔写在十六开白纸上的。毛将这首新作先送给几个熟悉的人传阅。田家英看到后拿给自己上小学和上初中的孩子们读，并要求孩子们背下来。他欣喜地对孩子们说：“这是毛主席亲笔手书的一首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诗，是采用中国古代三字经的形式和民族风格写成的，是一种新的尝试。”

### 二、田家英对毛泽东诗词的贡献

1985年和1963年，田家英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两个诗词选本。他不仅对搜集、整理毛泽东诗词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毛泽东诗词写作提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诗刊》1957年创刊号上，由于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出现了排队买《诗刊》的热烈场面。1958年1月，





毛泽东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手迹

《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公开发表。在田家英参加下，经过对以上19首诗词的编辑，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了刻印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这个刊本，在书眉上写了说明和十二条批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送瘟神》七律二首。至此，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已有21首。

1961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周明等在邓拓那里看到邓拓保存的毛泽东1929年至1931年于马背上吟成的词六首。他们抄录下来带回编辑部。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读后，击节称赞，很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遂呈送毛泽东审阅，请示并要求准予发表。这年，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田家英在毛泽东布置与安排下率一个调查组于1月下旬去了浙江。4月下旬，在杭州，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浙江调查的情况，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人民文学》编辑部送来的他的词六首填上词牌，并查找“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田家英很快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在田家英查出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典故的基础上，为“不周山下红旗乱”句作了一条长达400多字的注。《词六首》和作者原注在《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发表。为便于读者理解《词六首》，《人民文学》还配发了约请郭沫若写的《喜读毛主席的〈词六首〉》一文。郭沫若在高度评价《词六首》的同时，指出：“主席这一注的重要性不亚于词的重要性。”“鲁迅

的《补天》作于1922年11月，我的《女神之再生》作于1920年11月，我们的认识和主席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还大有距离，故我们当时还不能体会到共工神话中人类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潜在意义，经主席这一点出，就好像在中国的神话世界中高擎起一只火炬。”读了郭沫若对作者原注的评价，使人很自然地想到，田家英为作者原注的写成所做的查找资料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

1963年12月，文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有10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了一个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与会者对毛泽东诗词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田家英参加了会议，并负责把大家的意见转达给毛泽东。诗人臧克家托田家英代转了23条意见，其中有13处为毛泽东所采纳。在编辑过程中，田家英还经常同诗家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毛泽东诗词的用典及含义。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臧克家：毛泽东同志有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弃疾（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在宋词中，毛泽东最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田家英的话对帮助理解毛泽东诗词有着重要意义。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诗词。这次新发表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由于田家英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泽东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4月23日晚上，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总统府”，结束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消息传来，毛泽东感到衷心的喜悦，焕发了葱郁的诗兴，当即吟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一首。田家英抄录收集了这首诗。

这次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把这首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忘了还有这一首。于是，毛泽东根据田家英提供的抄本，经过核对，随即书写了这首诗。中央档案馆张景堂同志说，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有田家英保存的，有从江青处交来的，每首诗词都有重件，有的诗词毛泽东多次书写，唯独《人民解放军

占领南京》这一首只有田家英存的一件。这次新发表的《卜算子·咏梅》词，毛泽东作于1961年11月至12月之间。在这之前，毛泽东不仅读过陆游的《咏梅》词，也读过其他一些著名诗人关于写梅的诗词。11月6日上午6时至8时30分，毛泽东接连三次写信给田家英，要田帮助查找一首咏梅诗。

其一：田家英同志：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 毛泽东

其二：田家英同志：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最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 毛泽东

其三：家英同志：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到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 毛泽东

毛泽东要田家英查找的咏梅的那首七言律诗是现代诗人高启作的《梅花九首》的第一首：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

诗中“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两句，以高士和美人形容梅花的高雅和美丽，是万口流传的咏梅名句。对于这首诗的作者，毛为什么首先想到林逋？第一，林逋是宋代著名诗人，终身布衣，淡于荣利，在杭州西湖孤山隐居，不娶妻，无子女，屋畔遍种梅花，在湖边饲养白鹤，人称“梅妻鹤子”。无怪“雪满山中高士卧”一句，使毛泽东想到林逋。第二，林逋是咏梅高手，现存咏梅诗有六首，词一首。其中《山园小梅》诗被历代诗家誉为咏梅千古绝唱。这首诗毛泽东不仅读过，且十分喜欢。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就有这首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的墨迹。第三，半年前毛泽东在杭州曾让田家英借阅林逋诗集。田向在杭州从事文史研究工作的好友史莽处寻书，借到了涵芬楼影印、双鉴楼藏的明抄本《林和靖先生诗集》和清代吴调元校刊的《和靖诗集》。毛对林逋的诗和为人是熟悉的。第四，高启诗《梅花九首》深受林逋的影响。其第一首“寒依疏影萧萧竹”是从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脱胎而

来的。第三首“放鹤人归雪满舟。”则是以梅比人，直接写林逋的。毛泽东查林逋诗集发现没有这首诗，他又想起“是否清人高士奇的”。高士奇与高启，有一个字同，两个字音近。这可能是毛泽东由此而造成的记忆错误。田家英接读毛泽东几个小时之内连续三封来信后，于当天就帮助毛泽东查到了这首诗的全文、作者及作者所处的朝代。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中有篇墨迹正是1961年11月6日写高启那首诗的，前面还写了“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段话。可以肯定，毛泽东读到了高启的诗集特别是其中的《梅花九首》。不久，毛泽东写出《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这首词主要是从反面受到了陆游咏梅词的影响，诚如作者在小序中所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但是，他也受到其他咏梅诗词，特别是林逋、高启咏梅诗词的影响。如“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则直接受到高启梅花诗第五首中“春风未动枝先觉”的影响。

毛泽东《咏梅》词写出后，先在党内传阅。其用意是希望党员同志们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首先成为毫不动摇、不怕寒冷的梅花，为中华人民做出好榜样。田家英同其他党员一样，从《咏梅》词中受到了巨大鼓舞。另一方面，作为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为《咏梅》词的创作搜集资料，提供历史素材，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毛泽东创作的成功。《诗刊》1976年1月号发表毛泽东词两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同年，《毛泽东诗词》再版时，加了这两首，成39首。这是毛泽东生前公开发表的39首诗词。毛泽东诗词还有相当一部分，由于多种原因，生前没有发过。在这些诗词中，田家英保存的有两首：

#### 其一《五律·看山》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上看，桃花岭上闻。  
冷来寻扇子，热去唱东风；  
韬光庵畔树，一片是苍鹰。

#### 其二《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过钱塘。

田家英保存的这两首毛泽东诗的手稿，与林克回忆的有所不同，林笔录如下：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翻身跃入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种不同，记录了毛泽东对自己这两首诗认真修改的过程。它为后人编辑、研究毛泽东的这些诗提供了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 三、毛泽东、田家英对古诗词的共同爱好与交流

中国向来有“诗国”之称，诗词艺术传统深厚，源远流长，数千年间，作者如云，名家辈出。毛泽东和田家英都酷爱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对《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田家英也读过很多古诗词，且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许多古诗词，工作疲倦时，他常以背诵古诗词为娱乐，既换脑筋，又陶冶情操。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他凭记忆写下来附上：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最后，他还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这首诗是清代人严遂成所作。毛泽东默写的与原诗对照改了两个字：将“且”字改作“犹”字，将“畔”字改作“下”字，但却与袁枚的《随园诗话》所引的《三垂冈》诗一字不差。有人认为有可能毛泽东本来就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诗的。无论怎样，毛泽东对古诗词熟读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田家英对古诗词的熟悉也非一般。他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就查出了《三垂冈》诗的作者及所处的朝代。

如前所述，毛泽东凭记忆能默写出“雪满山中高士卧”咏梅诗的前四句。毛让田查找全诗、诗的作者及朝代，田当天就查到了。

毛泽东在杭州，要看浙江古人的诗集，田家英帮助借过林逋的诗文集。毛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史莽，收集了自唐

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在成都，在田家英协助下，挑选编印了《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明朝诗人有关四川的诗》两册。毛泽东为这两册诗词写了标题和批语。其中有一条批语是：“送田家英同志，用后退毛。”这些诗词曾连同《华阳国志》一并印发给参加成都会议的人员。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长达600多字。毛泽东非常喜爱这首长诗，曾写过这样的评语，“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寥寥数语，道出他对诗人情怀和意境的深刻见解。毛泽东多次手书《琵琶行》，几乎每一次都是龙飞凤舞，一气呵成。田家英同毛泽东一样喜爱《琵琶行》，但他更喜欢毛泽东的字。在他看来《琵琶行》与毛泽东的书法相结合，诗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堪称艺术瑰宝。

有一次，田家英与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王治秋谈论故宫博物院丰富的收藏，王说：“可惜没有收藏一幅毛主席的墨迹。”田家英大有同感地说：“堂堂国家最高级博物院，没有毛主席墨迹不应该。”田家英选择了自己珍藏的毛泽东手书《琵琶行》送给王治秋，存于故宫博物院。“文革”后，根据中央有关精神，故宫将这件毛泽东墨宝移交中央档案馆。1983年中央档案馆编辑了《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其中毛泽东手书《琵琶行》就是根据这一件刊印的。

田家英对历代诗词的品味和鉴赏能力很高。无疑，他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1949年5月10日，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与？”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在他们对历代诗词、书法欣赏的交流中，田家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毛泽东。田家英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在毛泽东卧室供其品味。60年代初，田家英从杭州购到一幅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行草体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字体笔酣气畅，磊落不羁。田认为邓石如以篆隶著名，其行草书能写得这么好，实不多见。他将这副对联送到毛泽东处，毛果真也很喜欢，挂在墙上欣赏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现代中国的诗坛上，郭沫若称颂毛泽东“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泽东诗词家传户晓，有口皆碑，无论是思想的崇高、气魄的雄伟还是语言的光彩都是前无古人的。田家英在古诗词上的成就不可能与毛泽东相比。田没有留下一本旧体诗词选，但也写过一些很有影响的旧体诗。如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田常常为国家的境

遇和人民的困难忧心忡忡，以十分内疚的心情写过这样一首诗：

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  
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这首诗不仅显示了作者对旧体诗的深厚功底，而且饱含着作者的心声、志向和追求。毛泽东曾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毛还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田家英曾写过信天游体民歌长诗。他在晋绥解放区参加土改工作时，搜集真实素材，写下了长篇民歌体新诗《不吞儿》。该诗通篇倾注着他和人民群众共患难、同命运的阶级感情，体现着他土改后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可以说田家英在新诗创作上做过十分有益的尝试。

#### 四、田家英没有辜负毛泽东要他读《贾谊传》

毛泽东和田家英不仅对中国古诗词有共同的爱好，对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也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都喜欢博览中国古籍，从传统的知识与智慧的海洋中获取精神食粮，都喜欢以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榜样，鉴古察今，致力于治国兴邦的伟大事业。

50年代，田家英常常在晚上被毛泽东叫去，交完工作之后，就说古论今地谈起来，从历史、文学到典故、人物，从正传到野史轶闻，每次都有新的话题。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对田家英戏言：“将来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好不好？”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的关系融洽无拘。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博大精深，同样，毛泽东也很器重田家英的才华。早在1942年，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还特地叫田去谈了一次话，说田的文章写得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时年田家英才20岁。1948年10月，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12月，毛还要田担任毛岸英的语文教员。后来，毛又让田家英担任毛岸青的语文、历史教员。1956年，田家英代毛泽东起草“八大”开幕词，写得十分出色，尤其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毛泽东非常满意。毛致开幕词后，在休息室里大家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毛泽东器重田家英，但又十分重视引导这位“读书人”、“年轻的秀才”。这可以从毛泽东要田家英读班固《贾谊传》的信中看出一二。这封信是1958年4月27日写的，全文如下：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 毛泽东

鲁迅曾高度赞扬过贾谊的《治安策》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毛泽东与鲁迅的评价可谓异口同声。毛泽东赞扬贾谊，在其早年诗句“年少峥嵘屈贾才”中已见端倪。后来，他在评价初唐诗人王勃时曾说：“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三，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引导他的年轻的秘书像贾谊那样文必切于时用，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像贾谊那样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但又敢于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对毛泽东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田认为是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田直抒胸臆，险些被划到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面去。60年代初，田对毛泽东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到严重的地步，一直持保留态度；而毛对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以此为座右铭。他没有对毛泽东“左”的错误采取迎奉拍马的态度，他没有向包围着毛泽东并受到毛泽东重用的陈伯达、江青这伙丑类们低头，而是尽其全力直谏、抗争，直到1966年5月23日含冤离世。

惊悉田家英去世后，他的好友曾彦修作诗一首：惊骑汹汹戚耗传，锦城风雨忽凄然。贾生地下迎新客，世上于今革命难？

田家英确实像贾谊。他没有辜负毛泽东让他读《贾谊传》。

# 邓小平 与三峡工程

●陈绶台  
卢江林



1980年7月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副总工程师魏廷琮接到通知:

小平同志要看看三峡,想让他陪同。

11日,小平同志到重庆,一下火车就上船。

东方红32号轮立即起锚。

小平这次到四川,看到老百姓生活的真实情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对四川的干部说:“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很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尽快富裕起来。”有的农民用不上电,烧不上煤,连烧柴都困难。小平同志特意交待:“要因地制宜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11日晚,轮船停泊万县。

小平同志问起鄂西资源情况。魏廷琮说:“鄂西铁矿储量很大,在宜昌、恩施两个地区,储量就有十七亿吨。经冶金部门长期研究,准备开采。”

小平问:“矿石的品位如何?开采和选矿技术能不能解决?”

“含铁量约为30%到40%。地下开采和红矿选矿问题,采用先进技术可以解决。”

“那么运输问题呢?川汉铁路选了哪几条线?”魏廷琮详细汇报了川汉铁路选线的南、中、北三个方案。讲的过程中,他一步步把话题引到三峡工程上来:“鄂西

地区最为丰富的是长江水利资源,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可以兴利除害。”

小平同志马上听出了魏廷琮的弦外之音,一语道破说:“你的意思,是要修建三峡大坝。”

他又指着同行的一位负责干部,“而他是不赞成的。”

小平同志快人快语,一下把矛盾捅到大家面前。

12日早餐之后,陈丕显向小平同志介绍了宜昌地委书记马杰和荆州地委书记胡恒山。胡恒山原是新四军五师的,在大别山一带打过游击。

小平同志回忆说:“黄冈地区盛产棉花。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部队穿的是单衣。在鄂东,十天之内就收集起全军十多万人所需要的布匹和棉花。”

小平说:“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儿?”

魏廷琮答道:“不会有这样的影响。第一,三峡水库按200米正常蓄水位,比原来河道水面只增加一千多平方公里,对气候影响不大,不会有明显改变。第二,水库水温呈垂直分布,长江流量大,可以调节。最重要的论据是丹江口水库,丹江口水库修起来以后,汉江中下

游解除了水患，粮食、棉花连年丰收，汉江的鱼产量也并没有减少。如果说影响，就是水库蓄水之后，上游冲下来的饵料相对减少了一点。”

“噢，是这么回事啊！”

小平同志点点头，他认为魏廷琮说的有道理。

船走到江流湍急处，小平同志抬头观察船行情况，看到滩多流急，航行困难。

他对魏廷琮说：“1920年出川，去法国留学，船行到中途坏了，只好改变行程，起早，走陆路出川，交通真是艰难啊！”

这是整整60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邓小平只有16岁。

他第一次告别家乡，到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

第二年，他参加了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考试，取得了好成绩，在四川省政府推荐的92名考生中名列前10名。

船过夔门，小平同志到船尾看瞿塘峡进口。

小平同志问：“在这里选过坝址没有？”魏廷琮答：“这里在三峡上口，水深流急，地质条件不好，而且整个三峡河段是水能比较集中的，如不加以利用，只在上口建坝，要得到同等防洪发电效果，则对四川会造成更大的淹没损失。”

魏廷琮又介绍了现在坝址的地质情况。

小平：“你们不是有两个比较坝址吗？”

魏廷琮说：“两个坝址都是好坝址，各有优缺点，太平溪坝址在上游，河谷相对较窄，土石方开挖较多，混凝土工程量较少；三斗坪坝址混凝土工程量较大，但在施工导流方面简便一些。”

小平同志又详细询问了投资、工期、发电航运等问题。

小平同志问：“一百万千瓦的机组，国内能不能制造？”

魏答：“美国爱利斯·查谟公司董事长给您写的那封信，转给了我们。他们表示愿意承制三峡一百万千瓦的机组。一机部沈鸿副部长表示，一百万机组可以造，也可以和美国人合作，共同设计，在我们工厂造。”

小平同志肯定地说：“这是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行。”

小平又问：“围堰发电六年半开始受益，是否1981年开工，1987年即可以发电？”

“是这样的。全部建成16年，就到了1996年，年发电量1100亿度，接近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电总量。以每度六分计，可收入66亿元，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小平同志说：“利益很大，要进一步好好讨论。”

船过三斗坪坝址，邓小平站在江轮甲板上，举起望远镜久久地凝望着这座船形的小岛。

到了葛洲坝工地，小平同志情绪更加高涨，沿途向正在施工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频频招手致意。

走到上游围堰防淤堤时，小平问魏廷琮：“葛洲坝施工场地这样宽敞，上游大坝坝址附近窄得多，能不能布置得开呢？”

魏答：“两个坝址的下游都有河滩可以利用，并且可以利用葛洲坝作为后方基地。”

小平同志说：“葛洲坝施工的这些设备，凡是能用的，都可以用到三峡工程上，可以省很多钱。”

一到武汉，他就把胡耀邦和赵紫阳、姚依林找来，到他下榻的东湖宾馆。

他说：“我建议紫阳同志，由国务院召开一次三峡专业会议。我听了汇报有些看法。三峡问题要考虑。”

接着他归纳了几个主要的问题：

“担心一个航运问题，现了解运的东西不多，船闸有5000万吨通过能力，顾虑不大。”

“另一个生态变化问题，听来问题也不大。”

“三峡搞起来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真的洪水来了，很多地方要大倒霉。”

“整个工程投资95亿元，移民费40亿元。”

“六年半可以发电。发电2000多万千瓦，效益很大。”

他最后的结论是：“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8月，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三峡问题，决定由科委、建委组织水利、电力等部门的专家进行论证。

在小平同志的推动下，三峡工程的车轮加速运转起来了。

1986年，国内外对三峡出现了不少议论。赵紫阳汇报时说：“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三分之一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

小平同志说：“如果技术经济可行，还是应该上。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终于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

（责任编辑：刘家驹）

○李南友



韩美林说：  
“我的路在中国”



美林有一次对我说：“低下头，看看在地上那芸芸的小草吧，他们也不甘心死亡，而是千方百计地追求着阳光雨露，生儿育女，有时为了开放一朵小小米粒似的花，竟把根扎下几十米的沙漠或硬土中……再抬起头，你看看大树，大树诚然值得敬仰，越是风雪紧逼，越显出它傲然挺立的品格，狂风暴雨刮走的只是枯枝败叶，留下的却是铮铮铁骨，转眼又是一片郁郁葱葱……”

韩美林既是那小草，又是那大树。

1993年的最后一天，“韩美林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在中国健在的画家个展中，这是难得如此轰动的一次开幕式。美术馆的中央大厅里，二楼三楼的楼梯上都挤满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有七个副委员长，副主席在百忙中前来参加开幕式，荣高棠同志，以及受李瑞环同志委托前来祝贺的李瑞环夫人和秘书，都未能挤进来。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参加开幕式的有3900人。展览期间，收到的花篮和花束近200个。一位美国友人来函说：“您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艺术大师，您的作品得到了海内外名家的一致推崇和赞赏。您把中国民族传统和西欧的现代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美中文化交流促进会的主席董歧山和执行长董以礼先生在贺电中说：“您是一位当代世界杰出的艺术家，您的天才加上您的勤奋，使您连续举办三次画展，无疑说明了您的惊人勇气和无比才华……”在展览大厅里，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是上千件韩美林近期的作品，有绘画雕塑、书法和陶瓷……

著名评论家马克说：“其创作思路之敏锐，品种风格之多样，艺术技巧之精妙，都超越了他过去的水平，显示出一种不断标新立异的精神和旺盛的创作活力，以及多才多艺的个人风采。”

著名雕塑家吉信说：“韩美林的雕塑别开生面，走出了新路子，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韩美林的作品不仅为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喜爱，而且连四五岁的孩子也喜爱。在韩美林的艺术座谈会上，红学专家冯其庸和画家、评论家毕克官风趣地说：“你的那些小瓷盘，我们真喜欢，想偷偷拿一个。”最使韩美林感动的是，在展览会上，有一个年仅四岁的小男孩，主动趴在地上，说：“韩美林爷爷，我最喜欢你画的小动物，我属兔，能不能给我背上画只小兔子？”韩美林含着泪水在这位真挚的小观众新衣的背上认认真真地画了一只小兔。

每天，韩美林的展览厅都是挤得满满的，韩美林每次一到场，大家都把他围得水泄不通，纷纷要他签字、与他合影，在这无数热情的观众间，韩美林忘记了连日

来的辛劳，忘却了生活中种种使他痛苦的心情。在无数热情的观众中间，他又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他自己说过的话。“生活中喜怒哀乐，我选一个乐字，乐能解苦；事业上酸甜苦辣，我选一个苦字，苦中追求；艺术上流派万千，我选一个土字，土亦是洋。我是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汉子，我始终坚信，我的路在中国。”

韩美林是全国政协常委，国内外知名的艺术家，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理事、主席、副主席等等的头衔，就在这次展览会期间，他收到了美国合众集团和美中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发来的贺电，聘请他为美中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副主席。在那么多桂冠、荣誉面前，有谁能想到他曾经经历过的种种苦难。

1949年，12岁的韩美林穿起了军装，走进了革命的队伍，他被分配到济南革命烈士纪念碑的浮雕组。从此，韩美林每年365天，很少有一天不作画。凡作画，通宵达旦是常事，有几次因作画时间过长而几乎眼睛失明。他的画，特别是动物画，独树一帜。他画的狐狸，那毛茸茸的质感，栩栩如生，既有西洋画的真实美感，又不追求细节的逼真。有人说，韩美林从一开始就具有作画的灵性和天才，看韩美林作画，他的手指挥着画笔，没有一个动作是多余的。他画面上的形象组合，高低横斜，曲直粗细，浓淡，不是靠造作，而是靠智力和眼力的巧妙结合。他手下的动物，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千姿百态，都是美的创造。

他创作的画，数量惊人。

正当他满怀激情，进一步施展他卓越才华的时候，1965年，韩美林被戴上“攻击”“污蔑”等等的罪名，发配到八公山下的淮南瓷厂“劳动改造”。从此，他妻离子散。

1968年4月9日，这天下午，他从山上回瓷厂。路上他在一小块枣木上雕刻着一个情态活跃、翩翩起舞的朝鲜族少女。突然，前面一群人朝他涌来。韩美林第一个反应，是把未完成的艺术品揣在怀里，保护起来。这伙人把他捆绑起来，用铁丝把他的双手反拧着。在这严酷的时候，平时与韩美林相依为命的小狗——韩美林姑且叫它为“小妹”的狗闻声而来，朝殴打韩美林的暴徒们狂吠，一根黑黝黝、沉甸甸的杠子，狠命地一击，打断了“小妹”的脊梁骨，它为护卫自己的友人倒下了。在它倒下的一瞬间，它用铜铃般的眼睛，深情地望着韩美林，用它殷红的舌尖，舔了舔韩美林流血的手。“小妹”在韩美林被捕后，不吃不喝，痛苦地叫了三天就死了。韩美林被送进了牢房……。

记忆与想象虽然那样美好，却总是那样瞬息即逝。

于是，韩美林设法留下一截袜子头，在自己的大腿上作起画来，练笔，练他那被勒断了筋的手腕，画一切他可以看见，可以记忆，可以想象中的形象。查监的来了，他老老实实端坐不动，查监的一走，他又不停地画。

生活又有了新的开始。在他失去了近五年的自由之后，他终于从监狱中走出来，他更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阳光如此可爱，自由如此珍贵。

他更满怀激情，用画笔歌颂美好的，鞭挞丑恶凶残的。

1980年，韩美林应邀去美国21个城市作巡回展览，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舆论称韩美林为“中国的毕加索”。曼哈顿宣布他画展开幕日——十月一日为“韩美林日”。这种殊荣对一个年纪轻轻，从“炼狱”中刚出来不久的人来说，似乎应该感到“受宠若惊”了，可是韩美林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韩美林就是韩美林，为什么不能称中国的韩美林，而称之为中国的毕加索呢？”在参观美国一些博物馆，看到人家拿着他们的祖宗过去从中国掠夺的珍宝向炎黄子孙显耀时，韩美林掉下了眼泪，回到旅馆他痛哭失声。当时就有不少朋友劝韩美林留下来算了，可是韩美林说：“爱国主义在我思想上形成了一种摧不垮的精神力量。我在美国举办画展，

第八天就想回国，这种心情是很真挚的，我忘不了生我养我的祖国。祖国再穷，我也不会留恋异国他乡。”

1989年，韩美林到法国访问展出，当时，他的妻子要求留在法国，她要韩美林作出选择，韩美林毅然同妻子离异而回到了他的祖国。

在韩美林心目中，祖国永远是第一位的。正因为生他养他的祖国还贫穷、落后，对国家民族充满了挚爱的韩美林更觉得应该留下来。一个心中有祖国的人才有灵魂。

他，永远忘不了，在那残酷荒唐的年代里，在他没有任何力量自卫的时候，是那些最最平凡的中国老百姓保护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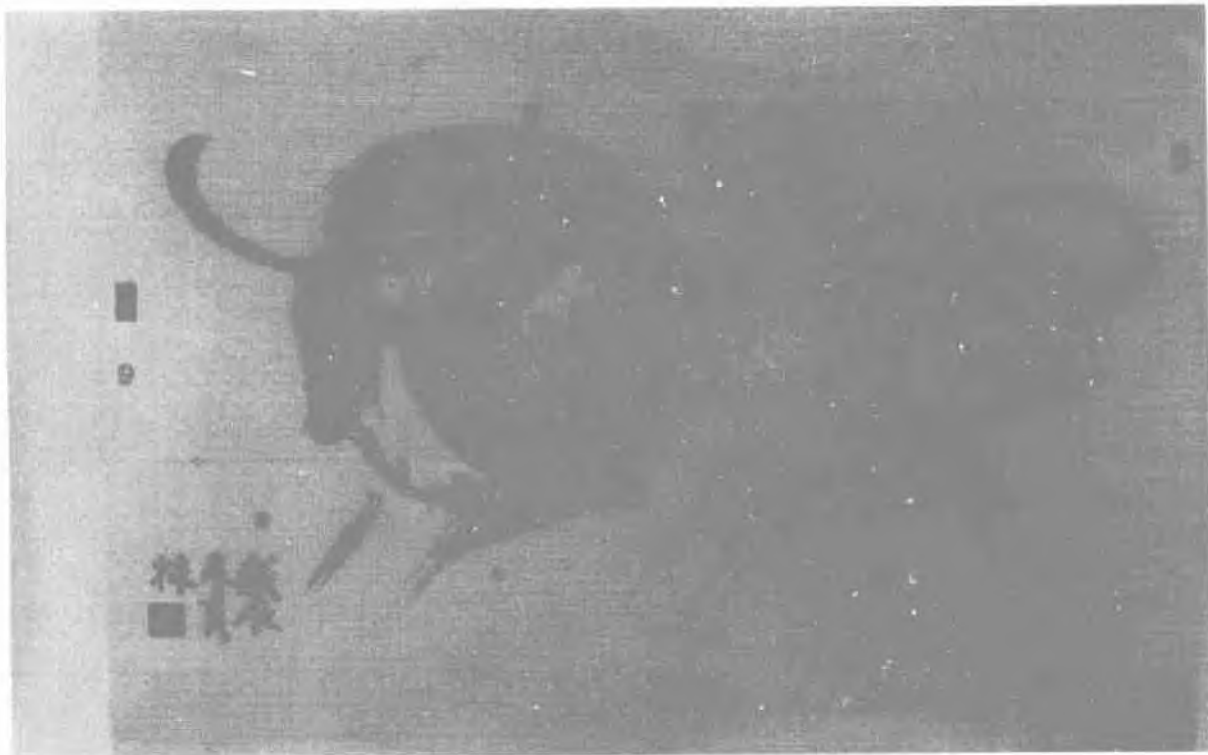
韩美林在狱中高烧已经一个星期了。在放风的时候，一位青年人见韩美林摇摇晃晃的，故意吼叫着说：“韩美林，为什么不好好走？”

“我发烧好几天了。”

“为什么不早说！一会叫送出去检查。他妈的！是真病还是假病！”

一会儿医生真的来了，给他量了量体温说：“走，快出去，免得传染给别人。”带他来交给了看守，看守给他打开了一道道牢门。





几经周折，终于在一条小巷里见到了三位设计会见他的同志……

人民毕竟是可爱的，我们的祖国，民族毕竟是伟大的，那样的时代毕竟过去了。

韩美林回到了鱼水相融的人民中间。

韩美林对我说：“近几年来，我几乎没有画画，不务正业地搞起雕塑来。”他说：“文革中，仅山西省一地13000个庙宇就砸得只剩下31座，洛阳龙门石窟除了几尊大佛之外，多数石窟都是有窟无佛，南京栖霞山，两千多尊佛，佛头全部被砸。文革十年浩劫，极左思潮的横行，使中华大地遍体鳞伤……赵朴初老人躺在病床上对我说：你就是恢复上一尊也就功德无量了，这就是我一生的心愿。我听了不禁凄然，……”一个巨大的空前的艺术工程在他心中酝酿着。

然而，有那么多事情都在那里向韩美林招手，韩美林觉得急需他干的太多了。驱除种种痼疾，谈何容易！

韩美林说：“我做的雕塑都是永久性材料花岗岩、青铜和不锈钢，且是巨型的‘世界之最’。”

近年来，韩美林先后为大连市、济南市、鞍山市、淄博市创作了《金马骄嘶》、《神牛》、《雄鹰展翅》、《双虎》、《群虎》、《金牛》和《金鸡报晓》等十余座大型的城市雕塑。一位法国专家，领着他的孩子，拍着大连老虎滩公

园的《群虎》，说：“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艺术，你应该向中国韩美林学习！”济南动物园金牛山麓韩美林的身背大元宝《金牛》落成时，众人热泪盈眶，欢呼着：“韩美林！韩美林！”韩美林流下了眼泪。

成绩只能代表过去，而且每一次成绩的取得，都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与汗水，韩美林从来没有把这些归功于自己。对于这位艺术大师来说，他把目光又投向未来。深圳蛇口高27米、长30米的《神牛》雕塑，1994年2月刚刚竣工，马鞍山的《楚霸王》大型雕塑急待完成，“中华希望与幸运之神巨塑”正在向韩美林招手！选址于长江口崇明岛的这个巨塑将是世界三大巨塑之一。

还有，还有……

韩美林只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精力不够，中华大地是他力量的源泉，中华大地是他卓越才华驰骋的宝地。无论多种多样外界难以想象的坎坷、磨难、天灾人祸、摧残，打击他，无论一天两个的匿名电话威吓他，都没有能使他退缩半步而只能使他更勇猛、更坚定；回答广大热情观众的是1993年年底“韩美林艺术展”短短的序言：

“我始终坚信，我的路在中国”，这也是他对那些打匿名电话，威胁他，恐吓他的人的有力回答。

# 蒋介石八大金刚 抗战功罪录

◎尹家民



这里记述的蒋介石的八大金刚确有其人。

这八个人官阶相似，性格各异。有的不近女色，不嗜烟酒，洁身自好；有的狂嫖滥赌，爱财如命；有的少年得志，轻狂一生；有的出身贫寒，仕途坎坷，忍气吞声……八个人与蒋介石的关系时亲时疏，复杂微妙。及至大厦将倾，除张治中外，都随蒋介石去了海峡那边。

## 穿行在炮火间

1937年，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忽闻芦沟桥战事起来，第二天即拒绝医生的劝告，径返南京，接受京沪总司令的任命。8月11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他统帅的军队也在当晚向上海挺进，12日清晨就占领了上海。从苏州出发的前一天，他把在“一·二八”率领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战时所写下的遗嘱取了出来，交给友人，重申他为民族战争准备献身的决心。上海的居民清早从梦里醒来，看见遍地都是国军，惊喜交加。

13日拂晓以前，攻击部队对虹口杨树浦敌根据地攻击准备完毕。但突然接到南京电话：不得进攻。张治

中飞急电告：“我军业已展开完毕，攻击准备也已完毕。”但回电仍是：不得进攻。张治中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乘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现在失此良机，心急如焚！

正式开战是8月14日，这样耽搁了两天，给了敌人一个从容部署的机会。

8月14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开始向黄浦江敌舰轰炸。下午3时，国军接到总攻击命令。下午4时，炮兵开始集中射击，步兵勇猛攻击前进，到日落时，多有进展。忽然又奉上令：

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寒酉待参京电）

于是攻击停止。15日，16日，都是奉令作攻击准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

“八·一三”之后的第三天，冯玉祥来到苏州城外张治中的司令部，看见张的参谋长，知道上海附近同日本人打得很厉害。冯玉祥对张的参谋长说：“你们这司令部应当挪一挪，以免被炸。”他离开苏州向上海前进，



出来不过三华里，日本人的二十八架飞机就把张治中的司令部内外全炸平了。他的汽车刚到昆山火车站，就听得炮声隆隆，震动大地。冯玉祥环顾左右意气奋发：“我年来奔走抗日工作，今日始听到民族的怒吼声，何等痛快！”正说着，敌人那二十八架飞机又俯冲过来，对着车站的三列兵车狂轰滥炸，敌机飞得很低，机上的人和枪都清晰可见。官兵死伤很多。冯的临时参谋长熊斌幸而蹲在稻田的水中，只露出一个头来，才没有被百米外的轰炸炸伤。

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的前方司令部，张治中、张发奎、杨虎几位总司令都在。几十架日本飞机仍在头顶上飞来飞去。冯玉祥提醒张治中：“你这司令部当赶紧移开，这里不大妥当。你是这方面的最高司令官，不能冒这样的险！”

张发奎问冯玉祥：“前头一连炮队不知哪里去了，是不是你把他们调开了？”

冯玉祥惊讶：“不知道。”

查来查去才知道是蒋介石把那一连炮队调到旁边去了。气得张治中直攥帽子，望着远处的炮火摇头。一个委员长隔着司令长官、总司令、军长、师长，多少级长官，把一连炮兵随便调走了，这叫什么统帅法？真是太无知识了！

### 蒋介石的水蜜桃和火腿罐头

西安事变后，陈诚向蒋介石建议在庐山办暑期训练班，邀请国民党要人做报告，激励抗战建国的士气，被蒋介石采纳。庐山训练班于6月25日开学，蒋介石亲任团长，程潜、贺国光、白崇禧、何应钦、张治中、张诚任副团长，陈诚兼教长负实际责任。受训学员三分之二为中上级现役军官，三分之一为高级小学校长、县长、各省市党部委员等文职人员。蒋介石、戴季陶、汪精卫、陈立夫、胡适分别讲他们最拿手的学问。陈诚则反复强调精诚团结，效忠领袖，抗战必胜的信念。陈诚对学员的生活给予特殊优待，每人发两套卡叽布军服，一床纯毛军毯，还有雨衣、水壶、干粮袋之类。以及精装的《总

理遗教》、《领袖言行录》、《三民主义研究》、《新生活手册》等书刊。毕业前夕，又从蒋介石家乡运来奉化水蜜桃和金华火腿罐头，赠给每人四听，以示领袖关怀。他说：“委员长特别关怀诸位府上的老人，请你们带回府上给老人品尝，略表薄意，同时诚受托向诸位双亲问安。”话毕，全场掌声雷动。两期受训学员共三千六百多人，许多人等不到毕业就奔赴抗战前线了——每天集合时，陈诚手里拿着一张名单，点叫在场的某一位将领，当面告诉他，你到哪里去率军抗战。孙连仲、李默庵、王耀武、汤恩伯等就是这样走上抗日战场的。当时众多将领都希望首先点到自己。那种报国不落人后的场面，曾令人激动。有一次，蒋介石训话讲了几个小时，还不见要结束的样子，而已被点到名的将领等着离团返防，陈诚便在讲台上打断蒋的讲话，请他讲快点。蒋介石也没埋怨，草草了结。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可见战事之紧迫。

### 张治中遭蒋训斥摔了电话

从8月14日以来，张治中没有好好吃过一餐正式的饭，也没有得到一整夜的安眠。在过度疲劳之后，反而觉不出困乏，只是感到眼睛红红的，涩辣辣的，喉咙嘶哑疼痛。

那是8月23日深夜，张治中吃了一点粥，在椅子上略靠了一下。他想到第九十八师已划归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指挥，应该去看一下，商询对该方面登陆敌人的作战方案，并指示机宜。一想到这些，立刻起身，带上也在前线指挥所的胞弟张文心等人，星夜出发，于凌晨赶到太仓，见到刘和鼎军长，然后冒着轰炸赶了很长一段路，来到嘉定，费尽心机才找到罗卓英军长。一见面，罗军长诧异地问：“总司令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张治中一听知话中有音，反问道：“贵军既然划归我指挥，我应该来看看。”

罗卓英笑道：“总司令消息也太不灵通了，我们已归建第十五集团军啦。司令是我的老长官辞修先生……”

张治中这才知道，陈诚已不是军政部次长，他已经做了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自蕴藻浜以北地区的防务，统归第十五集团军，由陈诚指挥。他与罗卓英谈了半天，傍晚回到徐公桥总司令部。他是一肚子闷气，越想越费解：怎么发表了陈诚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连我也不通知？第十八军本归我指挥，为什么忽然划归第十五集团军？这究竟是何缘故……

当张治中从罗卓英处回到徐公桥时，得到电话说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到苏州。张治中想，两日

来，只顾前线，没有同后方联络，应该到苏州看看顾祝同，有许多问题需同他商酌，并可借此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

打定主意，张治中来到苏州，还没见到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介石，想一吐内心的苦闷为快，不料，蒋介石一接电话，就厉声追问：“你在哪里？”

“我在苏州。”

“为什么到苏州？”

“为着左翼作战，亲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到苏州来了，所以来问他商量问题。”

蒋在电话里大声地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

张治中呼地一下涨红了脸，心跳加剧，仍试图解释：“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我不知道他已划归第十五集团军陈辞修指挥了。”

电话里的声浪越来越大，如风声雨声刺激着耳廓。蒋介石根本不听张治中的申辩，只是一味地斥问：“为什么到苏州？嗯，为什么到苏州？”

一股压不住的怒火直冲脑门，张治中索性厉害起来：“委员长说该怎么办？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究竟要怎么样？”

电话那边又传来粗厉的叫喊：“你究竟要怎么样？还问我怎么样！”一下就把电话挂上了。

张治中听见电话里没有了声，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太阳穴上青筋暴起，双颊微微颤抖，满腔怒火无处喷射，气得把听筒咣当一声摔在电话机上。他走出房门，听着远处的隆隆炮声，牙齿咬得咯咯响，鼻孔煽动。他伤心透了！“八·一三”之战，他自信毫无错误。尤其以一个总司令的地位，大胆而勇敢，开战以来一直在第一线，亲在叶家花园的水塔上督战。至于上海未能一举占领，统帅部失机在先，三次叫他停止攻击！后来，大战展开，除陆军外，又没有有力的空军配合。在开战前，蒋介石问过他：“有没有把握？”他曾答复：“一定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而开战以来，根本就没有这些条件……他自问道：“我是临阵脱逃吗？为什么不能谅解，反向我生这样大的气呢？”

由于日夜指挥策划，四处奔波，他的体力已疲惫不堪，再加上精神上的苦闷，他决心辞职，提出职务由顾祝同兼代，如顾不愿，请朱绍良继任，或将第九与第十五集团军合并，由陈诚统一指挥……

张治中的辞职请求迟迟没有批准，但陈诚已投入了上海的指挥。

陈诚形象地告诫官兵：登陆敌人使用轻重机枪，都

用“啪啪啪”三发的点来考验我们，意思是问你“怕不怕”，我们应还以两发的点放，表示“不怕”，“不怕”！敌人听到后就不敢进攻。如我们连续不断地“啪啪啪”乱放枪，就等于说“怕怕怕怕”。敌人知道我们是新兵，无作战经验，待我子弹放光后，就猛烈反攻。

9月11日，日军主力进攻杨行；14日，陈诚到刘行日夜指挥作战。日本援军在吴淞等地强行登陆，国军全线退守。最高统帅部决定再调整部署：司令长官，蒋中正（兼）。副司令官：顾祝同。陈诚升任左翼军总司令，统辖原有的十五集团军和薛岳的十九集团军。

经过几次周折，张治中的辞职报告得到批准，并发布了调任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命令。敌人广播说是张的建议不被采纳，而且与陈诚闹意见，所以辞职。

回到南京，蒋介石约他吃饭。饭间，各自谈些题外的话，蒋似对前次的不愉快已忘却。张治中却不然，心里一直烦闷。他请求回家休养。蒋介石答应了：“好，但你先就了职再走。”

于是，张治中遵命先就了管理部部长的职，随即带着一个困乏的身体和一种落寞的心情，回到他的家乡洪家疃了。

### 长腿将军收拾韩复榘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在西安事变中引起蒋介石猜忌的刘峙，又被任命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从开封进驻保定。刘峙从失落的阴影里走了出来。

这时，南口战役已经打响。上任三天的刘峙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南口方面吃紧，我已派卫立煌率第十八、八十三、八十五师前往增援，平汉方面，望你火速发动佯攻，以行牵制。

刘峙接电后，说不上是紧张，还是兴奋，立即召集部下商议出兵。他当即命令孙连仲抽调一个旅，以一部威胁坨里一带的日军，并警戒侧翼，以主力向五平口千军台之线佯攻。同时督率各部按他的老一套战术，沿线构筑工事，等候敌人来犯。

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牌，守在电话机旁听着前方的消息，闲得无聊便翻来复去看自己的大手，仿佛要从中看出个阴阳八字。

8月25日，战斗开始。刘峙走到巨幅军用地图前，指头随着敌军的进攻路线推移。越往前推，他的神色越紧张，额头冒汗。日军先集结了一个师团，佯作中央突破，与孙连仲部隔河对峙。到了9月上旬，日军突然变更计划，从固安偷渡永定河，以飞机大炮猛攻右翼万福麟部阵地，只用一天功夫，就渡过琉璃河，将万军打垮，绕过正面守军，直插保定。刘峙顿感形势严重，准备在

保定附近与日军会战。他令关麟徵军加强新安、槽河头、满城的阵地，拒敌南下。关部以三个师的兵力配备于十公里长的阵地上，因而兵力不敷，准备尚未就绪。9月20日，徐水东西一线阵地被敌突破。21日清晨，日军开始攻击白洋淀至满城之间的主要阵地。在敌飞机与炮火轰击之下，工事多被摧毁，是晚阵地被突破。24日，保定即告失陷。刘峙带上大小太太，坐上车，一口气逃到石家庄。可没过两个月，石家庄又陷落。蒋介石气得大骂刘峙“饭桶”、“老朽”、“不堪重用”，命他将指挥权移交商震、黄绍竑，卸职回开封。此次溃退，刘峙丧失地，狼狈不堪，被国人讥之“长腿将军”。

仅半年时间，整个华北几乎全部沦陷。

抗战之初，蒋介石命韩复榘指挥山东军事，承提黄河防务。但韩一心只想保存个人实力，在日寇仅以少量兵力进攻山东时，韩竟不加抵抗，擅自撤退。蒋介石决心处决他。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到开封召集北方将领会议，刘峙也接到会议通知。见蒋介石满脸杀气，刘峙不由胆战心惊，怕惩戒的悬剑落到自己头上。直到钱大钧来找他，叫他开会时坐到韩复榘旁边，以防有变，及在门外设伏等，刘峙才确定这次惩罚的不会是自己，一颗心才落到实处，走进会场时又挺起胸脯，拿出往日的威风。

到第二道门时，韩的随员被通通留下。刘峙和韩复榘说着笑话。刘峙明知故问：“韩青天啊，听说你开会问过，到齐没有？不到的举手，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韩复榘哈哈大笑，回道：“听说你讲过，这毒气分三种：一是毒气，二是毒瓦斯，三是瓦斯气，大概不假喽。”

刘峙尴尬一笑：“彼此彼此，英雄所见略同嘛！”

他们走到副官处，见墙上贴着通知：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武器交副官处保管，给予临时收据，候会议完毕后凭证取回。韩复榘本不满意，但见别的将领都将枪支放下，他也就把随身的两支手枪掏出交给副官处，随手领了存取牌号，进了会议厅。

不多时，蒋介石披着黑大氅，冷冷地走了进来。众将领立刻肃静，唰地一声站直敬礼。蒋介石点头挥手，大家才坐下。韩仪宣布：“蒋委员长讲话，大家欢迎！”一阵掌声之后，蒋介石干咳了两声，慢慢说道：“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的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我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

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是你负担!”

韩复榘一向以老资格傲上,并没被蒋介石的话吓住,反而毫不客气地顶了上去:“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请问蒋委员长,南京丢失是谁的责任呢?”

蒋介石早有防备,没等韩复榘说完,就指着他厉声说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问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复榘拍拍旁边刘峙的椅把,莞尔一笑:“好,不说南京,就像这位刘司令长官,不也丢失了保定和石家庄……”

刘峙急得一头汗,连忙说:“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我……”钱大钧怕他只顾解释,误了大事,直朝他使眼色,“咯咯”地清喉咙。这才令刘峙想起自己今天担当的角色,立即脸上陪着笑,拉住韩复榘说:“委座正在火头上,他的脾气很坏,万一生了气,可了不得,你我到外边休息一会儿再说吧。”起身劝韩复榘走出会议厅。韩复榘不知是计,还在大声大嚷地申辩。一出楼门,见院里有一部小汽车,刘峙当下亲热地说:“这是我的小车,你先出去玩一会儿。”他又对上来的几个军统人员说,“这是韩主席,你们好好伺候!我还要参加会,回头再见!”说着,将韩推进车,砰地关上车门。韩复榘刚坐下,汽车就出门,前边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围了过来,对韩复榘说:“你被逮捕了,这是委座的逮捕令!”

1月19日,由何应钦、何成浚、鹿钟麟分别担任审判长、审判官,在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会审,韩复榘始终不说一句话。审判官宣布韩复榘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派鸦片等罪行,问韩有何申辩,韩复榘仍然一言不发。到24日晚上7点左右,有个特务到韩的房间,说:“何审判长请你谈话,请跟我去。”

韩跟了出来,刚下了楼,只见院里尽是持枪荷弹的特务,知道大事不好,就说:“我脚上鞋小,等我回去换一双鞋再去见何审判长。”他刚返身,楼上特务冷笑一声:“你还想走!”举枪就向韩打去,连中七枪,韩当时倒在血泊之中。回报给蒋介石,蒋却生气起来:“他是二级上将,不应该打他的头部……”

刘峙这次受惊不小。因他与韩复榘的确同病相怜,不但连失数城,在西安事变时韩曾通电支持过张杨……韩复榘被处决了,刘峙又惶惶不可终日。他还了解到,与韩复榘合谋倒蒋的刘湘,在韩被扣时,正在汉口住院治疗胃溃疡病。蒋介石派何应钦到医院去见刘湘,告诉他韩复榘已被扣押。刘湘知反蒋事已泄露。在何应

钦走后十分钟,刘湘大口大口吐血,昏迷不醒。三天之后,刘湘死去。

刘峙越想越怕……

### “大元帅的袖珍本”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的军政领导机关大部分迁移武汉。这年春,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陈诚任总司令。同时他还兼任军委会总政治部部长、湖北省主席、航空委员会委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职。国民党内部称他是“委员长的替身”、“第二号人物”。武汉的外国记者因其身材矮小,又唯蒋是从,给他起了个有趣的绰号,叫“大元帅的袖珍本”。

陈诚对蒋介石奉之神明,无论公私场合,对蒋都推崇备致。说来也怪,他不仅性格如同蒋介石,后来连走路姿势说话语调,甚至生活细节上也成了“小委员长”:不喝茶,不抽烟,不吃大荤。他在作报告时,一提到“委员长”三个字,总要肃然立正,将那特制的高底深筒带有铜扣的皮靴碰得脆响。台上立正,台下听报告的均得跟着立正。往往在一场报告中,他要多次提到“委员长”,这样,台上台下就会不断发出咔咔的碰鞋声。每当他带人进入自己办公室时,一见到蒋介石像,也要立即行注目礼。他接电话时也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要是蒋介石来的电话,他总是马上肃立恭听。所以,人们只要从他立正听电话的姿势便可知是在与蒋通话。

对一般国民党元老和军政前辈,他也不敢怠慢。行文总是以字称公,如对程潜称颂公,对李宗仁称德公;对文职大员学者名流尊敬和蔼,行文以字称先生,如对孔祥熙称庸之先生,对胡适称适之先生,且多次叮嘱部下,对各界社会名流要格外礼遇,以免招至物议。对于各军将领,年长者称公,同辈者称兄,只是对下属却常发脾气。另外对能与自己抗衡的同僚比较刻薄,常加指责刁难。

陈诚能成为“第二号人物”,自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凡会带兵、能打仗的人,不论是亲还是疏,他都一样重用。所以,他那庞大军事集团中的将领,虽然主要是黄埔的,但也有不少是保定的,陆大的,日本士官的,云南讲武堂的,还有来自杂牌的行武军官,而且籍贯各异。

用人不疑是陈诚的一个长处。他不轻信谗言,也不容许部下互相攻讦。有的人在他面前进谗,说别人的坏话,他总是当即制止,并告诫说:“他的事有他的上级去管,用不着你来报告。你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但是陈诚也有为部下护短的毛病。例如,九十四军



军长牟庭芳，被人告发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时，大肆贪污腐化，蒋介石欲制其罪，陈诚便以“牟庭芳在天津病笃”为借口，搪塞过去，不了了之。

陈诚不喜欢搞什么排场，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还算比较廉洁奉公。抗战初期，有一次，他到巴东视察，六战区留守处主任温良发动当地县政府组织欢迎，大摆筵席，满桌海味。陈诚一看便大发雷霆：“怪不得老百姓要骂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一点也不错。抗战期间，大后方生活那样困难，你们从哪里搞到的海味？一定要彻底追查！”温良因被骂得狗血淋头，后来急得双目失明。

### 远航日本投纸弹 险伤蒋座机

钱大钧就任航空委员会主任以后，对空军的军令、技术、总务、防空四个厅重新安排了人选，并任命了辖属三个军的司令。1938年4月29日，日军出动了四十余架飞机，轰炸武汉三镇，中国空军起飞迎战，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被击落二十一架，国民党仅损失九架。事后，钱大钧异常兴奋，想出一个远航日本本土夜投“纸弹”的计划。

蒋介石开始一听吃了一惊：“飞到日本本土，我们的飞机能行吗？”

钱大钧考虑得很周密：“如果挂炸弹的话，肯定飞不到；所以只能带纸弹。”

“何谓纸弹？”

“纸弹即宣传弹。我们要在宣传单上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害人害己的暴行，我想这比炸弹的威力还大。”

蒋介石同意了。“不妨一试。但计划必须周密，万无一失。”

飞机于5月20日凌晨2时45分飞临日本九州上空，躲过探照灯的照射和高射炮的射击，在东京、大坂、长崎等地上空，将二十万张传单投掷下去。传单上写的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应该互助合作，以维持亚洲和全世界的自由和平。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华迷梦，迅速撤回日本本土。”飞机胜利返航，此事弄得日本朝野皆惊，防空部队也慌了手脚。它激励了中国兵士的士气和民心，并受到国际上的赞誉。执行飞行任务的飞行中队长徐升焕返回武昌时，钱大钧穿戴一新，笑咪咪地到机场迎接，并让他的女儿向英雄们献花。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领导人董必武等也到机场欢迎，并向空军英雄赠送了锦旗。徐升焕告诉钱大钧，日本本土防空设施相当幼稚，中国飞机撤完传单返航时，眼底下的日本城市才实施灯火管制。钱大钧

感叹：如有足够的飞机去抄了他们的后路就好了。

钱大钧也因此受到嘉奖。

可好景不长，钱大钧改不了贪财的毛病。当宋美龄把一笔特别费批给他犒劳有功人员时，他却把这笔钱只分给了少数几个高级人员。有人将此事向蒋介石告密，蒋一怒之下，下令将钱大钧革职查办。钱大钧在成都一下失意近两年。

刘峙也因飞机的事，一场虚惊。

春天的时候，蒋介石又飞向开封开军事会议。刘峙接到通知后，与幕僚商议如何布置警戒。有人突发奇想，建议发个假警报，叫大家都进防空洞，做到彻底肃静回避。刘峙被前些事情弄怕了，遇事都没了主意，只要众人说行，他也就认可。而他越是小心翼翼，越发错误百出……

白崇禧的座机先到，正想着陆，就看见地面的高射炮对空猛打，炮弹凌空开花。白崇禧疑是日寇已攻占开封，急令座机掉头高飞，同时用密码与地面联络。刘峙一听，糟了！这才想起忘了通知防空部队。等他急令停止炮击时，蒋介石的座机已徐徐降落。

刘峙慌忙前往晋谒蒋介石，走到蒋下榻的官邸，就上来几个侍卫，不容分说将刘峙五花大绑起来。刘峙看见张治中的身影一闪，急赤白脸地喊：“文白兄，我是经扶啊！”

张治中闻声止步，哼了一声：“晓得是你，抓的就是你！”

“别开玩笑，”刘峙还没反应过来。“我又不是韩复榘，从未违抗命令呀！”

“你比他更重，你要打委员长，不绑你绑谁？牵进去！”

侍卫把他牵到来开会的钱大钧面前。刘峙一个箭步上前，苦笑道：“莫尹兄，我是经扶，我一向忠心耿耿，怎敢打委员长呢，你替我说说情吧！”

钱大钧抓耳挠腮：“你祸闯大了，我无法可想，有话直接找委员长去说，由他发落吧。”

侍卫把刘峙带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一见刘峙被五花大绑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便背过身去问道：“开炮打我们的座机是何用意？”

刘峙申明原委，蒋介石指头点着他说：“你怎么越来越糊涂！你这样带兵还了得！”他不愿多说，朝房外挥了挥手。张治中明白蒋的意思，上来给刘松了绑。出了门，刘峙才顺过气来，又朝张治中笑起来：“原来文白兄是唱的苦肉计呀，感谢感谢！今晚我请客！”

张治中摇头叹息：“你呀，你呀……”他咽下本想说



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对日抗战讲话时的蒋介石。

的一句话。人们都在背后骂刘峙是“刘木大。”

### 侍从室琐事

1938年11月,岳州失守,日军逼近长沙外围。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电示:“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在“焦土抗战”的错误政策下,造成了举国震惊的“长沙大火”,大火延了三天三夜,造成了灾难性损失。

张治中也受到革职留任的处分。处理完善后,他辞去湖南省主席职务,前往重庆。见到蒋介石,他表示想作一短时间休息。蒋没同意,说:“还是要做工作嘛!”到第三天,蒋约他吃饭。

张治中看了看周围,在座的约有二十位客人,都是党政军高级干部。而他的座位却摆在首席,心中更是不安:我是解职之人,为何受此优待?莫非蒋也认为我不该受此处分……他毫无滋味地吃完饭,客人要告辞时,蒋介石把他留了下来。

蒋介石征询他的意见:“你愿意提任中央党部训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还是愿意提任侍从室主任,愿意做

哪样?”

张治中毫不犹豫:“训练委员会是要多讲话的,我现在不方便讲话,我愿意到侍从室服务。”

蒋介石很高兴,连说:“那好,很好!”

于是,1939年3月16日,张治中就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事。

侍从室除了帮助蒋介石料理案牍,陪宾客以及随蒋出发各地,还负有保卫蒋介石之责。这是由一个警卫大队和着便服的侍卫官和卫士组成的。这些人员都列入侍一处第三组的编制内。侍从室自1936年改组后,由钱大钧担任侍卫长,它的规模不算很大,但地位已凌驾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之上,蒋介石的统治权力更为集中,已经基本上形成蒋家王朝独裁统治的“内廷”了。

张治中上任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很得蒋的赏识。

蒋介石的个性很强,往往对一件事会有自己的成见,所以一般人轻易不敢直言。张治中敢于直言又常被采纳,是蒋介石看出了张治中的一片忠诚。张治中陪蒋

介石到了柳州，然后随蒋从桂林坐火车去开会，于早8时抵达，住羊角山。到11时，忽来报警，但接着没了消息。张陪蒋吃午饭，吃完了，也没有听到情报，张有些蹊跷，蒋躺下休息了。张治中从楼上下来，刚把上衣脱了，忽又想起：何不打电话问问防空司令部呢？他刚把话筒拿到手，就听得一片嗡嗡的声音，敌机袭来了！他急忙穿上衣服，叫副官速请蒋下楼。这时，敌机业以临头，张治中一看周围也没有好的防空洞，只有一个一丈多高一丈多深的天然石洞，便招呼蒋进去躲避。抬头一看：敌机共五六十架，九架一批，分批来袭，集中投弹，数百枚炸弹落下，爆炸声震耳欲聋，洞内泥土被气浪推得翻滚，硝烟弥漫。张治中与蒋介石坐在里面，躺在地下的随从人员，一个个全都被泥土掩埋了。张治中判定，一定是因为他们的行止被敌特探测到了，才来轰炸的。他庆幸敌机没有炸火车，如果那样就更险了。随从副官也在说：这一次比前一次在武昌省政府防空洞所受的敌机威胁更厉害。

大轰炸之后，蒋介石从石洞里站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扭头看了一眼张治中，又去主持军事会议去了。

蒋对张治中越来越放心，放手让他去处理一切事务。关于军事方面的人事问题，按惯例，凡是团长以上，特种兵在营长以上的任免，必须经委员长核准。张治中作主，和何应钦商量决定，凡是由铨叙厅报上来的，他只把少将以上的呈上候批，其他的，都由张批上“奉谕照准”，再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种处置，对蒋的职权也顾到，同时又减轻了蒋的负担。还有一次出去看到四个人坐一辆军用三轮车，内有一人是着便服的，被蒋看见，当即命令“把那个人抓来！”侍从副官奉命去办了，回来报告经过，蒋当即批示：将那个搭三轮车的人枪毙！副官看了，吓了一跳：为这点小事至于枪毙吗？他急着来找张治中。张治中看了批示，说：“我负责任，把这张批示交给我吧。”张就在原批示后面又写了一行字：此人有无死罪，应交军法执行总监部依法审讯。同时，张治中电告军法总监：“这不过是委员长认为一辆三轮车不能坐四个人，搭车的又是老百姓，一时动了气，并非了不得的事，顶多问问，关几天也就够了。有什么事我负责任。”到第三天，宋美龄忽然请张治中去，一见就问：“文白兄，听说委员长要枪毙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学校的学生，并没有犯罪呀！你想想办法，好吧？”张治中笑着把办理经过说给她听，宋美龄也满意地笑了。

张治中也是胆子越来越大。在一次军事汇报会上，张治中痛切地指陈各方面的高级干部思想保守，惮于改革，不求进步，充满了畏难苟安的习气，毫无创造进

取的精神，一天天老大腐败下去，认为如此下去，前途不堪设想。言辞激烈、尖刻，举座为之瞠目。蒋介石也认为他说得过分了，皱眉头赌起气来：“大家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有一个人决心累死算了！”

### 陈诚——“陈腔滥调”“诚者斯言”

在侍从室，张治中和外面的将领接触最多的要数陈诚了。

他们私人感情虽好，甚而主张内部改革的意见也很接近。但在对中共问题上，却始终无法一致。张治中一贯主张联共主和；陈诚则一贯地反共主战。

主政湖北的陈诚，提出有名的“三大公开”。即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这话原是黄埔军校时邓演达说的，后来国民革命军师长严重将此话付诸现实。陈诚是邓、严的属下，深受熏陶。严重看重陈诚的才能，在当年的日记中就写过：“营长陈诚来谒，畅谈两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陈诚遵循“三大公开”，标榜廉洁政府，先后枪毙了几名贪污犯。这在国民党贪污成风、官官相护的情况下，不能不使人有“石破天惊”之感。他谈及官吏贪污往往怒目横眉，颇有必欲除之而后快之慨。他公开揭露过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早年在广州包揽市区粪便大发其财的臭史；也公开骂过孔祥熙。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因其部队在淞沪抗战时伤亡惨重，抚恤数量大，曾下了一道手令，命令每连空缺五名。国民党军队内吃空缺是常见事。这件事传到陈诚耳朵里，他不顾钟松是他同学又是同乡的私情，将钟松关押入监，自此钟与陈势成水火。

陈诚致力于省政，每天都要忙到夜12点以后才就寝。第二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很快赶到办公室，常此以往，侍从人员有些吃不消，但又不明言，后来他慢慢发现了，就说：“你们青年人早上可以多睡一会，不能和我比，只要不起得太晚就行，6点半可以吧？”中午午睡，他只在藤椅上闭眼十几分钟，很少超过半个小时。他既不抽烟，也不下棋，唯一爱好的是在晚上临睡前，临摹岳父遗留的柳公权的字帖。注意修心养性，他对部署的意见一般也能接受。如他爱作长篇讲话，往往让大家在灼热的太阳下站上一两个小时。有人利用他的名和字，作了个幽默的对联：上联为“陈腔滥调”，下联为“诚者斯言”，横批为“辞不多修”。陈诚知道后，并未生气，只是说：“很好，以后我少说两句就是了。”

同时，他对反共一直抓得很紧。他在湖北搞白色恐怖，抓共产党的嫌疑犯，搞“感化教育”。有一次竟把第十救济区的一个话剧队十几个进步青年一网打尽，连带有婴儿的母亲也被抓进牢里。

他与叶挺来往频繁,很想把叶挺拉进他的反共营垒。

叶挺系保定军校六期毕业,一度留校工作,当过陈诚的区队长。大革命时期,二人又共过事,陈诚对叶挺深为敬重。叶挺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后,一直蛰居国外及香港,抗日救国是他从“九·一八”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抗战开始,他报国情殷,即与陈诚取得联系。陈诚欢迎叶挺速来武汉,共商抗战大计。叶挺到达武汉,陈诚竭诚款待。最初,陈诚建议叶出任国民革命政府职务,叶一时未决。后经周恩来多方考虑,建议为了国共两党更精诚密切地合作,应该将十年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南方湘、赣、粤、浙、闽、鄂、豫、皖,八省和其他地带的红军游击部队集中改编为抗日武装之事。在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官吏看来,红军游击队的存在,是他们的心腹之患。蒋介石起先想委派自己的人去改编这支队伍,但又估计共产党不会同意。听陈诚说叶挺愿意出面,蒋介石认为叶是非党人士,在国内有威望,正好可以得用他来收编游击队。于是,在没有征得中共中央正式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布“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由于对叶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还不十分清楚,对叶当军长一事一时难以定笃。叶挺也希望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如果不赞成,他仍可辞职。洛甫、毛泽东表示: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接受党的领导,而不受国民党的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表示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愿到延安当面汇报。

1937年10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叶挺及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蒋介石说:“南方游击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办,延安提出的干部名单我不能同意。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不能由共产党委任师长、旅长。”

叶挺力争:“现在大敌当前,先改编部队开赴前方作战要紧,其他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蒋介石不依:“这不行!这些游击队能不能开到前线打日本还是个问题,我估计他们是不会调开的。”

叶挺仍想说服蒋介石:“把游击队改编起来可以增加抗日力量,对安定后方也有好处。”

蒋介石反而火了起来:“如果再敢扰乱后方便是破坏抗战,我要剿的!你们决不能留在后方。”

叶挺碰了钉子,又向蒋介石要求拨给新四军军费,蒋介石没有应允。叶挺站了起来,愤怒地说:“我当不了这个军长,请予辞职!”

蒋介石这才说,具体事可找陈诚商量。

看来,皖南事变的根子早已埋下了……

### 顾、叶本是保定同窗

国民政府撤至武汉后,顾祝同正式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并兼江苏省主席、战区经济委员会主任、第二十集团总司令等职。1938年1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也编入第三战区,直属长官部。顾祝同既能控制中央军,又能和杂牌队伍搞好关系,故在军界有“馭将之才”,但也有人议论说,不在有才无才,而在“有财无财”。第三战区在抗战八年中除在浙赣线一带有几次战役与日军接火外,其他多数部队没有和日寇发生较大战斗。而第三战区又是中国的经济中心,顾祝同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建立战时经济为名,大搞走私贸易,囤积居奇,发了国难财。

1940年10月间,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别墅召集他的心腹大员,商谈军国大事。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戴季陶、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

蒋介石首先发言:“我们,很奇怪……去年底全国对共产党军队进行一次大打击,各位都听到报告,当时消灭共军多少万人,怎么现在共军还有五六十万?上月共产党在北方打了一阵百团大战,名为百团,实际上不止一百个团,看来战果不小。各位说人家夸大,我看,共产党一个团有几千人的,有上万的,人家一个旅就有十多万人,一百个团,恐怕少说有百来万,这还了得!当初毛泽东、朱德他们在江西不过十多万兵,加上徐向前、贺龙各地方的红军,也不过三十万,我们就打了十年,还不能完全消灭他们。现在,人家到了百万之众!再不赶快想办法,哼,恐怕将来,我们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经过一番筹划,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一道凶横的命令,要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并诡称“中央军沿途负责掩护”。9日,蒋介石发表了“着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限期北移”的手令。

顾祝同成为这场阴谋的主角。在调兵遣将的同时,制造谣言,竭力诬蔑新四军无意北撤,将要“南下”,看来真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甯”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等等。他经常利用这些“情报”,要求各部队对新四军“严加防范”,做好战斗准备。并三次通令各部队加强对皖南新四军的监视和警戒。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其部队九千余人,从皖南云岭等地出发开始北移。叶挺沿途见国民党军队驻扎很多,心里不免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突然事件。

他去见顾祝同。顾和上官云相都是他的保定六期同学，此刻顾很客气：“要求新四军北移，这是委员长的命令，我们是军人，只能服从，绝对不敢在中途阻拦，这是掩护。”

叶挺要求改变北移路线，说日本军队早已沿江烧了船，新四军无法通过。

顾祝同陪着笑说：“这很好办，贵军从我军防地附近渡江好了，就走泾县、茂林这一带吧。”

叶挺返回来对项英讲：“这一条路上国民党军布置严密，我们是否从另外地区通过？”

项英似乎没有更多思索：“人家答应了，我们又不走这条路，这样不大好吧？大家还保证掩护……”

叶挺疑虑重重：“我们可以把后勤部队一小部分从这里过去，主力部队决不能从这里走，防止陷入人家的包围。”

项英想了一下：“我看，先让后勤部队从这里过去，如果平安无事，我们主力就从这里过去，如果发生事故，我们再决定改道。”

当时副军长项英是党的领导，叶挺只好服从。于是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去通知顾祝同，说明新四军北移的时间地点。顾祝同一听满心欢喜，立即和上官云相等连夜增调七万多人来设包围圈。上官云相不无担心：“顾长官呀，咱们把军队都集中到这里，万一新四军从别的地方转移，我们岂不是白忙一气？”

顾祝同很自信：“听袁国平多次来讲，他们的部署已定，不会再改变的。”

国民党军队从1941年初起就在泾县茂林一带崇山峻岭之间，设下重重包围圈。可是等了等，不见新四军到来。直到1月6日，新四军的后勤部队来到了。

国民党士兵惊奇地叫起来：“这就是新四军？才这点人马？不够吃的！”

还有的议论：“怎么那么多女兵？这队伍还能打仗？还说原来是铁军呢，我看像豆腐军！”

上官云相也着急了：“坏了！这是他们的后勤部队，你们没见！这么多骡马，只怕人家的主力从别处走了？”

顾祝同胸有成竹：“不一定，主力部队在后面。我早派人打听得确实确实，有电报来。”

上官云相问：“顾长官，他们已进入包围圈，命令开火吧？”

顾祝同手一摆，冷笑了一下：“心急吃不得热粥，让他们平安过去，人家是北上抗日嘛！打人家干什么！”上官云相会心地一笑，命令部队放过后面的后勤部队。

新四军的指战员们唱着悲壮的歌：“别了，三年皖

南！”他们走到茂林一带，只见悬崖峭壁，山势险恶。偶而风吹草动，便出现山前山后隐隐约约的国民党兵。

叶挺神经绷紧了：“不好！项英同志，咱们赶快从别处走吧，这里已经陷入重围了！”

项英固执地相信：“前面的后勤部队不是已经过去了吗？临时改道，这路也不好找啊……”突然，信号枪响，随即听到冲锋号声，国民党的八万军队冲了过来！叶挺只得率部反击。项英还催发电报询问蒋介石。等了许久，才得到蒋介石的几句空话：“已电顾长官查询真相。”

新四军被迫还击，血战七天七夜，终于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遇害，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1月17日，顾祝同把情况报告国民政府军委会，诡称：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4日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日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擒获，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

### 杀凶犯难御敌更难

蒋鼎文在西安沾花惹草，与胡宗南雌雄难合，于1914年12月调至洛阳，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司令。不想在此又与军统特务发生了矛盾。

他上任后整一年，在洛阳召集全省行政督察专员和县长开会，要加强地方行政管理。随同蒋鼎文来第一战区的少将参议艾经武在洛都饭店碰上了豫东专区的督察专员韦孝儒，便开玩笑地说：“品方（韦字），你脸上的颜色怎么这样黑，是不是被日本鬼子吓破了胆啊？”

韦专员揉了揉前额说：“老兄！我面部风尘之色，当然有与日寇周旋费心之故，但咱们自己内部的不法之徒也使人大伤脑筋啊！”

来到韦专员的房间，另一位专员张振江也来了。韦孝儒又谈起军统特务偷运毒品和他严惩不贷的作法。张从政多年，深知军统特务的毒辣，就劝韦专员遇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啦，千万不要过分认真，免遭这些人的暗算。

韦孝儒脾气耿直，多年从事教育，仕途屡遭挫折，却痴心不改，他听一笑：“我乃朝廷任命的四品正卿，没有天子的旨意，小小的东厂又能把我怎样！”

两人还是劝他小心为妙。

第二天，蒋鼎文和省主席李培基先后在会议上讲了话，并请各专员谈谈施政情况。韦专员又大谈打击贩运毒品的事，河南的地方官员本来就对毒品流入有切肤之痛，但平时敢怒不敢言，韦专员此话一出，满场掌声雷动。蒋鼎文也点头赞许。

以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员为名的军统大特务赵理君因韦扣了他的人又出此言，便动了杀心。

晚上，蒋鼎文在长官部行宴会，特为向韦专员敬了酒。韦喜形于色，喝多了，回到复旦中学住处倒头就睡去了。半夜听到有人叫门：“我们是警察局查户口的，请开门。”韦已清醒，拉开灯，看着自己的副官也起了床，毫无戒备地拉开了门栓。

忽啦一下，闯进四个蒙面大汉，用枪抵着他的胸口，低声说：“不许动，举起手来！”副官睡梦初醒，刚去抓枪便被缴了械。韦孝儒慢慢举起手，说道：“诸位乡亲，冤有头，债有主，大家要是缺钱花，就请说个数，何苦这样。”为首的蒙面人冷笑道：“今天我们是来算总账的！”一听这话，韦专员全明白了，他冲着窗外大喊一声：“救命——”“啊”字还没出口，就被大汉捂住嘴，塞上毛巾，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住在旁边的秘书和电台台长听到喊声，一出门就被守在门口的蒙面人抓住了。四个人被装上汽车，疾速驶向郊区，最后停在一口枯井旁。这时为首的蒙面人走到韦孝儒面前，嘿嘿一笑：“韦专员，久仰大名，不想在此相见！本人就是督导团别动大队长曹银屏。你杀了我们许多弟兄，今天我是来给他们报仇的，这就是你和军统作对的下场！”

曹银屏拉掉塞在韦专员嘴里的毛巾，问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们贩毒，国法难容，惩罚是我的职责。”韦专员镇静了一下，又说：“我是堂堂督察专员，你们胆敢私刑杀人，触犯国法！”

曹银屏用枪口敲打着韦专员的额头，嗤笑道：“你算个屁！杨杏佛、史量才不比你大？不照样死在我们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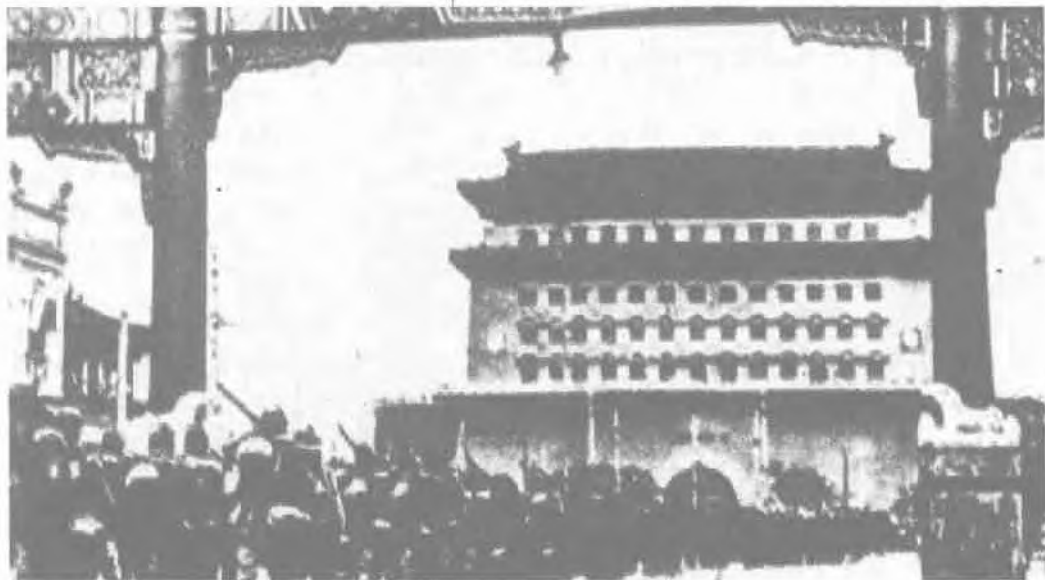
韦专员知道没有什么希望了，看了看其他几个被绑住的人，说了句：“此事与他们无关，把他们放了吧。”

“你别作梦了，想留个活口作证呀！”曹银屏说着，让人把韦专员架到井边，举起铁锤对准他的后脑勺就是一锤，然后头朝下推进井里。随后，其余几个人也被扔下井，用随车拉来的土把枯井填上。

韦专员失踪的消息，第二天便震惊了整个洛阳城。

蒋鼎文也被激怒了。他就任本战区刚满一年，就在家门口、会议期间发生这样的事，岂不是给他一个下马威！再者，这次绑架行动引起社会各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各种谣言四起，有些甚至造到了他本人头上。于是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动员全体军、警、宪、特，限期十天破案。会上警察局长介绍了案情，根据他讲的线索，与会者很快排除了图财害命和政治暗杀两种可能，至于其他可能则众说纷纭。蒋鼎文决定成立联合侦破组抓紧破案。省主席李培基会下找到蒋鼎文，两人到小会议室交谈起来。根据他们掌握的线索，进一步排除了政治暗杀的可能，集中到仇杀这一点上，并且排除了他们两人所能控制的各个单位，还根据张振江反映的韦手

日本侵略军进占北京城



下的人曾与督导团冲突过的情况,把目标缩小到赵理君手下人或胡宗南系统的洛阳劳动营身上。

蒋鼎文在西北与胡宗南结怨很深,另外,汤恩伯和蒋鼎文是对头,而戴笠与胡宗南、汤恩伯是穿连裆裤的,所以蒋鼎文也想敲一敲军统,煞煞这三个人的威风。他知道这些人也是背靠蒋介石的,如果没有蒋介石的支持,是难以查个水落石出的。所以,他计划的第一步便是传出话去,说此案系共产党所为,以取得蒋介石对侦破此案的支持。然后利用河南地方势力和社会舆论对重庆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韦专员在河南教育界颇有名望,各校师生群情激愤,纷纷罢课、请愿,甚至有学生到洛阳火车站去卧轨,以示抗议……蒋介石在重庆听到此事,起初不当一回事,后来舆论纷纷扬扬,电报接二连三打来,又听说是共产党干的,马上命令第一战区和河南省政府严处此事,凶手一经抓获严惩不贷云云,并派戴笠赶往洛阳协助破案。

蒋鼎文和李培基接到蒋介石的电报,正中下怀,马上发出布告悬赏缉拿凶犯。

戴笠一到洛阳,被安排在洛阳图书馆。李培基刚去拜访,赵理君和曹银屏就去了。戴笠和他们点点头,让他们在外屋等候。戴笠问李培基:“韦孝儒是不是和共产党有来往?”

李培基理直气壮:“我愿以省党部和个人名义担保,韦专员是党的老同志,决不会与共产党有联系。”

李培基走后,戴笠接见赵、曹二人。本来他俩想好,先在主子面前诬告韦是共产党,再慢慢道出真情,以求上司保护。谁知李培基抢先否认了韦是共产党的嫌疑,俩人自己先乱了方寸,站在戴笠面前,一动也不敢动。戴笠来火了:“校长非常生气,决心惩处凶手,看来韦专员是我党的老同志是不会错的。我这次来就是抓破案的,我问你们,这事是不是你手下人干的?”

赵理君知道事情闹大了,但事到如今,只有硬着头皮抵赖:“没有,我们手下的人决没有干!”赵曾帮戴笠办过不少凶案,认为他够忠诚,也就相信了。

第二天,蒋鼎文和李培基陪同戴笠接见了军统所属的各个组织的负责人。戴笠临走吩咐,一切听从蒋长官指挥。赵理君暗中叫苦不迭。

但是蒋鼎文开了几次破案会议都无结果,眼看十天的期限快到了,急得他坐立不安。盛怒之下,他把劳动营的刘亚招叫来追问案情,刘答不出就将其监禁起来,也算向胡宗南出了口恶气。

也就在第十天上,两个侦破小组的人在北门外酒馆喝酒,罚酒罚急了,一个人就拧着另一个人的耳朵要灌,嘴里还说:“你喝不喝?不喝,就像活埋韦专员那样活埋了你!”

调统局小组的人马上就问:“你怎么知道韦专员是

活埋的?”

曹银屏是另一个小组的成员,一听急了,打起马虎眼:“他喝糊涂了,胡说八道。大冬天刨个坑也得三个时辰,怎么可能活埋呢?”

晚上,调统局的人把这个消息汇报给蒋鼎文,蒋鼎文喜出望外,给了赏钱。后来洛阳航空站站长张明顺偶然发现机场南端的枯井被人填上了,他与张振江是同学,把情况一说,又报告了蒋鼎文。蒋派人去掘井,发现了韦和其他人的尸体。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案情再没有大的突破。

到了第二年的3月,一个小特务到当铺去当表,被老板认出是表店失窃的表,通知警察局来人将其逮捕。后经严刑拷打,小特务才将绑架韦专员的事一五一十说了出来,并在供纸上画押签字。蒋鼎文和李培基拿到口供,立刻布置宪兵准备行动。

赵理君夜间发现小特务不回,自知处境不妙,马上与曹银屏逃到洛阳东部一个四川老乡家里。但此人又是蒋鼎文的爱将,见宪兵包围上来,只好将两个罪犯交出。

戴笠知赵为元凶后,又气又急,跑到蒋介石面前述说赵的忠诚和能干;给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写信,求其从中斡旋;随后亲自跑到洛阳,当面向蒋鼎文求情,想把案子接过来由军统自己处理。蒋鼎文惧于上下压力,未敢批准。

汤恩伯果然向蒋鼎文施加压力,蒋鼎文也就犹豫起来,只是暗地请示蒋介石如何处理。而蒋介石不置可否。一两个月过去了。李培基看出蒋鼎文的暧昧,夜长梦多,便趁白崇禧来视察之际,请他帮忙。又鼓动教育界要人给陈果夫写信,(韦专员生前加入过C.C.)转呈委座,定要严惩凶手。白崇禧和陈果夫果然向蒋介石作了反映。蒋介石由于戴笠的求情,弄得左右为难,只好拖下不办。一等又是三四个月。赵理君越发得意,竟心血来潮,起草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历数他过去为蒋介石暗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的经过。这份电报由其姘妇邓曼来探监时,带出去给了重庆。

仅过了几天,蒋介石给蒋鼎文回了一个电报:“杀人犯赵理君等人着即枪决。”蒋鼎文得到电报,马上命令军法部门执行。

虞典书将军亲自坐堂提审犯人。他问罪犯:“现在判处你们死刑,你们有什么遗嘱没有?”

赵理君傲慢地说:“谁敢判我的死罪?蒋鼎文龟儿子配判我的死罪吗?”

“是蒋委员长判你的死刑。”

“有手谕吗?”

虞典书将蒋介石的电报念给赵理君听,赵呆呆地听着,愣了半天才喃喃地说:“是他要杀我,我有什么话说呢?”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击南京之日，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少将司令官林遵带领全舰队1300名官兵，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

起义使国民党军长江防线加速土崩瓦解，人民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

5月18日，毛泽东、朱德驰电赞誉：

庆祝你们在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你们率领二十五艘舰艇，毅然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家庭来，这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在巡洋舰“重庆”号于二月间起义并被国民党反动派于三月间炸毁以后；四月间又有你们的大规模起义，可见中国爱国人民建设自己的海军和海防的伟大意志，不是任何反动残余所能阻止的。

毛泽东

朱德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

福州，是林遵的老家，他的叔祖林则徐是他所尊重、敬佩的民族英雄。他一心想像乃祖一样，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

1929年，林遵考取海军赴英留学生。毕业后，还曾去往德国、美国、日本参观、考察。后来他还被选派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担任特使团海军武官。

1947年年底，林遵担任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海防不过是虚名，实际上是配合汤恩泊率领的54个师的兵力，加强千里江防，妄图阻挡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

林遵把舰队司令部设在离南京百里之外的镇江。

他常独处迎江路舰队司令部的三层楼上，眺望长江，思绪萦迴，苦闷烦忧。

中共中央注意林遵了，周恩来指示地下党郭寿生联络，通过他策动林遵起义。

郭寿生原是共产党员，1927年上海武装起义时，曾策动驻沪舰艇起义。他是林遵在烟台海军学校的同学。

1948年秋天的一个上午，郭寿生穿着雪白的海军服，佩带海军上校肩章，登上停泊在镇江的第二舰队旗舰“惠安”号。

林遵赶忙迎了出来，故友重逢，分外高兴。

浅斟慢酌中，林遵吐露了不愿打内战，担心成为千古罪人的苦恼，郭寿生哈哈一笑，“苦海慈航，佛度众生，守着金山寺，我们何不去畅游一番。”

林遵觉得郭寿生话中有话，便约定由他作东。

这天他们来到金山寺。在慈寿塔前，林遵故意淡淡

# 1949·

## 南京江面

地说：“有何见教？”

郭寿生说：“出家人不打诳语，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中国共产党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派人来叫我归队，并且叫我转告你，希望你站到人民方面来。”

林遵沉思良久，郑重求教说：“怎么做？”

郭寿生说：“只有一条路可走：起义。”

林遵默默地点头。

林遵已多次反复思索过了，中国海军的历史给了他启迪。

在中国军人中，海军历史是顺应潮流，趋向进步的。

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引退下台，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声明以中共八项和平条约为基础，国民党、共产党双方进行和平谈判。

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嘴脸终于暴露，和谈破裂。林遵坚定决心，率领舰队起义。

上海地下党认为已到决定性时刻，党的代表必须和林遵直接会面。约定林遵与林亨元教授在金山寺会面。

林亨元诚恳地说：“中共中央同意你们选择在大军渡江时起义。希望你们起义后配合解放军渡江，尔后，以你们舰队为基础建立华东等区海军。”

林遵也坦率说了自己的观点：“配合渡江，我们可以做到不向北岸和渡江船只开炮，但是不能调转炮口往江南打，因为这里老百姓多，容易误伤。我们起义是为了长江两岸老百姓免于遭殃，我们按兵不动就是协助渡江。”

林亨元没有强求林遵，说道：“你们起义，我们表示欢迎。至于是不是调转炮口打阻击渡江的国民党军队，



○杨肇林

# 上的壮举

请你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吧。”

林遵向林亨元详细介绍了二舰队情况和起义准备，商定由“三野”派人来镇江联络，共同合作，实行起义。

“重庆”号起义，胜利驶向解放区，使二舰队爱国进步的官兵更加按捺不住，跃跃欲试。

4月19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突然登上“惠安”号，命令林遵立即赶去芜湖，阻击人民解放军。

林遵推托说：“惠安”号主机正在检修，无法开航。”

桂永清严令林遵乘“美盛”号登陆舰，于当天下午四时以前起航，到芜湖后换乘“永嘉”号督战。

林遵想：“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能硬顶，不能使整个舰队起义中途夭折，只好从命。

4月22日清晨，桂永清又电令林遵将安庆、芜湖所有舰艇带回南京，并限令23日拂晓前赶到。

林遵正要赶回南京，组织起义，便率领“永嘉”、“永修”号军舰立即下驶。桂永清从午夜以后，接连三次来电催促林遵“务于5时前到达总司令办公室报到。”

林遵赶到南京海军总司令部，桂永清迎了出来，急不可待地说：“你可来了。国民政府已经迁往广州，本人马上乘飞机去上海。现在把集中在芭斗山锚地的舰艇，

交你指挥，带到上海。你应当为党国尽忠。”

林遵故意说：“我个人难以当此重任，请总司令亲自坐镇。”

桂永清连忙摇手说：“大可不必，你一人足矣。”他许愿说：“只要你把舰队带到上海，哪怕只剩下一条舰，我也要报请总裁晋升你为海军中将，任海军副总司令，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林遵为了不使桂永清起疑，再三推辞，坚请他留下指挥。桂永清急于乘飞机赶往上海，声色俱厉地向林遵说：“好了，你赶快回舰吧。”

林遵离开时，作战署署长王天池又交给他一封桂永清事先写好的亲笔信。

遵之兄：

着你率队于二十三日傍晚驶离南京，江阴炮台已于二十一日易手，已命空军轰炸江阴要塞，并派空军掩护你们下驶，你们务必于二十三日晚间驶离此地，以免空军误会。

桂永清

四月二十三日

桂永清暗示以空军轰炸为威胁，强令林遵把舰队撤往上海。

林遵乘“永嘉”舰来到芭斗山锚地，“惠安”舰吴建安舰长催促说：“现在该行动了。”

林遵同吴建安商议后，立即召集各舰舰长来旗舰“永嘉”号上开会，林遵说明当前形势，要大家讨论去留的问题，经过辩论，戴熙提议投票表决，8票赞成起义，2票反对，6票弃权。

林遵说：“大多数愿意留下来，我刚又跟几位有争议的舰长谈过，也表示愿意与我同进退，都决定不走了，当然，这关系诸君和各舰官兵命运前途，绝不勉强，假如哪位现在还想走，我们决不阻拦。”

1949年4月23日15时30分，林遵在临时作为旗舰的“永嘉”舰上，率领二舰队胜利起义。

（责任编辑：刘家驹）

## 炎黄春秋杂志社首届理事 会名单

- 理事长：杜导正（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  
 副理事长：贝兆汉（广州白云山集团公司总经理）  
 李广尧（黑龙江省广泰实业公司总经理）  
 理事：白亚南（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总经理）  
 蔡道峰（广东潮州市振园运通仪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林春露（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工会主席）  
 秘书长：徐孔（炎黄春秋杂志社总经理）

# 红卫兵小报兴亡录

——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

○古阳木



在中国报刊史上,有过这样一段不寻常的时期:

1967年,全国出版的报纸由1966年初的343种猛降为43种,期刊由191种降为27种;其中还包括各省、市、自治区被夺权后在混乱中断断续续出版的机关报。

另一方面,以“红卫兵”、“东方红”、“造反者”等命名的群众组织报刊,铺天盖地而来。据初步估计,在1966年夏季至1969年春季,全国这类报纸大约有近5000种之多。

然而,翻开《中国现代报刊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等宏篇专著,却不见有只言片语对这些统称之为“红卫兵报刊”的予以评介,更遑论有专门著作问世。

往事已逝去四分之一世纪,也许是对这些尘封已久的当代“入土文物”稍加评说的时候了。最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闪烁着这样的精辟警句: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诚哉斯言!本着这个精神,此文从新闻报刊史的角度,重新回顾那段历史中的“乱世奇观”,以期将来能有一部《红卫兵报刊史》填补上中国报刊史的空白,为我们提供一笔可供比较的“财富”。

### 红卫兵报刊的兴起与衰亡

红卫兵报刊是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喉舌,是那个“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狂热时代的变态文化现象。它在短暂的三年中,走过了初起、发展、鼎盛、衰亡的四个阶段。

1966年初夏的5月底,政治空气比自然气候提前进入了燥热期。一群青年学生秘密聚集在北京圆明园遗址,兴奋地议论着从父母那里听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以红卫兵的名义呼出了“造反有理”的口号。8月1日,毛泽东写出了致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热烈支持孩子们的行动。红卫兵的名声迅速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传播。8月18日,红卫兵登上了天安门,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如同一场狂飙,席卷全国。在随后的“破四旧”和“大串连”运动中,红卫兵的传单、通令象雪片般地撒向街头。他们迫切地需要代表自己心声的更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于是,第一张红

卫兵报应运而生。

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红卫兵报,是9月1日北京六中红卫兵创办的《红卫兵报》及同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创办的《红卫兵》,均为八开四版。北京六中红卫兵,是北京第一批红卫兵之一,积极参加了“破四旧”运动,由于采取了严重的打砸抢行动及所谓维护“走资派”的政治倾向,一个多月后,便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刽子手”,遭到批判而解体,报纸出了十几期便告夭亡。“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又称“一司”,成立于8月27日,主要负责人由高级干部子女组成,政治态度与中学的“老红卫兵”相似,因而不久也被斥为“保皇司令部”,报纸只出了二十几期。

9月中旬以后,随着对工作组和“反动路线”的批判,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起而代之。北京地院“东方红”的《东方红报》,北航“红旗”的《红旗》,北师大“井冈山”、清华大学“井冈山”的《井冈山》报等相继诞生。由于其组织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这些报纸成为众多红卫兵报刊中的强有力者。北京大学的《新北大》虽然在8月22日即已创刊,但初期还是以校刊的形式出现,因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词而声名显赫一时,后来便成为“新北大公社”和聂元梓的独家代言人。通过这些小报,人们认识了北京五大造反派领袖,领略了他们声嘶力竭的狂吼。

12月初,林彪、陈伯达通过下发关于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把动乱之火吹向了经济建设战线。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红卫兵报刊队伍中,也涌进了大批工人、农民、甚至军人主办的行业造反报纸。令人吃惊的是,这些未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办的业余报纸,虽然内容贫乏空虚,“最最”一类语言充斥于字里行间,但必须承认,就整体来说,错别字极少,比起今天我们看到的街头小报,差错率少得多。原因何在?说出来却又使人感到悲哀。原来,在那个绝对政治化的时代,任何版面上的错别字都有可能招致落个“反动”的罪名,使本派陷于灭顶之灾。所以,办报者一面怀着极大的狂热搜索歌颂或咒骂的词汇,一面又战战兢兢地校对着每个字词,尤其是领袖人物的引文。所以,我们看到了一家造反名气颇大的《东方红报》在漏排了毛泽东语录中的一个“的”字时,屡次三番声明检查,“从灵魂深处狠挖根源”,同时又板起脸来,喝斥对立一派不得“捞稻草”。诚惶诚恐之态,令人哭笑不得。有的老编辑至今感慨“文革”时期的校对质量,盖出于此。

总体来说,1966年的红卫兵报刊的产生,还带有浓烈的自发性。自筹经费、纸张、自行联系印刷、发行。尽管在“自筹”中免不了要威逼、勒索,但毕竟还没有夺党和政府权的胆量。

红卫兵报刊的另一个来源,是1967年1月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各群众造反组织通过夺权,抢占上至省,下至地、县及本单位的机关报而生。

1967年1月3日,面对各级党委已难以继续领导宣传工作的状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版。

这个“停刊闹革命”的指示很快便被夺权斗争所打破。当日,张春桥、姚文元便在北京平安里三号——《解放军报》社召见了从上海前来的造反派头目王洪文、陈阿大、廖祖康,在座的还有聂元梓。张春桥神秘地布置说:“《文汇报》明天就要夺权,这是整个上海夺权的先声。”他要求王洪文等人立即赶回上海。

1月4日,《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在当日报上发表《告读者书》,杀气腾腾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解放以来,《文汇报》罪恶滔天。”“《文汇报》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旧《文汇报》必须彻底革命,彻底改造。”当日的《文汇报》还重新刊载了毛泽东为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对于《文汇报》的被造反,人们颇有几分惶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最早就发表于《文汇报》。这家报纸如何又成了“解放以来”“罪恶滔天”了呢?未等人们思索出个答案,更大的事变又接踵而来。

1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该报“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自1962年以来,“窃据《解放日报》社领导岗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办报路线。”“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竭力为资本主义复辟作舆论准备,成了资产阶级的工具。”“旧《解放日报》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改造。”人们更加弄不懂。世人皆知,身为上海市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兼宣传部长的张春桥,长期以来一直领导着《解放日报》,他怎能在这份报纸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自己身上洗刷得干干净净呢?

1月8日,毛泽东表了态。他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的谈话中高度赞扬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夺权和《告

上海全市人民书》,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此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机关报都陷入了夺权、“新生”的混乱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报纸的夺权都能找到张春桥这样的硬后台,因此,在你争我夺中,爆发了一系列武斗流血事件。

毛泽东不能容忍这样的混战,他指示由军队暂时控制报社。青海驻军成立了联合支左办公室,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任副组长。当时,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已被西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占据,他们刁难、阻挠解放军实行军管,后来又用暴力驱逐来社军管的解放军人员。西宁驻军联合办公室经研究决定对报社强行军管,并确定“敌人开枪,我还击”的原则。2月23日,西宁驻军调动武装部队夺取《青海日报》时,群众组织与部队发生武装冲突,造成群众和部队伤亡377人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青海日报》事件”,又称“青海2·23事件”。事后,林彪、江青乘机把此事说成是“二月逆流”在地方的表现,指责赵永夫是国民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宣布予以逮捕。报社的“笔墨之争”变成了“枪杆子之争”。

多数省市机关报的争夺虽然没有酿成严重的流血事件,但也形成了长期的拉锯战。以《广州日报》为例:1月21日晚11时,广州几个红卫兵组织成立的“省革联”来到《广州日报》夺权,将报纸改为“省革联”的机关报《新广州日报》。2月28日,“省革联”的夺权未得到中央承认而垮台,《广州日报》被军管。3月14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驻广州联络站出版的《新北大》广州版发表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重新掀起轩然大波。4月10日晚,广州市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冲击报社,要求转载《新北大》的文章。闹到5月15日,广州一个学院的红卫兵强行封闭了《广州日报》。此后直到1972年,《广州日报》才以小报的形式复刊出版。其他如《云南日报》、《长江日报》、《广西日报》、《福建日报》、《北京日报》等,也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可以说,在“全面内战”的局势下,能够控制省报,攫为一个组织私有的情况并不多。多数被造反派红卫兵改造为红卫兵小报的,是省以下的地、市及单位的机关报。但这些报纸因为占有天时地利的优势,在印刷发行方面得天独厚,往往在红卫兵报刊中影响很大。

红卫兵报刊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大批判”,连篇累牍地刊登中央或本地的“走资派”的“罪行录”,上纲上线,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



1966年,毛主席乘敞篷汽车检阅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1967年8月康生以中央文件形式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之后,各红卫兵报刊更无所忌惮地对各级领导人点名攻击。当然,对中央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决不能触犯的二。是刊登内部讲话和文件。各家报纸为了显示自己能够“通天”,不断刊登通过抄家或接收得来的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人讲话。各报几乎都设有“动态组”,派出记者尾随中央文革成员参加活动,抢先发表他们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以致于中央文革有些新的部署,往往有意通过红卫兵报刊散布出去。三是刊登“文攻武卫”的武斗消息。由于各省都分裂成对立的几大派,各派报纸便不断地报导在“全国内战”中耸人听闻的“血案”、“惨案”,有些固然也真实地反映了“文革”造成的灾难,但也有不少是捕风捉影,添油加醋,制造火药味。最后一类是本派红卫兵学习毛主席著作、首长讲话、中央文件的心得体会,常常是豪言壮语满篇,又大又空,目的在于标榜自己。

1967年夏季,全国红卫兵报刊的种数达到了顶

峰。其中最多的地区,从今日的不完全统计来看,北京有二百多种,江苏、辽宁、四川等省都在三百多种以上。周恩来曾询问四川重庆的支左负责人,重庆市“反到底”派有多少种报纸?回答是有三十多种。而且每个专区、县市几派都有自己的报纸。全国最少的地区是西藏,仅有十几种,但西藏的红卫兵却出有藏文红卫兵小报《红色造反报》,堪称全国一绝。从办报人的职业来看,学生、干部、工人最多,农民其次。甚至还出现了聋哑人造反组织办的《聋人风暴》,从监狱中平反出来的囚犯办的《红囚徒》报。称之为“乱世奇观”,当不虚妄。

为了控制这种“无法无天”的状态,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进革命群众的报刊宣传的意见》。意见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组织编印的各种报刊、传单,在宣传战线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这类报刊宣传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时中共中央提出如下改进意见:

一、应严格按照中央指示和社论进行宣传。二、毛

泽东、林彪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批示，中央内部文件、内部谈话，一律不要擅自刊登，编印流传。三、报刊上不得发表反对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四、必须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目前群众组织报刊泄密相当严重，透露了国防工程、设施、部队调动情况、备战计划、措施及经济、外交、机要方面的重要机密，必须迅速制止。五、不要搞“黄色新闻”及其他庸俗、低级的东西。六、对国际重大问题的宣传，要按中央方针进行。七、不要传播“马路新闻”、政治谣言。

从上述提出的问题看，红卫兵报刊产生的后果已十分严重。但是，《意见》既然在起首便肯定红卫兵报刊“起了重要作用”，提出的又是“改进意见”，也就无法制止这种现象蔓延下去。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场内乱。以乱治乱，岂不谬哉！

红卫兵报刊的编辑出版，始终是各派组织内少数人的事。以影响最大的“三司”的《首都红卫兵》为例，创办之初，编辑部只有三、四个人。从收集稿件、编改文章、报社校对到采购运纸、分发报纸几乎都是这几个人干。第一期没人给印，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家报社，跑了六个印刷厂，最后才在《前进报》排版，在北京市印刷二厂印出。当然，当“三司”声名鼎赫之时，情况顿有改观。最初兴办的红卫兵报刊的发行，一部分自行发售，一部分也通过邮局订阅。但后来种类骤增，邮局也分裂为几大派，通过邮局的便只剩下影响大的几家。多数都改为上街叫卖。在发行中，影响最大的是上海《红卫战报》事件。

1966年11月27日，上海“红革会”要求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代为发行批判中共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9期《红卫战报》。并且要求将他们主办的《红卫战报》与上海市委的《解放日报》一道发行，声称“《解放日报》放毒到哪里，我们就消毒到哪里。”发行处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一要求。30日，“红革会”红卫兵进驻《解放日报》社，不准《解放日报》发行。12月2日，王洪文等人见有机可乘，也派“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派进驻《解放日报》社，围得水泄不通。上海人民和反对“工总司”的另一派群众组织也聚集50万人，在解放日报社外高呼：“我们要看《解放日报》！”但迫于内外压力，上海市委只得签字同意了“红革会”和“工总司”的要求。于是，便出现了每一份《解放日报》伴随一份红卫兵《红卫战报》“押解”而出售的奇闻。

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则另有高招，他们直接驱赶“走资派”上街卖报。1967年夏，外语学院等单位的红

卫兵组织勒令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姬鹏飞等人到王府井街头叫卖红卫兵小报，一时，“乔老爷卖报”的消息风闻全国，外国报刊还刊登了乔冠华等人卖报的照片，给我国的外事工作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随着内乱的加剧，毛泽东开始采取措施纠正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在南巡途中指示：各派要“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他严厉地指出：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0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这两个通知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多如牛毛的红卫兵群众组织有的合并，有的解体，红卫兵报刊的数量、种类开始减少。

9月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北京卫戍区发出布告，要求外地来京人员不许在北京各学校、各机关、各单位设立联络站，不许在北京出版报纸。违者，要由革命委员会进行取缔。在此之前的6月30日，虽然北京市革委会曾作出“各革命群众组织已经出版的报纸一律实行自费，亏损不补”的规定，但红卫兵们总还能以各种办法搞到经费，继续出版报刊。只是到了两个中央通知之后，他们才“无可奈何花落去”，回到了各自的学校、单位。当然，在蒯大富、聂元梓等五大造反派控制的单位，情况并没有好转，武斗仍在继续，煽动武斗的红卫兵报刊仍在出版。

1968年7月27日，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遭到武力抵抗后，毛泽东震怒了，他连夜召见“五大领袖”，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斥责。次日，工、军宣传队进驻各大学。结束了造反派红卫兵横行的时代，也结束了红卫兵报刊“指点江山”的状况。此后，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和毕业分配、上山下乡，红卫兵们离开了学校，大学红代会停止活动，《首都红卫兵》也理所当然停刊。全国大多数红卫兵报刊都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停止出版，只有少数改为革命委员会机关报，易名出版。内容与出版方式都与前期不可同日而语。仍然沿用旧名的当然也有，如上海“工总司”的《工人造反报》，由于是掌权派，又存在了一段时间。

“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还寻各自门”。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几近三年的红卫兵报刊终于在不甘沉默中走向了衰亡，但并未在历史的评说中划上相应的句号。

### 毛泽东与红卫兵小报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怀着对红卫

兵同样的兴趣,对与日俱生的红卫兵报刊给予了极大的注目。从浩繁的资料中,我们钩稽出许多有趣的内容:

1967年7月12日,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同学、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从长沙专程来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文革”中的混乱情况,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

毛泽东问:你到北京后到了什么地方,看了些什么东西啊?

周世钊说:我每天就是看书看报,有时也上街走走看看。我是住在北京饭店,北京饭店大门口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的南口,在那里每天都有很多全国各地的各种小报,有时我也买几张看看。那些小报大都是报导全国各地进行“文革”的情况,特别是报导各地进行武斗情况的消息为多。他们报导武斗的消息大都采用战争年代打仗发急电的方法,就是“某某地告急、急急急、十万火急”。

毛泽东笑了起来:让他们去告去,急不了好久,总会要想个法子解决问题的。

周世钊向毛泽东汇报了6月6日在长沙发生的“工联”派与“长高司”派武斗的“6·6事件”。没想到毛泽东比他知道得还详细,讲在东塘是如何打的,讲在河西又是如何打的,讲得清清楚楚。周世钊吃惊地问:主席,您怎么比我们还了解得清楚些啊!

毛泽东笑着说:我是党中央的主席嘛!他们会时常向我汇报情况的。再说你看我的办公桌上,不是放着一大堆小报吗?有些情况我是从小报上看到的。他又说:“高司”的群众基础是学生,学生素来是革命的先锋队;“工联”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从他们的历史情况和他们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不革命的理由,也没有不是革命的群众。两派必须联合起来。

毛泽东桌上的小报,有些是地方上送来的,有些是他嘱咐工作人员买来的。他看得很仔细,两派办的小报都要看。

两天后的7月14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了武汉。这是他“文革”中的第一次南巡,目的是要找出解决“全面内战”局势的办法来。所到之处,他仍然要收集、阅读大量的当地红卫兵小报。这是他调查研究的一种方式。可惜,由于突如其来的武汉“7·20事件”,毛泽东被迫中断了在武汉的试验,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阅看大量的红卫兵小报。在上海“工总司”的报上,毛泽东批下了那段名言:“在工人阶级内

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这段指示反映了毛泽东由“乱”到“治”的一个考虑,促成“全面内战”的局势逐步走向有所控制。

9月17日,毛泽东来到南昌,在和江西省革筹小组的谈话中,他仍然兴趣盎然地引用红卫兵小报上的见闻。

当汇报到南昌附近发生的武斗时,毛泽东说:《火线战报》登的“南钢失守,庐山失守”,已经收复了吗?他总结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6、7、8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来了,事情好解决了。

当汇报到解放军某部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排”为抢救群众而英勇献身的事迹时,毛泽东惋惜地点头说:我看了《火线战报》,有他们三个人的照片,他们三个人都很年青。

对南巡未到的四川,毛泽东也阅看了当地的红卫兵小报。1968年3月,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到:四川问题,主席看得比我们多,主席看了小报给我们讲的。主席许多小报都看了。比如重庆“八一五”、“反到底”派的,还有什么“嘉陵江上烟云滚滚”。主席都看了。

毛泽东还曾多次对外宾谈起中国的红卫兵小报。

6月初,他在会见东南亚一位共产党领导人时,问道:地质学院有个《东方红》报,你看到了吗?外宾说:我见到了。它的销量达10万,有时甚至超过10万。在上海时,我曾向上海同志说,最好把全中国的报纸销售量统计一下,我想这个数字可能要比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销量总数还多。毛泽东点头说: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有几千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

10月中旬,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时,又说:大字报不算,单是小字报北京就有几十种,全国就有几千种,油印的不算。为了争夺报纸,争夺舆论机关,斗争可激烈了。比如《湖北日报》,这一派夺过去,那派再夺回来。然后大家都不赞成,根本不出报,那么就出很多小报。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大的学校,都有报纸。

在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中,毛泽东看出了不少问题,并采取措施制止了一些极端的错误作法。

1967年初夏,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去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忽然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报纸,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

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一份载有“百丑图”的红卫兵小报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两顶轿子，刘少奇、邓小平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中央被诬陷打倒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一百人。画面上：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陶铸鸣锣开道……傅崇碧心情十分沉重，他知道，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示意红卫兵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气愤地说：“胡来！这是丑化无产党的！”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才怒犹未息地转过身子。然而，那份诬陷中央领导人的“百丑图”早已随着清华《井冈山》等小报散向了全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毛泽东既然根据自己的错误判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支持了红卫兵，也就无力根本制止和改变全国几千种无政府状态下出版的红卫兵小报的狂热语言。

历史的悲剧给我们留下了那些难以示人的街头档案。几年以后，当“百丑图”的作者，一个涉世未深的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学生翁××，也被打入“文革”狂涛的底层时，他才痛心地道悔着当年的作为。

### 影响最大的红卫兵报刊

在万旗争锋的红卫兵报刊中，全国影响最大的，首推《首都红卫兵》。

说它影响最大，第一个原因是其创办者的名声——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自诩“中央文革的铁拳头”。1966年8月28日，北京地质学院、林业学院、钢铁学院、清华大学等20多所院校的红卫兵开始酝酿成立“三司”。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由19个院校红卫兵组成，包括地质学院、邮电学院、农机学院、农业大学、北工大的“东方红”，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北外“红旗”，清华“主义兵”等等。9月13日，“三司”报纸《首都红卫兵》由“宣传部”主办，正式出版。

由于“三司”的主要领导者都是“文革”初期受工作组压制的造反学生，因此，“三司”一诞生，便把矛头对准了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报中，《首都红卫兵》第一个在9月份刊出了批判工作组的文章，第一个在10月份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左派”的“夺权”口号，第一个在11月份发表《打垮新的反扑》文章，捍卫中央文

革小组。在一段时间内，《首都红卫兵》的文章频繁地被《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各地小报转载，成为各地“造反”和“支左”的依据。凡是“三司”支持的，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也就是“响当当的左派”。

1967年1月25日，《首都红卫兵》发表社论——《打倒“私”字，实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社论写道：“阶级敌人在拼命地寻找着我们队伍内的每一点缝隙，挑拨、离间、破坏革命派的大联合。”“我们将怎样回答敌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钢铁般的大联合！这就是我们的回答。”社论号召：“打倒风头主义！打倒本位主义！打倒宗派主义！”“革命的分子和革命工人、革命农民、革命干部及一切革命群众联合起来！”

几天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份送到案头的小报。此刻，他正在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使越来越失去控制的造反烈火回到秩序的轨道上来。几天前，他作出了要求人民解放军支持“左派”的批示，试图用军队的干预控制全国局面。但是，谁是“左派”？在几十天内揭竿而起的林立山头中，全都唯我独左。于是，他想到了必须大联合。于是，他在《首都红卫兵》的这篇社论标题上划上了铅笔红圈。要求各大报立即转载。2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一齐转载了这篇社论。《解放军报》加编者按说：“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极其重要的问题”；《红旗》杂志加编者按说：“我们在这里向全国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推荐。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带普遍意义的重要问题”。

被“两报一刊”转载，在当时是最高的殊荣，于是《首都红卫兵》报更加声名鹊起。社论的执笔者——一个大学生，被调到《人民日报》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三司”自身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能手，因此，全国的形势并未能象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走向“大联合”，而是迅速滑入了“全面内战”的深谷。

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三司”的头头们挤垮了其他对手，成为红代会的主持者，《首都红卫兵》也就直接成为红代会的机关报。不久，红代会分裂为“天派”、“地派”，《首都红卫兵》成了互相攻击的喉舌，也分裂为两种版。

说它影响大，第二个原因是这份报纸的发行面之广，数量之多，是其他报纸望尘莫及的。由于“三司”向全国各地派出了众多的联络站，煽动造反，《首都红卫兵》报也就有了各地分店。据不完全统计，“三司”截止1967年1月底办有联络站的地区有“沈阳、重庆、长沙、南京、上海、杭州、西安、南昌、鞍山、福州、合肥、南



充、银川、常州、扬州、贵州、徐州、天津、南宁、齐齐哈尔、青岛、旅大、广州、太原、漳州、吉林、乌鲁木齐、成都、郑州、洛阳、济南、通县、唐山、武汉、昆明、烟台、汕头、无锡、株州、潍坊、邯郸、西宁、哈尔滨等地。真可谓“钦差大臣”满天飞。《首都红卫兵》办有分刊的地区有“上海分刊、重庆分刊、西宁分刊、株洲分刊、长沙分刊、无锡分刊、常州分刊等等。此外，在北京还办有中学中专版。

这些分店和总店的共同发行数量，难以统计，据粗略估算，在其鼎盛时期，当不低于50万份。但是，分刊与本刊的文章并不相同，自说自话。以致在“内战”最热之时，各支持当地两派，互相声明攻击，出现了分刊批判本刊，本刊宣布分刊“非法”的笑话。

分刊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上海版。它创刊于1967年1月1日，几天后，便参与了上海一月夺权，成为写出《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工总司”等最初十一家群众造反组织之一。3月6日，《首都红卫兵》上海版出版第五期后，宣布撤离上海回京。表面原因，是“告别书”中所说“新的战斗任务在召唤”。实际原因，是王洪文等人的“工总司”羽翼已经丰满，不容他人再来说三道四。

1967年9月6日，在“三司”成立一周年之时，《首都红卫兵》报出版了《〈首都红卫兵〉文选》。今天，我们重翻这本充满火药味的“狂人日记”，哑然失笑之际，也要感谢它为全国影响最大的红卫兵小报留下了一本珍贵史料。

### 特殊意义的红卫兵小报

在浩瀚如烟的红卫兵小报中，有一份用自己生命写下耐人寻味文字的《中学文革报》，它浸透了作者的血和泪。

《中学文革报》由“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1967年1月创刊，到2月21日已出版四期。先后刊载了“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撰写的文章《出身论》、《谈“纯”》、《论×××烈士的生与死》等。读者切不要为“司令部宣传部”等来头吃惊，在那个“司令满街走，兵团处处有”的造反年月，一两个人便可以独树一帜，大过官瘾。使这份报纸不胫而走、名闻遐迩的，是它创刊号上刊登的《出身论》，是作者后来悲惨的下场。

《出身论》的作者，是失学青年遇罗克。他的父亲原是水利电力部的一位工程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他陷入了苦恼的深思中。1960年，门门功课考试都在90分以上的遇罗克却没有任何一个大学能够录取他，因为那家庭出身的阴影。

1966年2月13日，失学在家的遇罗克写了一篇文章，点名批评姚文元的棍子之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尚未被作为“阎王殿”打倒时，他的文章以《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为题发表了。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烟尘腾起，他的观点被斥为“反动”。

人们一定还没有忘记1966年7月底到8月底的那一阵“血统论”狂潮。7月底，北京石油学院附中等校的学生贴出了一幅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立刻风靡全国。围绕着这幅“鬼见愁”对联，北京芭蕾舞学校、天桥剧场等地召开了名为辩论、实为一边倒的大会。红卫兵的皮带挥舞，在社会上迅速分出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农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红外围”（其他劳动人民）等家庭出身不同的阵营。不要说参加红卫兵要严格审查出身，就连买一些紧俏商品，售货员也要问一句：“什么出身？”如果是“红五类”，优先供给，“黑五类”没有份。祖辈、父辈的成份，被当作革命与反革命的唯一划分标准。

面对狂热的浪潮，遇罗克在深思。他写下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出身论》。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经过粗略的统计，他写道：“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由于形左实右反动路线的影响，他们往往享受不到同等政治待遇，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经成了准专政对象。”“出身几乎决定一切。”“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10月的深秋，《出身论》被油印成传单，在人们手中传阅、抄录，引起了议论和深思。

北京四中的学生牟志京、王建党等人，对《出身论》深表赞同。他们找到遇罗克和他的弟弟，商议办起了《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头版赫然载出《出身论》，作者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我不喜欢战斗队一类浮而不实的名称，我希望这个名称能使每个家庭都来认真地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遇罗克这样回答。

第一期三万份立即一抢而空，重印六万份，又几天内售尽。《中学文革报》成为当时最热销的报纸。

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社的铁栅栏外，拥挤的人群把手伸进去，极力想买到一份。一张报纸被

两人抢作两截，仍互不相让地争吵着。忽然，持不同观点的一些红卫兵赶来，撕毁了一些报纸，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愤怒：“为什么撕报！不同意可以写文章辩论嘛！在斥责声中，《中学文革报》继续出售，更加抢手。

《出身论》写了些什么，引起如此之大的共鸣，

“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你真的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比正确的吗？你真的相信毛泽东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吗？那么，你就不应该认为老子的影响比什么都强大。”

“究竟一个人所受影响是好是坏，只能从实践中检验。这里所说的实践，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对联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

最后，文章大声疾呼：“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

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在今天，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梦已过去二十年的今天，履历表上已不再有“家庭出身”这个令人疑惑的栏目。我们只是在“征婚启事”中，或许还能看到“父母均居海外”这一类的轻浮炫耀痕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同。

遇罗克的话语，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读来是那样的平凡。然而，当年说出这些被实践证明的真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中学文革报》出刊后，招来了激烈的反对和咒骂。《兵团战报》等多数红卫兵小报以其为靶子，展开了大批判。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讲话中宣布《出身论》“代表了反动的社会思潮”。随后，中学红代会发表声明，勒令《中学文革报》停刊。面对强大的压力，遇罗克没有屈服，他五次上书毛泽东，汇报自己的论点，希望得到理解。当然，这些信没有能寄到毛泽东的手中。《中学文革报》被迫停刊了。不久，遇罗克被逮捕。

经过几十次审讯，戴上重镣和背铐的遇罗克仍然坚持着自己的观点。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一片狂热口号中，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他，仍然昂首挺立。这年，他才27岁。

《中学文革报》的另一个殉葬者是北京地质学院附



中的女学生郑小丹。她因为参加撰写该报文章，并公开向中央文革小组提出 18 个质问，被浑身捆满铁丝网，从四楼顶上扔下来摔死。1979 年 11 月 21 日，经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的观点不再引起争论。《中学文革报》却仍然是全国集报爱好者眼中的珍品，价格居高不下。因为它用生命谱写的探索之歌。历史就是这样不偏不倚。当年的“大树特树”者，已灰飞烟灭，而被“口诛笔伐”者，却在人们的心中讨回了公道。

### 研究者、收藏家眼中的红卫兵报刊

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红卫兵报刊就作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和特殊的文化现象，引起了外国学者的极大兴趣。起初，是各国驻华使馆人员上街去购买，携回国内，当作情报。后来，这些报刊逐渐到了学术研究机构。据说，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是除中国外，收集红卫兵报刊最多的一家，藏有几万份，都分门别类置于恒温保护之下，并拍成缩微胶卷。日本的亚洲经济研究所也收藏有几千份，据此编出了《红卫兵报总目》，分列刊名、作者、时间、重要文章索引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汉学专家们，还根据其收集，写出了研究红卫兵报刊的俄文专著。据介绍，在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也有类似的研究者。翻开外国学者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几乎没有不征引红卫兵报刊资料的。据旅美华裔现代文学专家唐德刚先生的判断，由于红卫兵报刊在研究中的走俏，港台等地还出现了伪造的红卫兵报刊。其依据是，在他过眼鉴定的红卫兵报刊中，有不少是用繁体字排印的，用语也有些港台流行词汇。其实，前者并不能作为依据。“文化大革命”前夕，虽然公布了两批简化字，但红卫兵组织印刷报刊时为条件所限，不得不仍旧使用一些尚未

作废的繁体铅字，尤其在外地中小城市，较为普遍。即使在北京、上海出版的红卫兵报刊中，也常常可以看到繁体字的使用。流行词语倒是一个准确的判断标准。“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特有现象，它创造出许许多多令人目炫的政治术语，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打三反”、“早请示、晚汇报”，尚是 30 岁以上的人可以理解。而对于外国人来说，未免过于深奥了。一个研究了多年的外国教授曾感慨地说，他至今也搞不清楚被红卫兵批判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当年拿起笔作刀枪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未必了解了它的所指，不过“以其昏昏，使人昏昏”罢了。当年的一个接一个运动，不少是至今难以解开的一笔糊涂帐，不去深究也罢。

说到收藏，大者当然还要数红卫兵报刊的发源地——中国。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一些省图书馆，都藏有相当数量。它的来源，多半是当年以“革命文献部”的名义向全国广为征集而得的。不过由于内容的特殊性质，并不能对一般读者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报纸收藏者的队伍日益扩大。红卫兵报刊是他们的重要目标之一。在北京、上海及大城市的旧书报交易市场，时常可以看到零散者出售。当年定价 0.02 元至 0.10 元的一张小报，如今一般标价在 1 至 2 元，确实可以说是身价百倍。收藏者中，有不少是当年的红卫兵和办报者，据说，有些人还办起了小规模展览。毕竟在那些发黄的纸张上，他们曾投入了自己的青春和探索、追求。

诚然，由于红卫兵报刊是一种错误的历史陈迹，对其内容，除少数专门研究者外，不当任其传播。但作为一种扭曲的文化现象，也许至今值得我们深思：失去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之后，中国将会有怎样的“文化”和“革命”？

## 邮购启事

本刊创办两年来，所刊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华龄出版社为满足广大读者要求，将其中的部分精彩篇什汇编成《高层纪实》一书，分上下两卷，计 20 余万字，已于最近出版。所收文章史料翔实，文字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化品位与收藏价值，凡欲邮购此书的读者可写信给我社发行部办理邮购。每卷 3.20 元，一套 6.40 元，另加收邮费百分之十。邮购 10 套以上者免收邮费。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联系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郭小姐，电话：6016633—227

# 血 溅 居 士 林

○黄国平

## 孙传芳之死

### 一、观音寺内得行踪

1935年10月的一天下午。

天津日租界的观音寺内香烟缭绕，磬鼓齐鸣，几个和尚身披袈裟，喃喃地念着经。

一个少妇身着素服，带着两个孩子，跪在观音塑像前叩了三个头后，把手中的香插在香炉上，又跪了下来，先是口中念念有词，接着又咽泣起来，最后不禁放声大哭。和尚们闭着眼继续念着经，似乎无动于衷……

一卷经颂毕，少妇还在大哭。一个老和尚慢慢站起身，走到少妇身边说：“女施主，起来吧！人死不能复生，灵魂已得到超度，保重自己的身体要紧。”

少妇慢慢止住了哭声，抽泣着说：“老师父，先父死得太惨了，我来烧香求佛，只是尽子女一点心意罢了，其实这不都是空的，哪有什么灵佛呢？”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如果没有灵佛，哪能相传几千年啊！你看现在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都不信佛吗？”老和尚合了合掌。

听完老和尚的话，少妇不禁愣了一下，立刻镇静下来，跟老和尚谈起了因果报应。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佛家以善为本……”老和尚给少妇讲了一

个又一个佛家故事后说。

“谢谢老师父的教诲。靳云鹏他们也常来这里念经吗？”少妇转了一下话题。

老和尚看到少妇开始接受佛道，非常高兴地说：“他们这些大人物认为这个佛堂来人太多，不够清静。为了真心修佛，在城东南角设了一个居士林，靳云鹏是林长，孙传芳是理事长，每逢星期三、星期六都是颂经礼佛的日子，有时还请各地名僧来讲经，他们必到，还有不少名人呢！”

少妇听罢暗自高兴。因近日来她一直在寻找孙传芳，好不容易打听到孙家住址，但却摸不准他的活动规律，因而无法完成她的重要计划。今天居然无意中得到了居士林的消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 二、施从滨的惨死

少妇姓施名剑翘，这天是其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杀害10周年纪念，到观音寺就是祭奠父亲的。

10年前的10月，安徽固镇一带，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一场大血战正在这里进行，这是军阀混战的一幕。

几天前，这里还是奉系军阀的地盘，而且努力扩展到南京、上海，那是第二次直奉大战的成果，奉系

的杨宇霆、姜登选分别霸着江苏安徽督办的宝座……

1925年，吴佩孚再起，联合南方军阀孙传芳反奉。

孙传芳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突然向奉军开战，结果奉军兵败如山倒，孙传芳很快占领了南京，杨宇霆、姜登选只好开溜……

一夜之间，孙传芳部已经渡过长江，他洋洋得意地鼓励官兵：“我们胜利了，他们兵败如山倒，我们追得越快，战果就越大。”

一场激战在固镇地区展开，

赶来增援奉军的是张宗昌部，当年南京、上海就是他们夺取的。今天，又准备让他们来收复失地。

一位身着上将军服的白发老人，坐在铁甲车里指挥着先锋队，他就是施从滨。他除了率领自己的46混成旅外，还有近4千人的白俄部队。这支白俄军队是张宗昌在东北收编的，已为张宗昌打下立下汗马功劳，这次特别拨给施从滨指挥……

张作霖已经许愿，如果打败孙传芳，施从滨可以就任安徽督军。

战场上杀声震天，尘土飞扬，两军面前已经积尸累累。

白俄军大多赤着膊，一手拿着白兰地酒瓶，一手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咕咚咕咚喝几口酒，狂呼乱

叫地往前冲，象野兽一样凶猛，一时把孙传芳的官兵惊呆了，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作战的士兵。

一支 50 多人的孙军陷入白俄军队的包围，都乖乖地举起了手。但是，白俄军狂笑着，把酒瓶一摔，举起刺刀向着俘虏群冲去，有的割耳朵，有的挖眼睛，还有的剖开俘虏的肚子，用刺刀挑着心、肝玩。顿时，战场上一片惨叫声……

孙军被白俄兵的暴行气红了眼，“为弟兄们报仇！”“杀！”终于将白俄兵包围起来。他们以牙还牙，有的将俘虏的白俄兵绑在树上，在脚下燃起大火，有的用刺刀在他们身上划着一道又一道，有的则把他们当活靶子打……

白俄兵已消灭殆尽，施从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部队已经全面溃退。

“加速马力北撤！”施从滨下了撤退命令，铁甲车向北急驰而去。车到固镇桥头，只见 46 混成旅的官兵正拥在铁桥上向北败退，到处一片混乱。

“怎么办？”参谋长请示施从滨。

老人从窗口伸头看了看，只见一里长的桥面上黑鸦鸦一片，他实在不忍心从自己部队身上碾过去。“往南开！”施从滨命令。铁甲车又隆隆向南驶去，但孙传芳部队已蜂涌而来。

“往回开！”施又下了命令。到了固镇桥头，车刚放慢速度，施大声喊：“快开，快开！”铁甲车的铁轮无情地从桥面滚过，顿时桥面血肉横飞，1000 多人化为肉饼，惊叫声和惨呼声连成一片。许多被碾掉下肢，但尚能说话的军官们躺在桥上呼喊：“做做好事，给我一枪吧！”其惨状无法形容。连追上来的孙传芳官兵也吓得不敢过桥，有的甚至

放声大哭起来。

施从滨车过固镇桥后，满以为可以逃命，谁知铁轨已被拆毁，铁甲车倒在路旁，他被俘了。

蚌埠的总司令部烟榻上，孙传芳正在吞云吐雾。营长谢鸿已将施从滨解来，“报告，施从滨已解来，愿望总司令体谅他年迈，优待施老。”谢一边报告，一边在为施求情。

“让他进来！”孙传芳动也没动，还在吞云吐雾。

身穿上将服的施从滨大步走了进来，向孙传芳行了个军礼：“总司令辛苦了！”

孙传芳躺在烟榻上，还是一动也没动。笑着说：“施老，你好，你不是去当安徽督办吗？你马上去上任吧！”

“那只是张作霖的许愿。”施从滨苦笑着。

“拉出去！”孙传芳脸一变。

施从滨被枪决了，满头白发的脑袋被割了下来，挂在蚌埠市的电线杆上……

### 三、孙传芳的没落

孙传芳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苏皖沪。福建的周荫人、江西的邓如琢、安徽的陈调元以及苏北地方势力纷纷来电祝贺，表示愿听孙传芳调遣。从此，孙传芳爬上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的总司令。

孙传芳在小军阀的前呼后拥下，实在感到太得意了，因为从他 1921 年在吴佩孚部下当师长到登上五省联帅宝座，仅用了 4 年时间。这时，是他军阀生涯的鼎盛时期。

俗话说：“水满则盈，月满则亏”。不久，他开始走下坡路了。

1926 年，他在江西的部队被北伐军消灭。不久，福建也被北伐

军占领，接着又丢了浙、沪、苏等江南地区……。这时，他只好与旧时的敌人张作霖联合……

1927 年秋，他企图反攻，又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了其主力部队，剩下的也投向北伐军了。

孙传芳只剩下几个亲随，只好逃到奉天，在张作霖那里作客卿，从联帅到孤家寡人仅仅 2 年时间……

一年后，他又偷偷溜回到天津，做起居士来。

### 四、施剑翘初会孙传芳

天津居士林内，大殿的佛龛前放着一张大供桌，中间放着一把椅子，是和尚讲经时坐的，桌子西边放着两把太师椅，是林长靳云鹏和理事长孙传芳的专座。桌前放着一排矮凳子，是供一般男女居士坐的。

居士中，很大一批是孙传芳拉来的失意军人、政客，如原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周荫人等。当然，也有不少善男信女，每次听经者达六七十人之多。

从观音寺回来的第二天，施剑翘早早地到了居士林门口。居士们也陆续到来。

“你是来入林的吗？”一个中年妇女热情地向施剑翘打招呼。

“嗯，我想听听经。”

“那太好了，我介绍你入林。你叫什么？”

“董慧”。施剑翘灵机一动，报了个假名。

一枚林友证章递到施剑翘的手里，她虔诚地别在上衣的左上角，进了大门……

“她叫董慧，新林友，”中年妇女把施领到靳云鹏和孙传芳面前介绍说，又向施介绍了靳、孙二人。

她向孙传芳扫了一眼，只见孙

满脸横肉的脸上嵌着一双三角眼，在向地微微点头，满腔的仇恨立即涌上了施的心头，但她马上冷静下来，违心地说了一声：“请多教诲！”因为现在还不是激动的时候。

“吾佛以善为本……”和尚开始讲经，施剑翘退下来坐在矮凳上，只见孙传芳手择经卷，认真地看着，真有点修佛的样子……

### 五、施剑翘的誓愿

施剑翘对孙传芳的仇恨怒火埋心头已经整整10年了。10年前，当她确知父亲已被孙传芳杀害时，施剑翘还是个妙龄少女。她和几个幼小的弟弟肃立在父亲的遗像前，泪珠滚滚而下。姐弟们身边还站立着一个小伙子，浓眉大眼里也充满着仇恨。他叫施中诚，是施剑翘的堂兄，因从小丧父，由施从滨养育长大，这时刚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伯父，请放心去吧，您的大仇侄儿一定替您报，我不杀孙传芳，死不瞑目！”施中诚挥了挥拳头。

“哥哥！一切寄托在您身上了。”施剑翘感激地望着堂兄。

“我马上去投军，求求张督办（张宗昌），让我去带兵，与孙传芳拼个你死我活！”中诚说。

当天，他就去找张宗昌，弄了个团长职务，但并没见他去拼个“你死我活”。

一年过去了，又一年过去了。施剑翘苦苦等到第三年，而已当上烟台警备司令的施中诚还没动静。

“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她一边写诗，一边掉着眼泪。她开始恨起堂兄来。“我要是个男子多好啊！”她在院子里放声大哭，也怨自己是个女人。

“施小姐，不要过于悲伤。”一个军人从屋里出来扶着她的肩说。他叫施靖公，是阎锡山的中校参

谋，从山西到济南办事，暂住施剑翘家。

“先父死得惨啊！”施剑翘呼天唤地。

“我是令尊培栽出来的，你的仇也是我的仇，如相信我，我愿为令尊报仇！”施靖公安慰着说。

听了施靖公的豪言壮语，施剑翘大受感动，两人越谈越知心。

为了替父报仇，施剑翘嫁给了靖公，并随他去了太原……

### 六、孙传芳“闭门思过”

孙传芳手择经卷已经好几年了。他的确在“闭门思过”，但并没有想“立地成佛”，他总觉得自己败得太惨……

他脑中浮现出与国民革命军作战惨败的一幕幕。

长江南岸足有七八米宽的江面完全被黑鸦的尸体堵塞，这些尸体泡在水中，头肿得巴斗大，成群的苍蝇在腐尸上起舞，天上的老鹰和乌鸦不断俯冲下来，吸食着腐尸……

这些无法考证名字和家址的将士都因孙传芳渡江的一道命令成了死鬼，龙潭战役使孙传芳丧失了4万余人……

他想起在奉天寄人篱下的日子……

“今天落到这个地步，真是天灭我也！”他越想越伤心，经卷在手中越来越沉，经卷上的大字也越来越模糊，“佛能助我吗？”他怀疑了……

### 七、一个个刺孙方案

施剑翘原想依靠丈夫为父报仇，但愿望也落了空。

刚到太原不久，他们便有了第一个孩子。一天，施剑翘对丈夫说：“靖公，咱们结婚一年多了，可是父亲的仇一直记在我的心头啊！”

“人死如灯灭，现在咱们生活

得好好的，去冒那个险干什么？”施靖公冷冷地说。

“你不是对我起誓要替父亲报仇的吗？”

“那是一时冲动！”说着，施靖公一甩袖走出了门。施剑翘躺在床上哭了起来。

又过了三年，他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施剑翘再次对丈夫说：“靖公，我不杀孙传芳是誓不罢休的。”

“又是报仇、报仇，你有完没完？以后再也不许提这事！”施靖公摆出大男子的架势。

“好好好！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不跟你过了，明天我就回娘家去！”施剑翘说。

“去散散心也好！”施靖公倒没有发火。

1935年6月，施剑翘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天津娘家。其实，她并不是赌气跑回天津，而是听人说，孙传芳在天津住。

“痴心原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她决心不再求丈夫，而自己亲自动手了。

她打听到孙传芳住在英租界20号路，几次去观察，在脑中出现了一个个方案：

偷偷地进去？孙家大院围墙高筑，还拉着电网，两扇大铁门紧关着，实在太难进了。

到他家当佣人或家庭教师？人家已经有了佣人，孩子在学校上学，根本不用家庭教师。

在他家门口摆个小摊卖东西？那里根本没有设摊的条件……

一个个方案否决了。

她还打听到孙传芳夫妇常到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但那里观众太多，容易误伤他人。当她知道孙常去居士林之后，一个方案终于决定下来。

### 八、为了母亲的安全

“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她决定在居士林下手。

8月中旬，施剑翘带着两个孩子到了南京，她是去找在南京工作的弟弟施则凡的。

“八弟，父亲怎么死的你还记得吗？”剑翘眼眶立即红了起来。

“我怎能忘掉杀父之仇？”则凡怒火满腔。

“那好，姐姐已决定为父报仇了。孙传芳每星期有两天在居士林颂经，是下手的好机会。”

“不！报仇是做儿子的责任，不能让您去冒险，我立即跟您去天津！”则凡坚决地说。

“八弟，父仇非报不可，中良哥既无报仇之心，我是老二，责任应该落到我头上，如果我没有杀死孙传芳而牺牲了，那你再接着干吧！只是母亲年事已高，我怕她惊吓不起，到时你把她接来南京。”剑翘在说服弟弟后，对母亲的安全作了安排。

她很快回到天津。

在她一切安排好以后，就写信给施则凡，让他来接母亲。当她把母亲送到车站后，看着白发苍苍的母亲，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要知道，也许这是母女的永别啊！

### 九、机会已经到来

又是一个礼佛颂经的日子。

1935年11月24日下午。天下着雨，冷飕飕的，施剑翘已经来到居士林。只见一个工友匆匆忙忙地把一本经书放到孙传芳的座位，不一会，穿着和尚袍的孙传芳走了进来，坐到椅子上。

孙传芳已经开始默默地念经。施剑翘把手伸向口袋，才发现手枪没有带来。今天是好机会，不能错过，她暗暗想着。站起来离开居士林，回家去取枪。

为了得到一支枪，施剑翘也大

费了一通脑筋。按理说，当时只要有钱，买一支枪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一个女人去买枪，总有点麻烦，施剑翘不敢贸然行动。

事情也巧，一天，她的十弟突然拿着一支崭新的勃朗宁手枪对着她开玩笑：“不许动！”

“十弟，这是哪来的？”施剑翘简直喜出望外。

“是朱其平哥哥的。”原来，这支枪，还有两盒子弹，是则凡的同学朱其平在1934年过天津时存放在施家的，施剑翘却不知道。

她匆匆回家将手枪和60多张传单放在大衣口袋里。传单上写着：

一、今天施剑翘杀死孙传芳是为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震慑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署名“报仇女施剑翘。”

她告别了前天刚从南方来的堂兄施中诚。

施中诚自在伯父遗像前发誓报仇已近十年，他早已在享乐中忘却报仇之事，施剑翘还写信骂过他，但他始终没有回信。

这次他是奉蒋介石的命令到天津的，因为蒋介石几次拉孙传芳未成后，最近发现孙在勾结日寇，有东山再起之意。于是决定消灭他。

施中诚现在陈调元手下当师长，当陈调元问他：“你愿不愿意为伯父报仇”时，他腿直打哆嗦：“我……我我愿意，但是军务太忙，走不开啊！”

“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师长职务给你留着。”陈调元说。

“好吧！”施中诚战战兢兢地跑到天津找施剑翘，把蒋介石的命令

告诉她。

“不用您插入，也不用委员长的命令，我早准备好呀。”

施中诚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今天看着堂妹大步流星地走了后，急急忙忙提着箱子上了火车站……

### 十、孙传芳毙命

施剑翘回到居士林，心咚咚跳个不停，两腿发软地坐在原位上，万一打不准怎么办呢？枪不响怎么办呢？伤了别人怎么办呢？她越想越害怕，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挂在电杆上的父亲脑袋又出现在眼前。

仇人的憎恶面孔也一闪而过

她睁开眼，看到仇人还在默默念经，顿时怒火从心头升起，心开始平静下来，腿也不软了。

她的座位离孙传芳太远，如果突然站起来往前走，又怕引起别人注意。忽然她灵机一动，大声对旁边的人说：“后面的炉子烤得我太热了。”

“你不会到前面一排去吗？”旁边的人说。

“好！”说着，施剑翘上前走去，到了孙传芳的旁边，她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打开了手枪保险。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叭”的一声，孙传芳已从太师椅上倒了下去，又“叭叭”两枪，孙传芳脑浆四溅……

她冷静地把手枪放进口袋，又抓出一把传单，撒在院子里，高喊“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我到警察局自首。”

居士林内一片混乱……

孙传芳倒在血泊中，再也没有醒来。



1971年9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盛大招待会上致祝酒词。



力

挽

狂

澜

记「文革」时期周恩来  
与「四人帮」斗争的片断

穆欣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煽风点火，篡夺权力。祖国大地顿时沧海横流，风雨如晦，党和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的严峻局面。在此关系到党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周恩来总理忍辱负重，力挽狂澜，始终坚持自己的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稳定局势，消除动乱。既要维持国家各方面工作继续运转，又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这些努力引起林彪、江青一伙的极大忌恨，他们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对他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文革”初期，我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在未被江青一伙投入监狱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经见到、听到有关周恩来总理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的一些事情。总理的大智大勇，给我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

(一)殚精竭虑保护老一辈革命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始终把周恩来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强烈反对周恩来的情绪，随时随地流露出来。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各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总理的字，她像疯了一样似地，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抬起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啾啾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大肆咒骂宋庆龄，给她乱扣许多大帽子。12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

江青如此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并且迁怒于周恩来，绝不是偶然的。可以说既有“积怨”又有“新仇”。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宋庆龄也是受害者。上海的红卫兵破坏了宋庆龄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当墓地遭受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来的时候，“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之后拍照片寄给宋庆龄。

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也被造反派闯进去。她在北京后海北沿的寓所没有被人闯进来，是由于周恩来的

及时拦阻。这年8月30日，周恩来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送毛泽东批准，名单上的头一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两天后，9月1日，在北京出现了大字报，要求把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撤掉，并且扬言要冲进宋庆龄的寓所，同时发生了孙中山塑像被毁事件，周恩来严厉告诫北京的红卫兵：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

点。他的夫人自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sup>①</sup>

原来，在此以前，毛泽东曾派江青探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在身受这场浩劫巨大伤害的宋庆龄心目中，江青只是一个“报复心强而又权欲熏心的

文革中，中国出现“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动乱局面。图为某大学校园内贴出的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字报。



女人”。这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江青自命不凡，目空一切，完全采取教训人的腔调，把红卫兵捧上了天。宋庆龄向她建议：“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江青的脸立刻沉下来，结果不欢而散<sup>①</sup>。宋庆龄的冷漠和批评，使她不能容忍，时思报复而又受阻于周恩来的“保护名单”。她对周恩来极力保护宋庆龄免遭冲击极为不满。有一次，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江青曾经放肆地对着周恩来叫嚣：“这个你也不让批，那个你也不让斗，你的的确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

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里，周恩来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他所能保护的党内外干部。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许多人过关，使他们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得到安全。至于他极力保护陈毅、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更是众所周知，令人感动。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挫败了四人帮打倒一切、改朝换代的险恶阴谋。

## （二）在工作组存废问题上的抗争

运动伊始，林彪、江青一伙就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发生了“工作组事件”。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常用派工作组的方法加强领导，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则是维持党的领导和社会秩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组织上也是符合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这次派工作组到一些单位领导运动，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并且事先请示过在外地的毛泽东，征得了他的同意。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初不但没有表示异议，陈伯达还当了全国第一个工作组——中央派往人民日报社临时工作组组长。不久，这事却被毛泽东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指责为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成为刘少奇下台的直接导火线。

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始于1966年5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有关领导同志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去北京大学。当时经周恩来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同意。第二天，又由刘少奇起草，刘、周、邓联名写信给毛泽东书面请示派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在信上批示：“同意这样做。”5月31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张承先于6月1日率工作组进驻



1967年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王洪文等人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所谓“一月革命风暴”。

北京大学，新华社并于6月3日向全国作了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陆续派出工作组加强对运动的领导，以克服有关单位正在急骤蔓延的无政府状态和日趋严重的混乱局面。

工作组受到各校大多数师生的欢迎，也遭到少数“造反派”的反对。由于“文化大革命”本身的不合理性和在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同志同毛泽东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分歧，注定了工作组必然要犯所谓错误。江青和陈伯达、康生一伙这时乘机煽动，从中捣鬼，鼓吹“造反有理”、“打倒一切”，致使群众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有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在派工作组问题的态度上有所改变。6月9日，他在杭州忽然对前去汇报运动情况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他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实际上，这时需要派工作组的地方都已经派去了。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六·一八”事件。这天上午，北大几个系的一些学生，将40多名校、系领导

① 《周恩来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第451页。

② 宋庆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详见爱泼斯坦《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人民出版社），第19章，《文化大革命：艰难的日子》。

干部和教授带上“斗鬼台”，采取了挂牌子、抹黑脸、戴高帽子、罚跪等极端行动。工作组当即加以制止，扭转了局势。绝大多数师生员工同意工作组的做法，极少数造反派则认为这次事件是“革命行动”。刘少奇于6月20日将驻北大工作组关于这次事件处理情况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中共中央的批

示说：“中央认为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在武汉的毛泽东，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变化，陈伯达和康生、江青是清楚的。这时中央文革小组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〇年八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上。

之间在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了。

6月20日,即在北京不少院校师生造反派学生驱逐工作组并已知道毛泽东态度改变了的时候,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其中说道:“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的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他主张撤出派到各学校和各单位的工作组。

在工作组存废去留的问题上,与会的大多数同志都不同意陈伯达的意见,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

这天深夜,陈伯达气急败坏地回到钓鱼台,谈起此事唉声叹气,满腹牢骚。他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

陈伯达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以“撻挑子”相威胁的计谋没有奏效,在中央的会议上遭到反对,他并不认输(因为他已摸清了毛泽东的“底”),又在7月13、19、22日的中央会议上,连续3次对工作组提出非议。当时与会的大多数都不同意立即撤出所有的工作组,陈伯达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于7月18日从武汉回到北京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月24日,他在钓鱼台12楼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大区书记谈话时说:“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许多工作组(当然不是一切工作组),都是阻碍运动的,都要把它撤出来。”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撤销工作组。

这个时候,江青和康生、陈伯达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把工作组说得一无是处。在中央的会议上,周恩来对派工作组的事承担了责任。他说,派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地讲:“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

### (三)挫败江青镇压“联动”的阴谋

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尽管这个组织如同其他许多群众组织一样,难免在人员上鱼龙混杂,“西纠”及其他地区的纠察队里有人做了些不利于稳定的事,但是总的说来,“西纠”等组织在抑制混乱方面起过一定作用。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

的活动。8月6日,最早组织纠察队的西城区清华附中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在天桥剧场开会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到会,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还把几个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找到一间化妆室里,诡秘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注意,现在我们站在前台来支持你们,但是背后有人给你们捅刀子。你们要知道,中央内部也不一致啊。”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但当他们日益认清了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真面目,组成“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起来造“中央文革”的反,张贴反对林彪、江青的大标语时,江青一伙就翻脸不认人,站到他们的对立面,残忍地把这些稚气未退的中学生打成“反革命”,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帽子扣到这些青少年的头上,并对周恩来进行突然袭击。

12月16日,由江青一伙策动,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那天,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头都去参加大会,叫我先到会场照料。在这次大会上,江青活像一个泼妇,竟对“小将”们撕破脸皮,破口大骂。她威吓说:“对于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事先未向周恩来打招呼,当场突然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字,诬陷他们是“保守组织”的“后台”,还逼周荣鑫、雍文涛到前台低头认罪,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说:“我希望你们对些青年的、犯了错误的同学们,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坚决死不回头的执行资产阶级路线的人,斗倒、斗臭、斗垮!”

面对江青的突然袭击,周恩来异常震怒,但仍然尽力克制。人们看到,从来不抽烟的周恩来,伸手拿起一支香烟,默默地抽着,神色十色严峻。主持会议的同学觉察会场上紧张气氛和总理的愤慨,在江青还没有讲完话的时候就来问我(在江青后面接着先要讲话的是陈伯达):是否还请总理讲话?毕生经过无数惊涛骇浪,挫败过蒋介石、杜勒斯这些超级反动人物的周恩来,岂能被江青这般鼠类的恶作剧所吓退?况且先已宣布总理要讲话,这也是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的殷切期望。我回答说:应照原定议程不变。

在陈伯达讲话后,总理从容自若地走到台前。针对江青对“西纠”声色俱厉的指责谩骂,他亲切地关注地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

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像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长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这个时候，全场兴起的经久不息的热烈响亮的掌声，说明了人们的意向。

江青一伙策划这次会议背景是：这时从中学到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中，早已兴起来势凶猛的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怒潮。12月5日成立的“联动”组织，把斗争矛头直指“中央文革”，贴出“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联动敲响了中央文革的丧钟”的标语，震撼了江青一伙。12月12日，《红旗》杂志专门发表社论，提出“斗争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13日，康生恶狠狠地说：“对反对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要实行严厉的镇压！”14日，康生再次恫吓：“对反革命分子实行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这天江青在台上这番咬牙切齿地漫骂，不过是这种恫吓伎俩的继续。实际上，对“联动”的镇压行动已经开始：“西纠”、“东纠”和海淀区纠察队都有许多人被捕。总理讲到那些被捕红卫兵的时候沉痛地说：“因为他们是青年，只要他们诚心悔过，交代出犯错误的原因，就应该得到宽大处理，这样也可以更好地教育我们大家。”

同时，总理深知，江青一伙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能做得出来的。唯恐这些青少年继续遭受他们的镇压摧残，总理出于真诚的爱护，在第二天接着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为了尽早解除江青一伙镇压的口实，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总理说：

我提议现在各个学校最好取消纠察队这个名字，我希望你们自动取消。纠察队的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我们采取民主的方法，你们自己取消。

江青一伙心毒手狠，悍然下令对“联动”进行大规模的残酷的镇压，他们狡诈地躲在幕后，唆使大学生来斗中学生。就在第二天，12月18日，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及谢富治，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第一、二、三3个“司令部”和首都兵团以及一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煽动他们镇压西城、东城的红卫兵纠察队。

本来，11月20日中共中央刚向全国批转的《北京市委重要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的法律和党的纪律。”同时规定：“如果有人在前幕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江青自居特殊，完全无视这个通知，继续在

“幕后指挥”，还把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找来，一起给这三个“司令部”的非法抓人的犯罪行为出点子，使它转为“合法”化。江青说：“听说你们抓了很多人，我很怕你们走向反面，犯错误。抓来的人，你们可以交给公安部，让他们替你们管，告诉公安人员管好，随叫随到，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

提起红卫兵纠察队，江青咬牙切齿地说：“红卫兵的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她还恶狠狠地说：“北京的这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死刑；年轻的可以死刑缓期。”关锋说：“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查出，严重的枪毙！”

有了尚方宝剑，三个“司令部”的“司令”立即对红卫兵纠察队——“联动”大举镇压。谢富治指挥蒯大富、聂元梓等，先后数次调动数以万计的大专院校学生，配合谢富治下令调派的警察，连续对许多中学大包围、大搜捕。最多的一次，1月25日下午4时，谢富治指挥蒯、聂之流调动三万余名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八一”学校围得铁桶一般，把这座具有光荣历史的中学砸得稀烂，逮捕32名同学。两名同情学生的教师也被当作“联动”投进监狱。这次疯狂的搜捕，逼得大批青年南下逃亡，举国哗然。这些被江青所追捕的青少年都是革命后代，周恩来异常痛惜，忧心如焚。有100多名十几岁的“联动”成员，被他们当作“专政对象”关进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囚禁了3个多月。直到4月22日，才把监狱大门打开，把他们释放出来，送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会议室，等候总理接见。

看到周恩来总理走进来，孩子们全都站起来。都像受了委屈的儿女见到了亲人，顿时哭声喊声交织一片。总理一边招手，一边审视着这群衣衫襤褸的“小囚犯”，眼睛也湿润了。总理挥手让大家坐好，先问：“董良翻在不在？”又问：“谁是孔冉？”他们都满眼泪，默默地站起来。董良翻是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儿子。是董老能严守组织纪律，老老实实交出去的（这天董良翻回到家里，董老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你是替我去坐牢呀！”）。孔冉的母亲许明是总理的秘书，已因不堪江青的迫害凌辱含恨而死（死后江青还恶狠狠地指控她是“联动”儿子的“后台”）。总理对孔冉说：“你父母的情况我都了解，你不要难过，你们是党和人民一手抚育大的，你们是党和人民的孩子，受了挫折不要灰心，要继续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总理讲话的声音低沉。人们看到，他那深沉的目光里饱含着对革命后代的爱怜和一种难言的痛楚。



1971年10月周恩来在北京化工厂视察时，了解该厂生产情况。

下令搜捕他们的祸首江青和陈伯达、康生及戚本禹也都在一旁坐着。这次是根据毛泽东的命令释放的。江青等人虽不甘心认输，却也无可奈何。总理生怕孩子们再受折磨，这时面向大家，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的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一贯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

#### （四）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混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总理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

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待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总理。1966年12月24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总理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七点钟召开，可是到八点多钟，总理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师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

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总理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举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事端的。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总理和老师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革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76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总理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

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总理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了她对总理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可是，尽管有不同意见，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暗中背着有不同意见的人，兜售他们的私货，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给周总理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总理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这张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的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作过一个不完整的统计，仅从1966年8月到12月的三个月中，总理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有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年1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就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就多达230次之多。毛主席1968年8月18日到同年的11月26日，在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举行政治局碰头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等对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干部和乱党、乱军的活动，进行大义凛然的斗争。图为中南海怀仁堂。





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总理亲自安排。从毛主席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总理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总理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年10月18日,正当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时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连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第一次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总理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主席接见活动。因为总理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进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总理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总理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总理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总理早已洞悉了这个被人们耻称为“犹太”的丑恶嘴脸,他是靠着“揭发”诬陷他的老上级邓小平,投靠江青一伙而迅速高升的“新贵”。他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逼使总理和老师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总理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和江青一伙政治地位的提高,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急于搬掉阻碍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绊脚石”——周恩来,对周总理的折磨、刁难和冲击,也从暗处转到明处,由隐蔽而公开化。

文革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总理“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

攻击周总理,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江青一伙甚至利用1932年2月18日,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伍豪启事”来攻击陷害总理。文革后期,又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诬蔑周恩来是“现代的大儒”。

面对这些无耻的攻击诽谤,周恩来总理岿然不动。他忍辱负重,力撑危局,并不因此而停止与江青一伙人的斗争,尽力稳定当时的局势。这使江青一伙更加忌恨,必欲打倒而后快。1967年的8月江青一伙就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政治家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他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他为挽救国家民族危局的又一次不可磨灭的功绩,将永世留存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方徨)



## 邮购 启事

本刊尚有创刊号至1992年年底(共9期)合订本,有需要者请汇款至本社邮购部郭小姐(北京市文津街7号,北京图书馆分馆内,邮编·100802),定价:30.20元,另外加收邮费百分之十。款到寄书。

# 将 军 作 战 在 狱 中

——缅怀叶挺军长

○吴 越



这是我第二次关进一个大家都叫它为“死囚牢”——茅家岭禁闭室后知道的事。这里除原先关在一起的老李、刘正心、和吴必成外，又增加了一些同志，他们是钟袁平、赵坤、王传馥和徐师良，他们来自好几个地方禁闭所，才来不久。

一天，我的刑伤好些了，正和大家一起谈这谈那，有人谈到上饶集中营的许多“单位”到底最早成立的是哪个？徐师良说：“七峰岩禁闭所可能是最早的，听说叶军长先就关在那里后来又转到李村。……”

“啊？军长！”我简直叫了起来，“军长也在这里！”

“你见到军长了吗？”我稍镇静下来，问徐师良。

“我没见着，”老徐平静地回答，“但王聿先曾在军长身边二、三个月，我和王传馥后来又都和王聿先同关在石底，我们从他那里知道的。”

我们都迫切希望知道军长的情况，目光都集中在徐师良和王传馥身上。

他俩互相看了看。

“这好！”王传馥说，“晚上我们讲。”

晚会开始了，是在卫兵进来点灯之后，暗红的灯光似乎给笼子里增添了一点生气和温暖，于是大家自然地围坐在一起。

老徐习惯地搓一搓手，两眼往屋顶上翻了几翻。

“军长被俘很快就给送到上饶了，顾祝同高兴极了，满以为得到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

“顾祝同原和叶军长是保定讲武堂的同班同学，他当然毫不放松利用这个老同学的关系向军长进攻，军长一到上饶时，顾祝同就亲自迎接，口口声声称军长为‘学长’，还把李村监狱叫‘招待所’，把设有武装门卫说成是为军长的安全；此外，顾祝同还特派三战区的总参谋长卢旭总管‘接待’，卢旭也是保定讲武堂出身，对待叶军长更‘谦恭’，见面说话总立正，口称‘学长’。

“卢旭和当时的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还时常到叶军长那里去向寒问暖，‘寒暄’中两个家伙不只一次地声称他们的司令长官是以老同学之情谊对军长如何‘尊重’，还特地透露：由于他们的司令长官对军长才学推崇备至，已上呈‘委座’，‘委座颇有意……’。

“军长已洞察敌人心肺，只一笑置之，对卢旭没有马上申斥，心里却在狠骂敌‘卑鄙’，决心要给他们点教训。

“卢旭注意到军长的笑容，这可能使他总朝自己希望的方面想，以后去得更勤，态度更加‘谦恭’，有时甚至坐下都只半边屁股落上板凳，一开口奉承话总不停，



新四军军长叶挺

脸上总是堆起笑容，问：生活上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需要？……”

“有一次军长给惹烦了，推开椅子站起，面色严正，高声说：

“‘我要的是自由！’”

卫兵在门口朝里张望，大概觉得这个晚会比平时长些。

“你们不睡觉？”

“早哩！”刘正心说。

“有一天，”徐师良的上海近郊的乡音又响起，“卢旭到叶军长那里去，还叫人牵了一匹马。

“卢旭一见军长的面就满脸堆笑，代表顾祝同‘致意’，还说：‘长官近来因军事繁忙未能常来亲聆教益，深为歉疚’……并说‘司令长官今天特设家宴，为军长洗尘，并一叙同窗情谊，务请光临’……。

“军长一听明白，果然敌人来了下一步骤了，他本想严辞拒绝，但一考虑，正该当面给顾祝同教训一番，军长答应去了。

“卢旭高兴得真想跳起来了，如果不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有一批副官、马弁在侧的话。

“顾祝同对那个‘家宴’经过一番安排，酒席设在自己的书房里，以示‘亲切’；关照厨师做几道适合广东人口味的精致菜肴；还特地安排自己姨太太上桌斟酒。

“那天叶军长一到。顾祝同连忙迎到台阶前面，请进自己的书房。

“宾、主坐定。出席作陪的除卢旭、上官云相等还有三战区总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及其他二、三个高级官员。顾祝同把各人和自己的姨太太熬有介事地都一一向叶军长作了介绍。

“军长正襟危坐，态度庄严极了，从顾祝同见面寒暄起直到席间的介绍一直都保持沉默，有时只有若无其事地随便点一点头。

“酒宴开始了。顾祝同又讲一些‘客套话’，接着就举杯向叶军长敬酒。

“军长还是正襟危坐，只微微抬掌，以示滴酒不沾。

“顾祝同只好自己放下酒杯了。其他官员也都如此，接着，正戏开场了，顾祝同未曾开口就满脸堆笑地说：

“‘学长自屈尊以来，招待不周，都是下属未能体念兄弟初衷，实深致歉！’

“说到这里，顾祝同又举杯敬酒。

“军长还是让杯子摆在面前未动，严峻的目光只是对着顾祝同的脸；他冷静，面前的杯、盏、满桌菜肴和桌边的一些人们在他的眼前都只是‘地形’、‘地物’，他思索这场战役如何打法。

“顾祝同又干笑两声，自己呷了一口酒，抬眼望望军长脸色，不自然地提高声音说：

“‘兄弟，顷接，委座……’。

“顾祝同刚一说出‘委座’二字，忽然习惯地双臂下垂，卢旭等人也都把两只胳膊夹着自己的肋巴，一动不动，顾祝同又慢吞吞地说道：‘委座素知台端并非共党内人士和在新四军的处境，项英飞扬拔扈；现在，大局已定，责任分明。委座实深体念及此；愚弟念保定同窗之谊，且素仰兄台明达，如能……，’

“军长以极度忍耐听着顾祝同的独白；可是话到这里，底下是什么，不说也完全明白了，于是击碎酒杯，正色道：‘我叶某深明大义，你们要拿什么官衔为价，要叶某出卖革命，出卖祖国和人民，是不是？你们要叶某发个‘声明’，向你们投降，还为你们的滔天罪行做掩护，是不是？卑鄙，卑鄙！可耻，可耻！’

“军长站立起来，炯炯目光直射顾祝同的脸，吼叫

般大声说：‘你们打了十年内战，打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大敌当前，河山破碎，人民流血遍野，你们还在枪口对内，充当日寇的急先锋！皖南事变的责任到底属谁？到底是谁在对祖国叛乱？谁在违抗抗战军纪？……’

“军长呼吸稍稍平静下来又说：‘什么‘军纪问题’？你们别想一手遮尽天下人耳目！纵使退一万步如你们所说，我叶某身为新四军军长，希望你们对我公开组织军事法庭，公开把真象大白于天下！再说：我是军长，一切与我的部下无关，我在这里就向你们严正提出：你们必须恢复他们的自由！’

“叶军长推开座椅，昂然大步地走出门外。

“目瞪口呆的顾祝同、卢旭、上官云相等一下都慌乱起来，接着顾祝同举目向卢旭示意。卢旭马上外出，指示下属，加倍派上武装人员押送叶军长回李村秘密监狱！”……

徐师良说到这里，全监房里寂然无声，我觉得面前屹立一座山峰，它是那样的巍然，构成这山峰的是它自身的真理与正义！

老徐知道这种静穆的意义，略停一下，又习惯地搓一搓手，继续下去：

“军长在敌人的严密的卫护下步行回李村秘密监禁所，马是没有了，对于这个，军长已经看到敌人的嘴脸，但还不以为意，觉得散散步也好，好在李村离顾祝同长官部所在地的皂头不算太远，军长一路上心里充满着胜利的高傲。

“叶军长回到了牢房，顺手从火盆边捡起来一块木炭，在墙壁上写了每一笔划都刚劲如铁的五个大字：

威武不能屈！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九点钟，卫兵又按时地把饭送了进来。可是这天，除窗户上增添了几根木柱外，伙食上也有变化——以前的菜是二荤一素，今天是一个荤菜了。

“军长又笑了一笑。

“吃过饭不久，当他想去解小手时，发现墙角那只便桶没有了，平时都是卫兵早上来提出去，倒过后又拿回来的。

军长觉得有点奇怪了，问卫兵：

“便桶怎么还没有拿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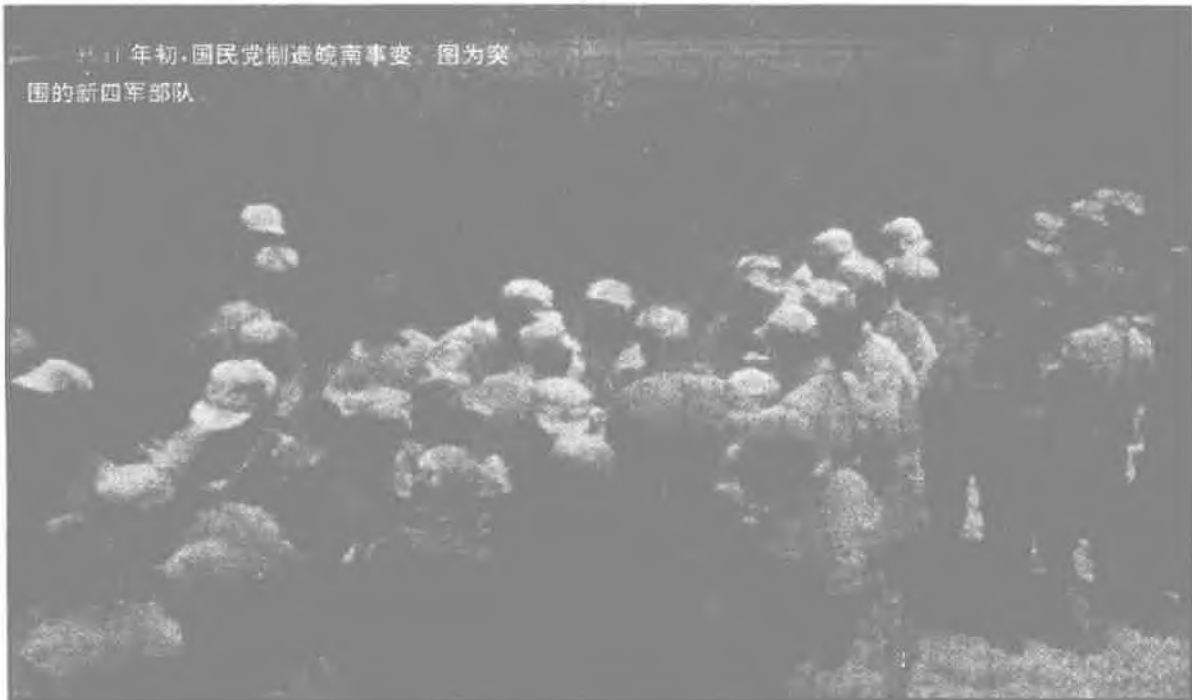
“卫兵只好老实地说：

“长官部命令：便桶不给拿进来了。”

“那么让我出去解手！”

“报告军长：我们没得到命令。”

1947年初，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图为突围的新四军部队。



“军长一听，连连骂道：

“‘卑鄙，卑鄙！小人，流氓！……’”

“军长气愤极了，就只好把小便撒在墙根。

“到了傍晚，平时卫兵都来给他生火盆；这回，连这个也给取消！……”

“只是以后，敌人把便桶又拿进来。”

对于敌人这些卑劣行为，有的同志骂，有的同志冷笑。

过了一会儿，老徐又说：

“军长一个人被关在李村监狱已经二、三个月了，孤独、精神上的痛苦是要比我们超过万分的！”

“三、四月间，叶军长感到身体有点不适，一天，陈淡如来‘拜望’他时，他提出要看病，陈淡如马上要找医官来。军长拒绝了。

“‘我的军医就在你们这里，调他来！’”

“王聿先和军长是最早被押到上饶的少数同志之一，后来就不在一起了。

“特务们大概请示了顾祝同，过两天后，王大夫调来了。

“王大夫诊视了军长的身体，其实并无大病；但还是开了药方，交给特务去取药，接下，王大夫提出：叶军长的病得经常检查和看护，需要留在他身边，还提出军长的侄儿叶育青，原是军长的随从副官，也得调来协同

照顾，叶育青当时被囚禁在石底监狱。

“特务们请示上级后，也同意了。

“军长和王聿先估量：敌人之所以答应他们的要求可能有自己的打算：一则料想他们在严密的监视下不可能有所作为；二则，王大夫和叶育青都非共产党员，军长和王聿先估计敌人对于我们除弄清职务外，不能不弄清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三则，也是最重要一条，敌人未尝不需要藉此表示‘宽大’，企图实现‘软化’的梦想，在这之前已恢复了伙食标准就是先例。

“叶军长要求调王聿先来看病其实是借口，主要为的有个人来谈谈，以解寂寞。后来叶育青也调来了，当然更好。

“李村监狱原先是个三合院，军长当时住的是正屋东间，正间门口有张藤椅，军长平时坐在那里晒太阳，还有一张桌子，是军长吃饭时用的。西房空着，王聿先和叶育青来就住在那儿，院子的两侧厢房住的卫兵班和自称为‘副官’的几个小特务。

徐师良迫切向大家倾出自己的心底。

“六月下旬的一天午后，王大夫和叶育青正在廊檐下乘凉，在跟宪兵闲聊中不知扯上了什么，宪兵说：

“你们更完了，苏俄都完蛋了！”

“这话来得突然，怎么？苏俄都完了？这话如果来自特务口里倒不会使他俩奇怪，他们惯于造谣，这次是出

自宪兵之口。

“‘怎么?’王聿先和叶育青吃惊地问。

“德国快打到莫斯科了,你们还在数里?”

“王大夫连忙追问宪兵是怎么回事,宪兵说:‘希特勒就要攻下莫斯科了。’

“他们立刻进屋,把这消息报告军长。

“军长正坐在藤椅上闭目养神(轻轻地摇着芭蕉扇,对刚才他们在门外对话可能听到也可能没听到,可能即使听到了也没当一回事),听了王大夫的报告,只微微点点头。

“过不一会儿,以陈淡如领头,好几个特务进院子里来了,大声嚷道:‘苏俄完了,苏俄完了!苏俄垮台了!……’

“这阵叫嚷使军长觉得奇怪,已注意听。

“陈淡如进门后,脸上带着得意的神色,故作恭谨地把一张头版朝上对折的《前线日报》递到军长手中。

“军长自失掉自由以来本就时刻都希望能看到报纸,多少可以得知外间消息,可这时报纸一拿到手,却仍不失作为一个将军的镇定接过报纸,他仔细地看了两遍,消息的确报导了斯摩棱斯克失守,塔斯社自己也不否认,德国法西斯的攻势矛头确是在指向莫斯科。

“军长接着又翻翻其他版,把若干其他新闻条目随意过目一下,随后就把报纸搁在一边,闭目凝思。

“屋内肃静无声,陈淡如和一帮中、小特务们都站在一边,个个眼睛一直不离开军长的脸,在窥测军长的表情;有几个小特务还不时相互挤眉弄眼。

“‘战局哪一天开始的?’军长问。

“‘六月二十二日’,陈淡如回答。

“‘你们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拿报纸给我?’军长两眼瞪视陈淡如。

“‘嗨嗨,这,这个……’陈淡如尴尬地笑。

“‘你们不是很高兴吗?’军长说着站了起来,在屋子里缓缓地踱了几个来回,眼睛谁都没看,而后弯下腰来,从墙根拾起一块木炭,那还是冷天烤火时剩下来的,在墙壁上,也就是在那笔力刚劲的“威武不能屈”五个大字的近旁,根据报章上报导的情况画了一个苏德战争形势图。

“王聿先和叶育青坐在一边都屏息无声,气氛严肃。军长的身材比平时仿佛更加魁伟,他的深邃的两眼里发射出一种坚定而又自信的光辉。

“特务陈淡如坐在一张骨牌凳子上十分不安,好象那张凳子表面是有棱角的,不住地欠动着身子,眼光闪烁不定,而且不住地望向大门口,脸色象是很紧张的样子。

子。

“小特务们更不知道军长画地图是什么意思,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不时地互相交换眼色,有的连咳嗽也轻轻的,用手绢捂着嘴巴。

“军长很快把地图画好,转过身来望望王大夫和叶育青,随后又扫视一下特务们,用一如平时的宏亮、爽朗的声音说:

“‘来来来,我把战局分析给你们听听。’

王聿先和叶育青凝神。几个特务带着忐忑不定的心情,聚拢过来。

“‘报上不是说’军长冷静地说:‘希特勒已经占领斯摩棱斯克而且还在迅速进展吗?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这是希特勒在用闪电战术,这个战术的特点是:一开头来势凶猛,他们把最强的火力都用在第一线。’军长用指头敲着墙壁上地图表示希特勒进攻的方向,同时眉头上显示出思索。接下,说明希特勒进攻苏联这样的大国家,在第一线上至少得出动飞机多少多少架、坦克多少多少辆、摩托部队若干师……。王聿先说许多有关具体数字他记不明确,只是单位很大不是千就是万。

“军长又望望在场的人。陈淡如听得入神,但接触到军长的炯炯目光,不由自主地把眼睛低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了一下。

军长正讲得有兴致,卢旭偕同其他几个什么人来了,王聿先只认识其中的一个大高个子,名叫唐肃,以前也来过,特务们来得急促,卢旭大概是骑马的,其他人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都脱下军帽直扇风。

“卢旭一眼看到军长正站在那里指着墙上的地图,便皱起脸上的肥肉,“嗨嗨”地笑了两声,说:

“‘军长在指挥作战吗?’

这句话明是刻毒的讽刺,却把腔调装得真象对老同学开玩笑似的。

“军长并不理睬这个,却向他们招一招手,说:

“‘好好,来来来,坐下,坐下,你们来的正好!’

“陈淡如早已起身,连忙把自己坐的凳子端上给卢旭,而后自己谨慎地把半边屁股搭在墙边的一只凳子上,小特务们把原先自己的座位让给唐肃,都叉手站在一旁。军长平时坐的一只藤椅子却空在那儿,卢旭不敢坐,中小特务们更不敢坐,尽管军长也没坐,但是,好象军长的威风还在那儿。

“‘你们看’,”军长继续分析道,‘希特勒把他的最大赌注,也就是主力几乎全部放在第一线,可是他的第二线、第三线,’军长把手掌微弯着从苏联西部往波兰和德国本土方面移动,‘必然陷于空虚。补给线长,后方

空虚,这是军事上的致命点!’

“军长说到这里停下,把目光射向卢旭,那炯炯目光好象发出质问:‘哼,你也是保定出来的。……’

卢旭只尴尬地一笑,默然无声。

‘那么,’陈淡如欠一欠身,虚伪地一笑(好像这也是特地显示他曾是新四军军部的‘常客’)‘愚下不揣冒昧,不管怎样,事实上岂非苏俄失败,德国胜利了吗?’

“你们不要替希特勒法西斯把‘凯歌’唱得太早!”军长双目炯炯如炬,我知道你们这些日子天天高兴,为希特勒鼓掌,大喊大嚷什么‘莫斯科失守’‘苏联灭亡’……只怕喉咙都要喊哑了,你们不觉得比戈培尔的喇叭吹得更加卖劲吗?可惜他们的运气并不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好,你们只怕还来不及领宣传费,老板已经跨台了!’

“说罢,军长用严厉的目光扫视一下特务们的脸。

“大小特务不吭声。卢旭最老奸巨滑,不管军长在畅谈战局还是责骂他们,那油光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军长不理睬,继续说下去:

“‘好,我们还是谈战局吧。希特勒的目标不是莫斯科吗?他不可能单靠正面楔入,西北,他得拿下列宁格勒,南面,他得攻下罗斯托夫,还要控制敖得赛港;这样’,军长用手掌的侧面在墙上炭画的草图上从北向南扫个弧形,‘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在这广阔的地区他的第一线兵力,摊饼似的铺开,这个又是军事上一个致命弱点!这个“扇面”展开的形势最危险,希特勒的部队不但前后容易失掉联系,左右也难联络,这一来,他的每一路军队都有被切断、被包围、陷入四面受敌的危险。这是他不可克服的矛盾,他把这矛盾一开始就自己给自己造成,而且今后战线深入,这个矛盾也越加深!

“王大夫说:上次听到军长分析皖南局势,他已深深地折服军长真是军事天才,同时更痛心这样的军事天才只有汀泗桥一战得以发挥,这回再听军长如此具有准确性和预见性的纵论法西斯侵略苏联的前途,对军长的军事天才更敬佩之极了。军长讲到这里,望望他和叶育青及全屋子里以卢旭为首的大小特务们,面容平静,愈益使人觉得他焕发着无穷睿智的光辉!

“‘嗨嗨,’军长刚一说完,卢旭开口了,一些话大概早就把他的胸膛鼓得快要开裂,语调却尽力做得平静,装得特别客气,他以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对于军长说来,也不下于希特勒大炮之于苏俄。‘愚弟颇需要请教军长: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法兰西、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还有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等十数国家都迅速被覆灭,如秋风之卷残叶,又将如何

解释?这岂非正是反证:希特勒并非如台端所谓因‘矛盾’而减弱,倒恰如其反,何也?愿聆高见!’

“特务们活泼起来了,陈淡如眼睛里含着笑意,朝他的参座点头,挑战似地望着军长;小特务们差一点也都要摇头摆尾起来了。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军长坦然地望着卢旭,又扫视一下全体特务,说:‘我军任何战士都能解答,我现在只用三句话把这道理说明,你们要牢牢记住:国土占世界六分之一的苏联可不是比利时、卢森堡……;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也决不是欧洲任何资产阶级的腐朽国家机器;更何况,二亿觉醒了的苏联人民在历史上就曾经击退十四个帝国主义的进攻!’

“‘从现在情况看来,希特勒长驱直入了,这也说明苏联准备不足,苏联措手不及,是重信守约的,相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文实际的作用,这也是国际间的起码信用,人与人间的起码道德嘛!可是强盗和流氓并不要这些,他们常是两面三刀,口蜜腹剑的;甚至认贼作父!我们新四军吃亏就是太把不是人的东西当成人了!’

“‘当然,现在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苏联吃亏,丧失了一些土地,将来还要丧失一些;但是,赢得了时间,借以调动兵力,加强布署,组织反攻,这在战略上叫做‘以空间换取时间’。现在看来已快到这样的时期,苏联将从不利逐渐转向有利,法西斯德国恰好相反。’

“‘那,那,结果能会怎样呢?’

“‘结果吗?’军长微笑笑‘希特勒走拿破仑的老路!’

徐师良复述了王聿先关于军长对于苏联卫国战争形势的概略分析之后,大家跟听到上次关于皖南事变战局的分析之后一样,又是谁都半天没有出声,谁都没有发问,大家的心中好象又都对军长作为一位军事天才的敬重和痛惜;在沉默中,更是怀念军长,担心他今后的遭遇!

在这样的沉默中,我的心中忽然出现一个似乎距离已经遥远、遥远的形象——一个身材挺拔的中年人,身穿不带领结的、褪色的灰色西服,以手杖轻拨着路边石子在云岭山边悠然地散步,眉宇间重结着无限忧郁!……

“军长后来怎样?”吴必成的粗重的嗓音首先打破沉寂。

“后来吗?”老徐眼睛下垂,声音是缓慢的,“王聿先和叶育青谈到一些,陈子谷也谈到一些。”

“陈子谷?”我惊诧地问

“陈子谷?”刘正心也惊讶地睁着眼睛,接着望着

我，“你们该是最熟的。”

“是，”我说，“我将来向你们介绍，现在还是让老徐继续下去吧！”

本来一吃过下午饭，大家就已围坐到一起了，这时已到卫兵来点灯时候了，闻惯了樟油烟气味和昏暗的灯光又笼罩整个牢笼。）

“这个只能算个插曲，叫人恶心的插曲。”老徐继续说，“有一句古话：‘黔驴技穷’，（肯定那些驴子头脑里也实在空了，）他们对军长‘优待’、劝降、设酒宴，挑拨、高官诱惑、成群特务的围攻直到打出最大一张王牌——‘苏联失败’都破产了；最后，竟用上了一条蛆虫！……”大家都望着老徐，人人对老徐的这句话费解。

“这条蛆虫名叫赵凌波……，”老徐继续说。

一听老徐提到赵凌波，我的眼前忽然闪出一个形象，——一天在去南陵路上遇到一个身穿缴来的鬼子黄呢大衣的骑马的人，瘦尖尖的脸，四十来岁，脸色跟当时下雨的天空一样阴沉，这人常到新一支队来，那时是军部的一个参谋处长，说话是四川口音。

“赵凌波被俘以后，”老徐说“很快就叛变了，敌人就到处大叫大嚷，‘你们的参谋长觉悟啦，你们的参谋长都觉悟啦，你们的好多高级官员都隐瞒不住真身分啦！……’听说一个小特务还笑着找李子芳挑衅：‘你真的叫‘钱子英吗？’

“啊，李子芳？”我们几乎又是全体呼叫起来的声音。

“那个监禁李子芳同志的秘密地方叫石底，关于石底的情形，我们以后再介绍。”王传馥平静地说。

“敌人得到赵凌波如获至宝”老徐又说，“不但大叫大嚷，还故意都把‘处’字略掉就称‘参谋长’，到处宣扬：‘哎呀，抓到新四军的参谋长啦、新四军的参谋长自新啦！……’

“敌人拿这条蛆虫已派过不少用场。”这回老刘插话了，“记得还是春天时敌人还叫他爬到讲堂的台子给大家讲话哩，结果被一阵嘘声轰下去了！”

“这次敌人竟又昏了头，叫赵凌波到叶军长这里来了！”老徐接下说，“王聿先他们说，是七月的不知哪一天，赵凌波被派到李村，住在军长住的那个院子的厢房里和几个小特务在一起。这事起初谁都不知道，他到了那里就象老鼠躲进了洞不敢冒头。

“有一天，王聿先不知什么事到院子里去，偶尔看到了这个东西，赵凌波赶忙出来打招呼，还说要见见军长。王聿先愣了一下，没理睬他。

“王大夫回来，把赵凌波给特务派到这里来的事报

告了军长。军长正在屋子里悠闲地踱着，一听，立刻眉毛竖起来，两眼冒火，连忙大步走到床边，抓起自己的那根手杖。

“恐怕我们谁都熟悉这根手杖是军长使用惯的，除在云岭散步时常带它，指挥作战时也不离手，这时还保存在身边。

“军长抓起手杖正要冲出门口，恰巧小特务们来了，拼命劝阻。王大夫和叶育青也说‘他是狗，打他，手杖也脏了！’

“军长怒犹未平，又从墙根找出两块石头，搁在门旁说：

“这个狗东西，莫想到我跟前来，看到他在门口一冒头，我就砸死他！”

“后来这狗……”

“还该说是蛆虫，一直没敢跟军长照面。……”王传馥补充一句。

“是呀，”老徐说，“连狗不如！这是插话，不必再去提了。……”

“据王聿先看来：还是在春天，‘军长把形势估计得比较乐观，大概后来观察情况发展，有了新的看法；军长时常谈起：‘敌人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他们即使不枪毙你们，至少也得枪毙我’。

“有时还半开玩笑地说：‘要枪毙，就是这里顶好，弄到山凹子里去，可不行呵！’

“军长估计自己牺牲是不可免的，但是每天谈笑自若，和王聿先、叶育青他们下棋也挺认真，每一步棋都细细研究。

“在日常的谈心中，军长常勉励自己和他们两人，常说他们三人尽管都不是共产党员，但都受了长期的党的教育，要以真正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来要求自己。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军长常说：他自己曾经指挥千千万万人作战，现在，身边是没有一兵一将了！”

“每一提到皖南事变，军长更痛心，常常坐都坐不住了，连棋都下不下去了，常常起身在屋里踱来踱去，踱得很久。

“王聿先说，有一次，军长又在踱步，踱得很久，突然站住，炯炯的双目望着远方，威严不下于当初的望战场，沉默了半天，军长说：‘皖南战事的失败责任现在就不去谈它了，当我现在即使只有你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时时也觉得仍在作战，我依靠的不是枪炮而是真理和正义，这武器是永远无敌的，我不会失败，永远不会失败！’

“军长还时常以自责的精神谈起在澳门居住十年



的事。他说自己尽管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在澳门居住时也在读书、学习，而且经常从各国的报纸上搜集有关红军的真实消息；但是，究竟是脱离实际斗争了，而这十年，在中国的革命历史上又是怎样艰险历程，自己竟没有积极参加，他感慨着人生的战斗道路是多么的曲折，一个革命者的成长要经过多少锤炼和努力！

“军长还不只一次提到：自己已经四十六岁了，四十六岁正应该……可是，每谈到这里就不再说下去。只有一次说道：‘皖南战事的失败，不管原因是什么，在我说来，也是一生最大的失败，如果我还能再有机会工作，这次失败也许正是今后胜利的开始；但是，也许，这次失败在我说来也是最后一次，一生最最可悲的终结！’王聿先说：每当这个时刻，军长的心情他们都最理解，也都心里难过，特别从他的眉宇，从他的目光，从他的轻声慨叹之中。……”

“军长在狱中，除去始终以磅礴正气对敌人斗争外，还密切关怀着抗战形势和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以前敌人把外界的消息对军长封锁极严，报纸绝对不许到达叶军长手里。后来，自从陈淡如依照上级的阴谋计划拿来那张报导苏军失利的《前线日报》后，军长就要他们每天拿报纸来。后来虽然不能每天看到报纸，但总算又看到几回。军长根据报纸上的零碎消息不断地研究战局。他以一个革命军事家的广博知识、经验和敏锐目光，往往把敌我双方情况的发展，无论国内的日寇进攻和苏德战争的战局都预见得惊人的准确。王大夫和叶育青都从此受到不少的教益。……”

“不知叶军长对我军扩编为七个师的消息可知道？”我问。

“啊！”徐师良、王传毅和其他几个同志几乎同时发声，兴奋得都要跳了起来。

“你们不知道？”刘正心问。

“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啊！”王传毅差一点叫了起来。

“早知道你们还蒙在鼓里，我们早报告这天大好消息了。”老李笑笑说，“现在不是知道了吗？还是叫老徐谈下去吧。”

“不，你得具体告诉我们！”王传毅坚决要求。

老李把《前线日报》上的那条消息几乎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了，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陈毅任代军长。

“啊，假使军长知道我们大军更加威武地驰骋在江淮南北，会是怎么的安慰呵！”王传毅深深慨叹地说。

“军长假使知道我们有这么多人在这里正和他在一条战线上共同战斗，他的心情又该是怎样的呵！”我

望着徐师良、王传毅说。

“肯定一点都不晓得。”老徐说，“王聿先、叶育青也不晓得。”

“快说军长后来怎样吧！”

又是吴必成最耐不住性。

“好，我这就说，‘大约七月下旬光景，一天，一个面目狰狞的特务王寿山，带了一个宪兵来到李村监狱，把王聿光和叶育青带到小特务们住的那个屋子里去，要他们马上收拾收拾，调去受训。’

“两人明白情况要有变化，带着极为不安的心情回到军长那里，跟军长说了。

“那时军长正安坐藤椅上，听了他们的话后沉吟片刻，神态如常，只是微微点头，轻声说：

“‘是的，我早就预料到了。’

“接下，军长站了起来，伸出两只大手，分别用力地紧握住王聿先和叶育青的手说：

“‘要坚持斗争，坚持就是胜利！’

“军长放下他们的手，用长辈温和、亲切的语调说：

‘好，你们去吧，别挂念我。’

“王大夫和叶育青两人都咽喉梗塞，紧紧地咬住嘴唇，努力在军长面前克制住感情。

“二人回到共住的那间西屋收拾铺盖、碗筷、洗脸手巾、牙具，心乱如麻，不是找不到这样就是落掉那样；时常呆站着，不知该干什么。

“几个小特务又进来催促，有的代替他们动手收拾，不管是谁的东西都捆在一起。

“他们走出自己的屋子，眼睛一直没离开军长。那时军长又坐到藤椅里去了，神态庄严，双目望向院门外的远方。

“军长知道他们出来了，目光移向他们，大声说：

“‘如果回到军部，要大家好好总结这次的教训！’

“他们又跟军长紧紧地握手不忍离开，后来几个小特务和宪兵强行把他们拉走了。”……

### 本刊读者服务部迁址启事

本刊读者服务部已迁至朝阳门外金台西

路2号北京机械学院分部新二楼办公。

邮编：100026。

电话：6071631—514。

特此公告

○刘伯正  
傅燕新

# 税收： 最长与最短的思考



## 明星税案

1990年9月份,在沈阳体育场,某家电视台办了一场大型焰火晚会,邀请了东方歌舞团、广播乐团、空政文工团等几十位文艺界的“大腕”。晚会上,明星们个个登台亮相,献技献艺,赢得了如潮水般的掌声,气氛热烈。自然而然的,明星们也都获得了一份颇为可观的收入,每人1000元到1500元不等。回到北京,得到消息的税务专管员把电话打到一位女歌星李某的家里,李某不在家,她丈夫说:“她没跟我说过这件事,我不知道有这笔钱。”电话又拨给两位笑星,笑星说:“我们是义演,没给钱。”到了1990年12月份,一无所获的专管员把电话打给一位歌唱家,以期获得一点进展,歌唱家说:“演出每场给500元,但现在一直没给。”

四处碰壁的税务专管员只得沮丧地搁下电话。因为个人收入调节税采取的是个人申报制度,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明知有税款漏掉了却也无可奈何,而名人所交的税款只占个人收入调节税的一小部分,况且我们税务机关本来人力、经费就紧张,哪有精力整天跟着明星屁股后面跑呢?

陈某是某部队歌舞团的舞美设计,从中央电视台取得了600元的收入,按规定应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50.25元,当专管员按检查的数字找到她时,她说:“那不是我的钱,是舞蹈演员的钱。”当专管员第四次找到她并要求她申报时,她说:“那是稿费。”“你们税务局找我交税真是可笑,没意思。”虽然50块钱的税款最后还是入了国库,但陈某又找到了税务分局、市税务局乃至国家税务局。

一位颇有名气的相声演员在天津演出,税务人员得到确切消息后,找到这位笑星请他纳税。这位笑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一失往日在舞台和银屏上的幽默,愤然将应纳的税款抛在地下,然后扬长而去。

1991年元宵节,北京两个近郊税务分局联合举办一场慰问演出,邀请了那英、毛阿敏、蒋大为、孙国庆等二十来位著名演员在京西宾馆同台献艺,其中某位名演员的开价也很内行:税后(指交完了税)3000元。“税后”二字体现了这位明星对税收的深刻“理解”。

当笔者与几位同事谈到税收时,他们的回答很干脆,也很满不在乎:“不就是点儿税吗!”那言外之意就是:我挣得多,还在乎交有限点儿税?遗憾的是我的这些同事没有一个能够得上交税的水平。而当与那些“够水平”的人谈到同一问题时,他们的回答是:“多劳就应该多得,劳动报偿应受到尊重。”与其说同一个问题反映了两个不同收入层次的人的不同心态,不如说是在

经济大变革时期,税收与国民心理撞击出的火花,即不是经济不堪负重,而心理承受不起了。

经济收入陡增,能使人摇身一变,不但腰杆子硬起来了,连说话的口气都硬起来了;然而当这些人不想承受税收负担的时候,似乎只能说明他们的公民意识发育仍处于低线。

1992年3月24日下午,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分局召开的一个《个人收入调节税征管办法》座谈会。几位代表的谈话非常耐人寻味。

总政文工团一级演员郁均剑先打头炮,他说:“税务局对我们所谓的名人来讲是比较害怕的一个部门。现在,人们都把眼睛盯在名演员身上,其实越有名的演员越不走穴,要说走的话也是‘官穴’,现在各省市都搞这个节那个节的,叫做经济搭台,文艺唱戏,我们人还未到,税务局的人就已经等到那了。都是源泉扣缴的办法,税是不敢漏的。我从1987年开始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就感觉交税的手续很麻烦,有时交一次税很长时间,真是交的头昏眼花的(众人笑起来)。我每月200多块工资,还得养一个小孩,家里来了客人总得几十元招待,每月四、五次的话,我完蛋了(众人笑)。所以,不走穴也是不行。”

“要说收入有时乐手的收入比演员的多,纳税检查得从根儿上查。有一次我们去武汉一个大企业去演出,吃的非常不好,我们一问才知这个企业的工会是几个人承包的,给我们花费的少点,他们就能多赚点,要查得从这查起了,那些有钱的个体户多的是,据说都有亿万富翁了,他们查到了吗?”

“那你提提有什么好办法?”海淀税务分局副局长马义民插话道。

“我提不出来。”郁均剑指着个税征管办法笑道。“这个办法已经提的很详细了,很严密,我要再能想出来,我就当税务局长了。”众人笑起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秦佑国教授说:“有些学术性书稿费那是我们学院老先生们几年甚至一辈子的的心血,如果按平均计算的话,这点儿收入不会超过起征点,但支付是一次性的,征收也是一次性的,这就有点不合理了。有些老教授的月收入偶尔超了,他心里想得很多,不愿让别人来代交,又没有哪个教授有秘书什么的能代办。其实老先生们怕的不是交税而是‘不公’。”接着秦佑国教授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学院有个老先生有一次月收入超了,心里特别不实,就到税务局来申报,虽然最后的税款只有几块钱,但他了解到学院就他一个人来申报纳税了,于是这位老先生想:清华

建筑学院这么多人，只有我一个够纳税的标准吗？”

教授的话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不怕交税而怕“不公”，道出的是另外一种心态。不幸的是“不公”确实存在着。1992年6月26日《南方周末》以《骇人听闻的歌星出场费》为题披露了当今最走红的部分歌星的出场价，看后令人咋舌。韦唯：5000~7000元，毛阿敏：5000~6000元，杭天琪：5000~6000元，刘欢：5000元，李玲玉：5000元，张行：4000~5000元，田震：4000~5000元，孙国庆：3000~4000元，范琳琳：3000~4000元，解晓东：3000~3500元，蔡国庆：3000~3500元。实际数字据说还不止这些。

歌星们每一场演出的收入差不多是普通中国人一年的收入。文章以韦唯为例，以每年平均演出100场的话，一场6000元，那么一年的收入是60万元，两年就是120万。而这些收入必须是税后款。这是当歌星们为税收问题而感到烦恼后的决定，即出场费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均由主办单位负责交纳，当他们收到出场费时必须同时收到税单。这样算起来的话，在韦唯得到6000元的背后，主办单位实际支付的演出费是14150元。我想任何一位教授拿自己的收入和这些歌星的出场费比一比都会让他们惊讶得伸出舌头。即使某一学科的带头人抑或著名的科学家也不能望歌星项背。

不同的纳税心态因纳税人的素质不同而不同，因此，纳税心态是一个国家文化、教育、经济发展程度的缩影，是现代文明人的标志之一。

不过，也有另一种值得夸赞的心态即：交了税心里踏实，不能因小节而失大节。毕竟有一些优秀的人能够超越所谓的“普通人”而成为明星，这不仅是出于对税收的深刻理解和他们具备与时代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公民素质。

1991年1月份的一天上午，天上飘着雪花，北京西郊的翠微路税务所里走进来一位满身雪装的人，他用熟悉的声音招呼专管员张书明：“小张，我来交税。”听其音便知其人，他就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配音演员——李扬。李扬是来将他主持的十场晚会的收入主动申报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的。在交完了4630元的税款后，闲谈中得知晚会有些支出是李扬自己担负的，专管员要把这些支出扣除。李扬说：这样的收入全额纳税是应该的，多交点无所谓，但不能亏了国家的。“唐老鸭”交税因此传为美谈。

### 税收刚刚走进古老的山村

绵延起伏的大巴山脉象一支巨大的臂膀挽住川、鄂、陕、甘等省。在湖北大巴山南麓的鄂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的板桥镇，就坐落在这支巨大臂弯里的一个大山顶上。就是这样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混沌未开的小地方，却盛产出党参、杜仲、厚朴等十多种名贵的药材。这里出产的党参被称为“板党”，它以其品质优良而驰名中外。小镇上的人家几乎个个都是万元户。甚至十万元户也能张三李四地数出一大串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强烈冲击着这块封闭的土地，也撞击着人们古老的观念。

1989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关于开展个体业产税收秩序整顿的通告》通过小镇的高音喇叭播出后，他们的观念又一次受到了强烈冲击。他们觉得，税收距他们是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但又来的这么突然，这么强烈。

西关村的村长程才在全村人的眼里可是个大好人，村民们都觉得自己的村长有路子，见多识广，又不黑心吃独食，还热心帮老百姓的忙。从1987年开始，他集中村民们栽的药材到镇上或山外去卖，然后逐户算帐结钱。1989年10月，当税务人员进村后，他心里觉得特别踏实，根本没把什么《通告》放在心上，他想：“查谁也查不到我头上，即使查到了，凭着和区委、区公所领导的关系也会逢凶化吉，平安无事。”所以，程村长照样收购药材，照样到山外去卖。可是，没过多久，他就觉得不对劲了。几个戴蓝色大沿帽的税务干部先是检查了几户村民的销售情况，没过几天便走进了村长程才的家。

“我们来了解一下您的药材收购和销售情况。”寒暄之后，几位税务干部客气地说。

“我是帮村里的乡里乡亲的忙，给他们服务的，没赚钱。我自己种的那点药材跟乡亲们的一样。我是痛快人，这样吧？”程才一拍胸脯，“他们交多少钱我就交多少，绝不少一个子儿。”他说的很大气。

第一次和程村长打交道，税务人员没能有太多的收获。他们逐户核对查访，开始从外围做工作。几天的时间，区里的领导打来一个个说情的电话，捎来一张张条子，请求通融通融，村里派人送来一张百十来户村民摁满手印的证明。税务检查人员面对这八面来风只是轻轻的一笑，他们没有放过任何一笔经营收入而是查得更仔细，更深入了。

这一天，税务官们又一次走进程村长的家，这次他们来得胸有成竹，因为他们发现程才付给农户的钱只是销售额的一部分，这是借帮助农民推销之名，行个人经营之实。程才从1987年10月到1988年10月间，贩卖药材得款22万多元，偷漏税款1.5万多元。

程才面对税务人员一句句有力的提问和一大匪票

据的提示,终于没能再鼓起勇气说出什么别的来,而只是低下头不断地吸着烟。他想:“我平时总跟别人说‘要钱不要名是小人,要名不要钱是笨蛋,名利双收才是君子’,可今天怎么就不灵了呢?”

无独有偶,板桥镇的一位姓李领导干部也对倒卖药材入了迷,通过关系低价购进杜仲,然后又转手加价倒卖出去,非法获利近万元。然后又在发票上做假,偷漏税款。税务干部通过检查后找到了这位干部。“我是镇上的领导,贩卖药材本身就是违反了规定,又偷税,是错上加错,招认了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可不这么干,眼看着周围的人都富起来了,心又有不甘。”事后,李某这样反思自己。

俗话说怕什么就来什么。李某被补了税,罚了款,又撤了职。

一石激起千层浪,小小的板桥镇上四个村被税法和税务人员“搅”得沸沸扬扬,小镇的人们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了税收的存在,也是在商品经济观念已深入到他们心底之后,原来的固有观念所受到的第二次冲击。

短短的四个月时间,有230多个药材商被查、补税40多万元。在村民们受到震动的同时,税务干部也有一个惊奇的发现,所有商贩中竟无一人进行过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此前,更没有纳过一分钱的税款。在这些古朴的村民头脑里,竟没有划过一丝税收的念头,因为他们对税收还一无所知。

### 首都街头的闹剧

如果说大巴山的板桥镇太封闭了,太落伍了,太微不足道了,那么,北京又如何呢!

1992年4月至6月,北京就出了9起暴力抗税,围攻税务执法人员的恶性案件。

1992年5月22日,北京街头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围攻、群殴税务人员的案件。

这一天,北京市税务局海淀区分局组织了上街稽查自行车完税情况的活动。下午一上班,第二稽查队的14名队员顶着烈日,配带标志,着装上岗,来到阜成路北京商学院西侧100米处的路口两侧。对非机动车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查补了税款3600多元。这时,从路北的大地公司门口走过来一个满嘴酒气、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子,看到税务人员在检查过往自行车,走上来便对稽查队员挑衅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收钱?人家的税牌丢了你们保护不保护?……”在他的煽动下,一些受到稽查准备补税的群众,把已经掏出来的税款又收了回去,有的偷偷溜走,有的拒不依法交税,正常的稽查活动受阻。见此情景,



税收从娃娃抓起。瞧他们学得多么专心。

副队长莫瑞走过来劝其离开,他指着大地公司说:“我不走,我是这里的。”

“请你离开,我们是在执行公务。”

“你是干什么的?你把证件拿出来我看看。”

“我们没查你的自行车,你没这个权力。”

双方唇枪舌剑,争执起来。听到争吵声,大地公司里冲出十多个人来,将莫瑞等人团团围住。中年人见来了帮手顿时嚣张起来,叫道:“敢跟老子叫板,我叫刑警队的人都把你们抓起来。”说着冲上来挥拳便打。另几个人也一拥而上,大打出手。此时,在马路另一侧的队长王敬明看到这一情景和其他同志马上跑过来,进行劝阻。就在这时,一辆急速驶来的面包车在人群边上嘎然而停住,车上跳下十几个人来,也都满嘴酒气,不由分说又将税务干部团团围住。14名稽查队员在这先后30多个人的围攻下,装有税款的袋子被撕破,肩章、胸牌被拽得七零八落,不知去向。王队长高声喝止,又招来围攻殴打。四位女队员也未能幸免,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女同志下腹被打,疼痛难忍,瘫坐地上。有的人边打边叫:“不就是税务局的吗,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不怕!”一位大地公司的小头目叫道:“敢打我大地公司请来的客人,胆子也忒大了。”原来那个中年人是某乡的武装部副部长王某,面包车里的人是公司请来的经委的人。

在近一个小时的围攻过程中聚集了 200 多围观群众，道路被堵，影响极坏。散落一地的税款只找回 2800 多元，849.70 元的税款在混乱中丢失了。

### 税收，找找“大款”也找找“捡破烂”的

没有人知道高某到底有多少钱，和他熟悉的人看见的是他的四辆私人汽车到处飞奔，一辆“夏利”、一辆“拉达”、一辆“长安”，还有一辆双排座汽车。另外用 3 万块钱装修了住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中国我称有钱的人”。高某先是承包了北京军区的一家“战友汽车修理厂”，因为“太黑”而与厂长闹翻，提前终止了协议，带着 20 多万元转走了。过了一段时间，高某又到了一家中日合资的某汽车油漆有限公司，做起了整车贸易。当北京市税务局海淀区分局万寿路税务所所长赵志强和他的同志走进这家公司之后，有人指着院子里停放的两辆北京 212 吉普介绍说，这就是高某的“利润车”。当听清了几位税务干部的来意后，高某的脸上片刻显示出的表情是复杂的。高某良好的口才使得几位前去调查的税务人员相当受感动，怜悯之心油然而生，以至于令几位税务干部都怀疑他们刚刚有幸认识的这位“大款”是否像一封封举报信中所说的那么“黑”。第一次接触，高某给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赵志强所长却感到了事情绝不简单。经过调查，高某从承包战友汽车修理厂开始到 1991 年 3 月间应该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 15 万多元。当冰冷如铁的数字摆在面前时，高某满脸的惊诧：“我说过，是我签字领的钱，我就承认，可确实没拿这么多，赵所长，我说的都是真话，你为什么相信别人不相信我呢？！相信我一次吧！”

“赵所长，你会开车吗？你会开就把这车开走，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几个月的调查期间，据说这位高君花了 3 万块钱找“托儿”，也确实有些人对这个案子表现过关心，但到 1991 年 4 月份，这笔税款还是最后入库了。事情发展过程中，这位大款给赵志强所长来了一封信说：“您也知道，我是不会轻易求人的，这次我使尽全身解数，仍不解决问题。我太累了……”。

这位大款此后又从这家合资公司“跳槽”了，最后一去不返，杳如黄鹤了。有传闻说他已取得南美某国家的“绿卡”，获得了双重国籍，不久要以外籍华人的身份在华投资了。

为钱所累的何止高某一个人呢？

晚上 9 时 30 分，路灯下仍有行色匆匆的赶路人。此时，王宝森在审讯室里走来走去，瘦削的脸上一道道皱纹纵横交错，看上去比 40 多岁的实际年龄苍老许

多。地上扔满了烟头，看得出，他正在焦虑不安地思考着什么。听见有脚步声走近，他大叫起来：“为什么把我关起来？放我出去，我要吃饭。”这时，专案人员走进来，喝住他的叫喊，开始对王宝森进行询问。

“你的发票怎么来的？”

“在藁城税务局买的。”

“跟王东辉什么关系？”

“我们是合伙经营。”

“缴过税吗？”

“税由王东辉缴，缴完我再给他钱。”

个体执照是王东辉的，怎么是合伙经营呢？既然王东辉与王宝森是各干各的，为什么王东辉要冒风险借给王宝森执照还替他缴税呢？

王宝森所说的经营额和发票来源是否属实也值得怀疑。在另一间审讯室里，王东辉坐在靠窗的凳子上，脸上不时显出怨恨和愤怒之色，心里也不住地翻腾：没想到他竟把我弄到这来！

1989 年 11 月中旬，一年一度的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正在进行。海淀区税务局海淀第二税务所的干部们忙得不可开交。一天早晨，所长刚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起来。

“喂，所长在吗？”

“我就是。”

“我是乡政府，一会儿乡审计科在这开会，你来听吧。”

当所长风风火火地赶到会场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内容是通报海淀造纸厂厂长贪污受贿和给收废纸的个体户回扣的问题。所长心想，自己所里的管户中出有两个收废纸的个体户，他们会不会也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呢？

他带着这个问号回到所里，把疑问告诉了大家，可大伙却不以为然。

“收破烂的能有几个钱？杨文亮收废纸也就半年多，再说他已经主动把定额从 100 块调到了 200 块。”

“大杨挺老实的，他家房子破着哪！瞧他穿得破破烂烂，背着破军用挎包，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要饭的呐。”

“除了大杨就是王桂芳了，她生意还不如大杨红火。”

听完大家的议论，所长还是嘱咐管个体户的两位专管员去查查杨文亮。

专管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杨文亮的废纸收购“站”去察看情况。只见杨文亮正在指手划脚地招呼人往卡

车上装废纸箱。他穿着一身蓝布工作服，上面落满一层尘土，用手一拍就冒起一股黄烟。

“你这纸多少钱收的？”一位专管员上前问道。

“两毛钱一公斤。”

“一天收多少呀？”

“没多少，好几天才送一车去造纸厂。”

“那你多少钱卖给造纸厂？”

“两毛二，赚不了几个钱。”

“杨文亮，你该调定额了，每月交 500 怎么样？”

这时另一位专管员试探地问了一句。

“别介，我真没钱，不信你看看我那房子，屋里就更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了。”这是杨文亮的拿手戏，动不动就拿他的房子和家当说事，然后进价、卖价再给你算一遍，追问急了还会把存折打开给你看看，一脸秀才见着兵的神色。

事情就这样搁浅了。

1989 年入冬的第一场雪飘飘扬扬地落满京城。晚上，街灯的光芒照得积雪闪闪发亮。

海淀乡审计科的一位同志到所长家作客，闲谈中所长得到了一个线索：杨文亮每天都到海淀造纸厂卖纸，收入颇为可观，保守的算每月流水也得 50000 多元。

一连几天，两位专管员把造纸厂收废纸的发票查了个遍，一笔一笔地登记下来。

杨文亮每天用加长 130 卡车往造纸厂运废纸，平均每天卖 6~8 吨，每公斤卖 0.24 元。从他干这行开始，总营业额高达 40 万元以上，该补缴各种税款 40400 元。

通过对杨文亮的检查，还得到了另一个收获，又查出王桂芳漏税 9300 元。

杨文亮被叫到了税务所，这回他的拿手戏就不灵了。他望着桌上抄录的发票，一支接一支地抽闷烟，嘴里不时地嘟囔着：“我没钱，没钱……”只是声音越来越小。

杨文亮从税务所回去之后，为这个“破烂王”说情的人却接踵而来，有政府机关的，有当地权力部门的，还真不少。一位同所长一块长大的朋友对他说：“这全在你了，能免就免了吧，免不了就给减点。”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叠“大团结”塞在所长的手里：“大杨不好来找你，这是他的一点小意思，你就收下吧。留着给孩子买点东西。”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个接一个的说情者悻悻而去。

在寒流后的一个晴日，40400 元和 9300 元税款分别入库了。

在笔者的案头还放着一份相似内容的材料，岳阳市郊区某个体户从事一年的废纸收购、转卖经营，漏税高达 11960 元。

税收！无处不令我们惊奇，无时不让我们有新发现。

## 走向审判台

地处京津走廊——河北省廊坊地区的香河县以生产优质家俱而闻名。这几年，香河的“大漆”家俱、楠木家俱等已打进北京、天津等市场。在香河县城乡活跃着一支生产、销售家俱的个体户队伍。1991 年 11 月 13 日，恰逢农历十月初八，是邻县的一个大集，在离县城不远的 S 庄农民李真和李川兄弟二人驾驶着一辆小型货车进入集市，高声兜售起他们的家俱。

时至中午，人渐渐稀了，两套家俱卖完了，兄弟二人收拾东西准备返回。这时，市场税收专管员陈永生出现在面前。

“哥俩儿生意不错，卖完了？”陈永生笑着打招呼。

“马马虎虎”。李真、李川二人嘴上应着，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躲过税务检查。

“交税了吗？”

“税？交完了！交完了！”哥哥李真连声说着，向弟弟李川使了个眼色。李川收拾完东西发动了车子。

“那你把税票拿出来我看看”。

撒谎的李真怎么能拿得出税票呢？他突然撒腿跑几步翻进车厢，高喊，“开车！”专管员对这突然的变故，先是一愣，随即猛追上去，趁车速不太快扒住车厢，用力翻了进去，大声叫道：“快停车！”然而利令智昏的李氏兄弟不仅没有停车，反而加大油门越开越快，汽车不一会儿就开出了集镇，驶上了乡间公路。

就在专管员陈永生在车上大叫停车的时候，惊动了在不远处收税的另一专管员尹一兵，他感到事态严重，为陈永生捏一把汗。但眼看着车开跑了，又追不上，他用心记下车号，跨上自行车直奔县税务治安派出所报告了领导。听了汇报，局里马上布置追击和堵截。所长拿起电话要通了各税务检查站。

一张反抗税、逃税的大网迅速张开了。

这时，在通往香河县的一条乡间公路上，李氏兄弟不顾陈永生的警告，一边快速驾车逃跑、一边恶狠狠地说：“再收税，我整死你。”驾车的李川对李真大声喊叫：“揍他，把他推下去。”五大三粗的李真在弟弟的唆使下挥拳打来。陈永生也豪不示弱，与李真在车厢里扭打起

来。由于陈永生身小力弱，猛的被李真推下车去。小陈脸上、身上多处软组织受伤，左臂骨折，当即昏倒在路旁。

正当李氏兄弟以为摆脱了税务人员的纠缠，数着刚刚从集市上赚来的钱，得意洋洋地往回赶，快进香河县界时，检查站前的公路上，一辆闪着警灯的汽车堵住了去路，几名税务干部和公安干警横眉立目地站在路上。

李氏兄弟被押回县城，依法拘留，经进一步调查取证，以抗税罪被依法正式逮捕，提起了公诉。

沙窝地区的居民原本都是些农民，由于北京市政工程建设征地，这里早已没有了农田，农民们也都变成了城市居民户口，有一些搬走的住户迁到新居去了，而大部分仍然住在老地方。这几年，外地的个体户、生意人长期在北京搞经营做买卖，便在这里租住民房，成了长期落脚之地。这样一来，房东收取租金，外地人比住饭店要省钱多了。经营也方便、隐蔽。所以，双方各得其所，乐于如此。仅在沙窝、吴家场、单坊店等地，单单浙江永嘉的个体户就有一千多人。他们有卖水暖器材的，有做衣服的，有炸油条搞饮食的。五花八门。可这些人没有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都是“黑户”。

卢菊是个30多岁的主妇，她个头不高，圆圆的脸，齐耳短发，颇有几分姿色。1989年她把两间多余的房子租给了永嘉做衣服的个体户沈卫国。沈卫国做衣服还倒腾布匹，这两年大把大把的钞票赚了不少。

1991年，税务专管员到卢菊的家中核定调查他们的纳税定额，同时让沈卫国补齐手续补交临商税款。卢菊说：“他是我表弟，是到北京来看我的，我没出租房屋，你们找错门儿了。”

两人一唱一和，把专管员拒之门外。

9月4日，税务所在调查后确认卢沈二人并非亲属关系，而是各自进行经营活动，两年来一直偷税。于是，向卢沈二人催缴税款。但二人置之不理、拒不交税。第二天再去时，卢菊、沈卫国干脆锁了房门，二人不知躲到哪去了。

9月9日，税务所在催缴无效的情况下扣留了沈卫国的缝纫工具和部分布匹，并对卢菊发出了罚款通知。恼羞成怒的卢菊破口大骂：“连口饭都不给吃，社会主义优越性在哪？”并有声有色地散布流言说税务干部到她家中来时偷了她家的钱和一套金饰物，还想对她耍流氓，调戏她。沈卫国也纠集起几个伙计和同乡准备闹事。

在发出罚款通知后的第三天，卢菊来到税务所，要求处理到她家去的专管员，并威胁说如果不交出“小偷”和“流氓犯”就去抄专管员的家。这时，早已等候在

门外的沈卫国带着十余个人，手持木棍高喊：“对，抄他的家。”一时召来百余群众的围观。

这起围攻税务所的案件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他们接到所长的报告后，派出治安联防队员驱散了沈卫国等人。之后立即成立了由检察院、公安局、税务局三方组成的调查组，对案件的前前后后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真相。专管员和税务所的行为完全是依法行事，而沈卫国、卢菊的行为构成了抗税罪，卢菊散布的谎言对专管员的名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构成了诬陷诽谤罪。检察院对二犯逮捕归案。

提起白沟，河北附近省市的人差不多都很熟悉。白沟这个不起眼儿的小地方如今以全国最大的箱包批发市场和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而闻名全国，这里距华北明珠——白洋淀只有两个小时的汽车路程，到白洋淀的游客们差不多都要顺便到这里逛逛。

几年的时间，这个从开始的几个小商品地摊发展起来的白沟市场出现了一批腰缠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个体户。A村的农民岳金便是其中的一个。

岳金小学没毕业就逃学不上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原来认识的那几个字也差不多忘光了。几年前，他成天游手好闲地东游西逛，爱干个捞鱼摸虾的活。1987年，他凑足了几百块领了个执照，干起了倒腾衣服、鞋帽、日用小百货的营生。几年时间，他在白沟的一个小摊位上做起了大买卖，发了大财。冰箱、彩电、摩托车、录像机、音响等一应俱全，花五万多块钱盖了新房，身上也披金挂银地露起富来。不过，他在纳税方面却吝啬得要命，收他几百块钱的税款象摘他的心肝似的。1989年就因漏税而被税务局列为重点检查户。

在岳金的摊位前，经常看到手持“大哥大”，提着密码箱的大款来光顾，之后是大卡车拉走一车车布匹、衣服和日用小百货，每次成交的金额少则几千元，多则几十万元。1990年初岳金又自己开起了服装加工厂，摊位也雇人来看管，他自己则当起了后台老板。生意越做越大，路子越来越宽，收入也越来越多。他成了白沟市场上的百万富翁。可这些从未向税务局申报过。

岳金为了经营的方便和少交点儿税，便与一些集体单位勾结起来，使用集体单位的名义、票证、合同、帐号甚至公章。把自己的经营披上了集体性质的外衣。而交换的代价是岳金给这集体企业提现金。

俗话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岳金以集体企业名义掩盖真实经营情况，偷漏营业税的事儿被税务机关的检查发现了。查补税款7万多元。税务局顺藤摸瓜，进一步查出岳金以现金方式购销经营不入帐偷税5万多元。岳金补了税、罚了款并被移送检察机关。





## 王莽热衷科学实验

王莽是我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皇帝。他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在元、成两帝时期，王家九人封侯，而王莽因其父早死未封。王莽自幼无权无势，谦让节俭，礼贤下士，很有人缘。他得到伯父大将军王凤、大司马王根的器重，在成帝元年时被封为大司马。哀帝时受打击而隐居。哀帝死，九岁的平帝即位。王莽出山，以大司马领尚书事辅政。王莽很注意自身生活，他的节操处处受到好评。王莽掌权之后，得到多数贵族、官僚、地主和儒生的敬仰，盼望他能够使汉室中兴，人民安居乐业。但他辅政五年便毒死了平帝，立两岁的刘婴为帝，又过了三年，便废掉刘婴自立为帝，改国号“新”。王莽称帝后，屡改币制，徭役繁重，民不聊生。终于

爆发了赤眉、绿林农民起义，新朝被覆，王莽被杀。

无论史学界对王莽褒也好、贬也好，他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爱好科学实验的皇帝，是有根据的。据史书记载，最早支持尸体解剖的就是王莽。在封建社会里，特别是在汉朝儒家独尊的时期，儒家的封建道德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王莽敢于冲破旧的传统观念，支持尸体解剖，是难能可贵的。公元16年（天凤三年），有个叫王孙庆的人被处死，王莽命令宫廷医生对他的尸体进行解剖。这是我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年代最早的尸体解剖，比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以及葬后的维萨里进行尸体解剖研究要早1500年。

王莽还支持过最早的飞行实验。公元18年，匈奴不断侵犯边界。王莽为了阻止匈奴人的南侵，他广招天下有奇能特技的人，研制新式武器，对付匈奴的骑兵。当时，有人献出一种能使人飞起来的方法。献技人说把大鸟的羽毛做成翅膀，安装在人的身上，据他说可以飞行百步之遥。王莽听了觉得有道理，如果这种“飞人”武器能成功，中原战士都安装翅膀，就变成飞行兵，从空中打击匈奴，使匈奴不敢来犯。王莽亲自观看了献技人的飞行表演，飞行不理想，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好。飞行表演虽然失败了，王莽支持科学实验的精神是可贵的，比达·芬奇设计的扑翼机要早十五个世纪。

（石林 翟书惠）

蒙

奸

德

王

皇帝梦的破灭

○李平



抗战之前，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德王想利用日本人的力量搞一个独立王国。傅作义将军看透了日本和德王的勾结阴谋，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战场上给以有力打击，德王的帝国梦彻底破灭。

### ——编者

1935年9月，国民党代表张群和日本代表川樾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谈。会谈内容是“中日共同防共”。蒋介石指示张群“要以十分的诚意和日方对话。”到11月10日，日方代表川樾在记者招待会上称，“中国的妥协案已大致明确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复辟“大元帝国”的计划正在紧张实施。

此时锡盟副盟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与西公旗已故石王之侄、百灵庙大喇嘛巴图巴雅尔及部分蒙古王公在百灵庙召开会议。

德王是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他想凭藉成吉思汗的威名，完成他的帝国梦。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以武力统一蒙古诸部落，被推为大汗。1219年，他的铁骑横扫斡罗思、钦察，踏平花刺子模，版图扩展到中亚和南俄。建立了大元帝国。

150年后，成吉思汗第15代孙顺帝于1368年被朱元璋逼走塞外。此后，外蒙独立，东蒙被日军所得。德王欲抓住蒋介石内忧外患自顾不暇之机，迅速成立‘蒙古地方自治委员会’，为今后重建大元帝国打下基础。

一番讨论后，百灵庙会议终于通过了成立“蒙古地方自治委会”的提案，并向蒋介石发出了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正如德王所言，蒋介石出于无奈，同意了德王的要求。

百灵庙会议结束后，德王与大喇嘛巴图巴雅尔开始了剪除异己的密谋。

德王认为：异己不除，难成大业。

可是，当大喇嘛巴图巴雅尔率保安司令云继先赴西公旗接管政权时，傅作义派兵伏击，巴图巴雅尔当即身亡。

德王感到，单靠保安队是成不了气候的，他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来与傅作义抗衡。

正在德王为寻找军援而烦恼时，日本驻百灵庙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来访。

盛岛角芳把一信件交给德王，内容大意是：大日本帝国关东军东条英机司令官闻悉阁下有振兴蒙古民族



之宏愿，十分钦佩。日满蒙本该一家。东条司令官决定倾力支持德王阁下的计划。这是坂垣征四郎参谋长亲笔写的。

德王读完信件，并没有热烈的反应，只是微笑着说：“百灵鸟的美妙歌声，果然引来了蒙古民族最亲善的使者！”

“德王完全接受信中所谈的一切喽？”

“阁下，最甜的必定是酿得最久的蜜。过些日子，我一定给东条司令官一个满意的答复。”

送走盛岛角芳后，德王在室内不停地踱步。从内心上讲，他对日本人的憎恶，并不亚于对傅作义的愤怒。他十分明白，日本人决不是要真心帮他完成帝国梦。在他帮日本人赶走傅作义之后，一定又会掉转头来对付他德王的。但不接受日本人的帮助，又到哪里去寻找军援呢？

正在此时，保安司令云继先进来报告，达密模苏隆的保安团已接受傅作义的改编。

“傅作义！”保安团是德王唯一的一支武装，它的倒戈无异于釜底抽薪。此刻德王咬牙切齿地冲出王府，飞身上马，向西直奔。

不多时，即见盛岛一行。德王驰到其前，在马上拍胸施礼，然后跳下马道：“盛岛阁下能否再至敝府商谈？”

“不必，”盛岛不下马，口气高傲道，“就在这里吧！”

“我已决定，接受东条司令官的援助。我希望能尽快与东条司令官晤面。”

“好吧，我尽快上报阁下的意思。”盛岛说罢，驱马而去。

德王想起了李守信。

李守信是绥远大地主、大土匪。他曾多次遭傅作义追杀。在无可奈何之中，他曾投奔德王。初次见面，德王对李守信并无好感。李守信生着满脸横肉，态度粗野，即便和德王对话，也脏话连篇。只因李守信手中有几千人马，德王才竭力拉拢，并结为金兰。李守信对德王的恩惠感激不尽，涕泣道：“德王对李某恩德，永世不忘。”

现在，正是利用这个土匪头子的时候了。

李守信果然率部来归。

1935年12月，日本天皇陛下已批准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德王即召来长春商谈。德王将飞赴长春与东条司令官及坂垣参谋长晤谈。使命重大，决定由云继先、李守信同行。德王一行在盛岛角芳陪同下，从包头机场飞往长春。

第二天一早，盛岛便来请德王赴会。德王怕满身匪气的李守信惹出麻烦，只带云继先乘车前往关东军司令部。

车队穿过一队队岗哨，在一幢俄式巨大建筑前停

了下来。盛岛将德王、云继先引入一间密室。和德王会谈的是坂垣参谋长。坂垣很瘦，如果不是拄着一柄军刀，很难相信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坂垣征四郎。

“由于东条司令官要处理太平洋地区的一些事情，他把此次会谈的全权，全部委托给了我。”坂垣单刀直入地说。

“噢，我代表蒙古大草原的健儿，向阁下，及东条司令官表示衷心感谢。”

云继先十分流利地将德王之语翻译成日语。

“为达到日满蒙共同繁荣之目的，东条司令官决定赠给贵方五千枝步枪、五十万元钱。大日本帝国将竭力支持你们组成军政府，并建立强大之军队。”

“啊，这是整个蒙古民族的希望！”德王喜形于色。

“你们组建军队后，关东军将向各连以上建制配备军事顾问，帮助你们训练军队。”

云继先将坂垣语翻给德王听后，云继先用蒙语继续说：“王爷，这个我们无法接受。这样一来，我们的军队实际上只是日本人的一支军队了。”

坂垣原来懂蒙语，他厉声说道：“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满蒙难道不是一家吗？！”

德王马上唯唯称是，“是是，大日本民族就是蒙古民族的希望。我谨代表蒙古民族，完全赞同参谋长阁下的安排。”

####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经紧张的筹备,1936年初,蒙古军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建立蒙古军,德王亲任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下辖九个师、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宪兵队。

德王在盛岛陪同下,率李守信、管家穆克登宝等从王府出来,登上检阅台,踌躇满志地命令:“换帜!”

在乐声中,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缓缓下落,一面绿底三色旗缓缓上升。

“蒙古大草原的雄鹰们,今天,是我们重新振羽的日子。成吉思汗的子民,是不应该蛰居一隅的。我,德穆楚克栋鲁普,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有责任和你一道,维护成吉思汗的威严。因此,我命令,从现在起,改民国纪年为成吉思汗纪年。为了纪念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我们把1206年定为成吉思汗元年,那么,今年,请你们记住:今年,是成吉思汗730年。这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日子!”德王放眼望去,只见灰蒙蒙一片,不禁十分激动,挥着双臂呼喊:“我们蒙古民族再次征服世界的日子,不会遥远了!”

站在德王身后的一些日军顾问听此,不禁大恼。但很快被盛岛角芳制止。

接着,开始检阅部队。膘悍的马队在德王面前一掠而过时,德王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居于德王之侧的李守信更是按捺不住,甩掉军礼服,一跃上马,“唰”地拔出战刀,狂叫一声:“杀他娘呀!”立时,士兵们也随之狂呼:“杀呀!”成千上万的马和士兵,成千上万的军刀和火枪,在雪地里疯狂地奔涌着。所到之处,白的大地,立刻被掩成灰色的一片。

德王望着这山崩地裂的军阵,仿佛看到了当年大元帝国军队攻破燕京的场面。而他,则将作为大元帝国的中兴之主,永载青史。他抑制住了泪水,却没能抑制内心激动的流露,他狂笑了起来。

然而,德王的兴奋马上被一种愤怒替代了。在此之前,他得知日本关东军网罗了一批土匪,在化德成立了“大汉义军。”大汉义军以惯匪王英、雷中田为正副司令,下设五个旅,以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杨守程分别为旅长。声势并不在他之下。

“这分明是要限制我的发展啊!”德王叹道。

然而,比成立大汉义军更令他痛心的变故此时正在百灵庙进行。

1936年2月19日,驻守在百灵庙的云继先正在紧急集合队伍。

云继先望了望灰压压一片的一千多名保安队员们一眼,很久才开口。他有些把握不住。能成功吗?他这样自问。

“弟兄们!”云继先终于开口了,“德王已经成立了蒙古军政府,大家不要以为这是好事。试想,日本人会真的让一个独立于日本的蒙古帝国存在吗?不,当然不!德王为了他个人的野心,不惜把整个内蒙献给日本而背叛祖国,我们能跟着他走吗?能跟着他把自己的民族变成一枝朝着祖国的日本人的枪吗?”

显然,云继先这番话对士兵们来说过于突然。士兵们沉默着。

“我宣布,”云继先接着说,“全体保安队员集体反正,脱离德王的军政府。”

这时,百灵庙稽查处长李凤城率领百余稽查队员闯了进来。李凤城用枪逼着云继先道:“德王待你不薄,你居然要反叛他?”

这时,保安队里又有数十名蒙古族队员站出来,把枪对准云继先。

云继先的警卫队也持枪相对,双方怒目圆睁,一触即发。李凤城用枪戳戳云继先的脊背喝令:“命令他们把枪放下!”

云继先见状,于是对他的警卫队长挥了挥手。他的警卫队员只得缓缓把枪放下。李凤城转过身来,想对保安队员们说什么,忽地,“砰”一声,李凤城中弹倒地。警卫队长干掉李凤城后,即率警卫队员将稽查队员和站出来反对云继先的保安队员团团围住。

云继先命令下了他们的枪后,率部向二份子出发。

这天正下着漫天大雪,路崎雪深。但云继先依然迈着当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养成的习惯,抬头挺胸,阔步而行。

经过一天的跋涉,云继先的保安队和傅作义派来接应的汽车队会合,然后向归绥进发。

云继先一到归绥,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脱离蒙古军政府。次日,云继先被傅作义委任为绥远旗保安总队司令。

曾在太原、忻口、长城等会战中,重创日军的傅作义,于长城会战失败后,就任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总部”驻绥部队归绥指挥所主任。此刻,他正在地图上沉思。

自云继先反正后,百灵庙由德王最精锐的第七师穆克登宝部据守,察北又被“大汉义军”王英部占领,这样,日军对包头、固阳、集守、红格图产生强大辐射。日本人一旦进攻,傅作义部将不得不在内线作战。傅作义正在焦虑之时,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率蒙古军政府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大佐、晋绥线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等来访。

傅作义与坂垣征四郎互相致意后，在会客室分宾主坐下。

坂垣挺了挺瘦削的胸脯，双手拄着军刀道：“傅将军，蒙古军政府首脑德王对贵部的挑衅深为不满。”

“坂垣将军，我想先提个问题。阁下此行，是作为关东军的代表还是作为德王的代表而来？”傅作义说。

“不，傅将军，都不是。我是作为您和德王之间的中间人而来的。”

“坂垣将军，我从来没请您做过中间人。”

坂垣一听，脑际陡然升起一团怒火，他站起来，厉声道：“德王作为蒙古军政府首脑，正式要求傅将军把以百灵庙为中心，阴山以北的广大蒙古地区划归蒙古管辖。”

傅作义也霍地站起。

“坂垣将军，我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地方官员，我只听命于国民政府。”

“但是，绥远历来是蒙古的土地。”

“但是蒙古历来是中国的土地。”

“傅将军如不退出绥远，德王将不惜以武力解决。”

“如果德王来攻，傅某一定与之周旋到底！”

“你们中国军队根本不能与蒙古大军作战。贵国著名将领宋哲元，在王英攻击下，不到一月，就丢失了整个察北。”

“那就领教领教吧！”

会谈无法进行下去，坂垣忽地抽出军刀，双手托在傅作义面前道：“我对所有敢于对抗关东军的人都表示钦佩。请留下作个纪念。”

傅作义接过军刀后，也将一方石砚和一部四书回赠坂垣：“闻悉坂垣将军对中国之仁义颇有研究，特赠为纪念。”

坂垣从傅作义的话外听出了嘲弄，但他没有发怒。军旅生涯，使他更为尊敬硬汉。他接过四书、端砚，率众而去。

坂垣对傅作义的劝退失败。东条司令官决定立即攻击集宁。只要集宁一破，归绥将失去屏障。

1936年11月15日，在“大汉义军”王英的配合下，蒙古军政府副司令李守信驱动近万名日伪军，兵分三路，向红格尔图发起猛烈进攻。

临战，为避日军直接参战嫌疑，坂垣在包头机场登上飞机飞回长春前，对德王说：“这是一次大锤砸鸡蛋的行动，阁下必胜无疑。”德王自得地笑了。

然而，尽管攻守兵力双方实力悬殊达20倍，战况仍没有取得坂垣希望得到的结果。

红格尔图背靠大青山，地势易守难攻，因此，战斗一开始，就十分惨烈。坚持到第三天，守军死伤枕藉，一、二道防线已被分别撕开。

正在这时，傅作义从集宁来增援的骑兵师赶到。唾手可得的红格尔图重又落入傅作义的手中。

红格尔图之战，惊动了南京的蒋介石。

此时的蒋介石，正把全副心神都扑到“剿共”上。他调到陕北用来对付红军的军队已达260个团，总兵力在30万以上。他不想造成两线作战的态势，因此，对日本人的威逼，他的战略思想是“以土地换时间”，也就是说，宁愿给点土地给日本人，也不要造成中日激烈对抗，以便有时间消灭红军。为此，在绥远问题上，他曾一再电令傅作义“以不扩大事端为要。”红格尔图之战，傅显然违背了他这一指令。

而且，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又多次面见蒋介石，要求蒋“承认满洲、内蒙之独立。”蒋介石虽对此要求采取敷衍态度，但也不想在内蒙问题上得罪德国。为此，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召见了一身硝烟味的傅作义。

“宜生（傅作义之字），一个真正优秀的军人，同时应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打红格尔图之战，你算过政治仗吗？”

“报告委座，卑职以为，中日对峙以来，屡战屡败，此战之胜，足以鼓舞全国军民。”傅作义站起来道。

“坐坐，不必拘礼么。”蒋介石竭力装出亲切的样子。实际上，蒋介石心里却在想，怎样使这个在历次对日作战中不肯执行撤退命令的非嫡系猛将，能不折不扣地贯彻自己的战略思想。“你算的政治帐很好，但你算帐时如果能站在世界战略的高度算帐，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是，委座。”

蒋介石很想将自己的思维一一理给傅作义看，但他没有。外敌当前，还忙于打内战，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接受的。蒋介石最后说：“你回绥远后，要立刻收拢部队，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

“是，委座。”

蒋介石深知，傅作义表面答应得好好的，可一旦回去，还不知会捅出什么漏子来。

果如蒋介石所料，傅作义一回到归绥，就组织对百灵庙的攻击。

百灵庙位于归绥西北300余里处，是通向新疆、外蒙的交通要枢。百灵庙一失，德王将失去蒙北5000平方公里土地的控制，因此，百灵庙能否保住，也就意味



何应钦和夫人王文湘

着所谓的“蒙古军政府”能否保住。为此，德王派出穆克登宝的第七师驻守百灵庙。第七师为德王辖地锡盟人组成，称为德王的子弟兵，十分善战。

为保住德王旗帜不倒，坂垣督促“大汉义军”王英率5000人，昼夜兼程，驰援百灵庙。然而，出坂垣意料，王英正想借傅作义之手除掉德王，好让他统治德王地盘，因此，行军缓慢。

11月23日晚，傅军向百灵庙外围阵地发起攻击，经7次冲锋，才占领外围主阵地女儿山。

直到24日晨，百灵庙外围阵地才被傅军全部占领。

经过傅军炮火、坦克的轮流轰击和傅军的轮番冲锋，穆克登宝部伤亡惨重。随队的日本顾问组成督战队，对退逃的士兵一律劈杀，也难以抵挡傅军的攻势，

而王英的援军却遥遥无期。中午时分，傅军攻入百灵庙。穆克登宝弃镇而逃。

百灵庙一战，德王血本全部输光。此时，傅作义又向王英部发起了攻击，王英在数败之后，12月6日，王英所部石玉山旅、金宪章旅在击毙所有日本顾问后，向傅投诚。至此，王英部溃散。

绥远战火越烧越旺，使全国抗日呼声高涨。

12月3日，张学良到蒋介石在西安下榻处华清池涕泣请求援绥，蒋不允。12月7日，张学良再次面请：“学良以丢失东北之罪身，自感无颜以对东北父老。今绥远事起，学良不能坐视。请委座谕准学良率队援绥，与日伪作战。”蒋仍不允。

晚上，蒋介石提笔写下一道手谕，令卫立煌为晋绥宁地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指挥绥东各部队。此令如实施，傅将失去实权。只是此令未及实施，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被擒。

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通电：“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抗战……”

傅作义的强硬立场，使日本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大为震怒，他决定日军直接介入，扶植德王伪蒙政府。12月下旬，东条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要傅作义撤出绥远，开往山西。限24小时内答复。

德王也给傅作义写信：“……敝人决无背叛国家之冀图，无奈受人挟制利用，终致造成恶果，不胜忧虑，诚望……”

傅作义拒绝了德王退兵休战的请求。傅部仍向商都昼夜兼程，步步逼近。

然而，就在德王绝望之际，山西的阎锡山急电傅作义：“商都不属晋绥管辖，与百灵庙原属晋绥不同。我们若攻商都，恐日方有所借口。而蒋委员长暂不能视事，全国步调无法一致，因而会对晋绥不利。”

傅作义只好退兵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绥远在蒋介石眼里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绥远的全面胜利，使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战略的蒋介石，在日本人面前，多了一张王牌。蒋介石借口日本军人卷入德王挑起的绥远，断然中止了张群与川樾的会谈，并一口否认自己执行了数年之久的各项对日屈辱的协定。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傅作义即挥师直捣化德、商都，德王武装全部就歼。至此，德王复辟“大元帝国”的美梦完全破灭。

(责任编辑：刘家驹)

名人与505



著名中国画家，著名气功大师，港台等地舆论界称其为“中国画坛神人”，他是第一个进入西班牙马德里国家艺术馆举行个人画展的中国画家。他的简介被载入《世界当代书画名家大辞典》、《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中国百人名画家小传》等。



○京开

505

神功元气袋

名不虚传

我八岁开始学习绘画、习武并练气功，至今三十多年，几乎一日不敢松懈，被人认为有一点特异功能，但是，我是在极为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时代，常常饿着肚子，走几十里路去写生，向老师求教，有时饿得两眼发花。这几年来，常常揣摩绘画、书法至深夜二三点钟，饮食起居很难正常，久而久之，患了比较严重的胃病，频繁发作，有时痛得难以自持。真如医生难以给自己治病一样，我虽然偶尔急人所急，给人治一点病，但难以治疗自己的胃病。吃过不少治胃病的药，都没有明显见效。在朋友的热情推荐下，我将信将疑地使用了“505”神功元气袋，没有想到，即使象我这种练了几十年气功，被认为有特异功能的人，“505”神功元气袋也能发生神效。使用没有过多久，胃部感到舒服多了，疼痛不再频繁发作，而且明显和缓、转佳，饭量增加，精神也轻松不少，这使我不得不说，“505”神功元气袋名不虚传。无论是气功、良医、特效药，“505”神功元气袋，都能各显神通。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我们国家有才能智慧的人很多，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有很多祖传秘方，“505”神功元气袋的发明人来辉武先生在博采众长，继承民族传统医学的基础上，研制出这种“祛病强身之瑰宝，内病外治之珍品”，可敬可佩。

## 《炎黄春秋》杯有奖征联 评选揭晓

### 特等奖：

####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六合增辉八方奏凯万千铁臂拥清廉民意沸腾。

#### 二、嵌字联

炎黄照人春雨无声滋润嘉禾瑞草；  
黄钟示警秋风有意扫除败叶残花。

#### 三、自撰联

(一)、春兰秋菊因时开放；  
尧年舜日惟政革新。  
(二)、夏鼎殷墟周易秦声甲骨编钟灿若银河群星朝北斗；  
唐诗晋字宋词汉赋鸿文经史浩如烟海全世仰东方

#### 四、生肖联

且喜牛羊满地；  
却愁鸡犬升天。

### 一等奖：

####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两岸同源四疆合璧千秋大业共经营国运昌隆。

#### 二、嵌字联

(一)、炎黄连心三通在望 炎黄捧日四海腾欢  
(二)、春日祈农王驾颂； 秋风辟序汉家声。

#### 三、自撰联

(一)、三中决策千秋计；  
四化滔滔百代春。  
(二)、物候多情先吐瑞；  
阳春有脚早临门。

#### 四、生肖联

金鸡振翅昂首一鸣天下晓；  
玉犬开寅入关独揽地支权。

湖北 文合

台湾 汪化龙



二 等 奖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百族联欢九垓含笑万千气象报维新岁月峥嵘。

二、嵌字联

炎日暑威盖缘春水冷；  
黄花晚节端赖秋霜寒。

三、自撰联

(一)、改革谱新声河清海晏闻韶乐；  
振兴呈特色儒立贪廉颂国风。  
(二)、四书六艺诗词经史辉煌文化五千载；  
二陆三曹韩柳欧苏济济英才亿万人。

四、生肖联

斩长蛇笑沐猴扶弱羊驾灵牛饕鸡迎犬；  
烹豕免除硕鼠驰骏马擒封豕伏虎降龙。

陕西 曾惜晚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万马奋蹄九天追月八千云路任纵横气势昂扬。

二、嵌字联

炎德敷边春绿塞坦荣白草；  
黄钟催景秋红枫叶丽青山。

三、自撰联

(一)、善政拂春风红桃绿柳千里外；  
至公称腊雪白屋朱门一样多。  
(二)、改革雄风奋挽狂澜水击三千里；  
运筹大略喜成伟业鹏飞十五年。

四、生肖联

留迹迎春鸡去霜桥铺竹叶；  
盛情添瑞犬来雪地落梅花。

湖北 张德荫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百鸟朝阳九天焕彩万千龙裔竞腾飞生气昂扬。

二、嵌字联

炎微温馨北国春色拂上下；

黄河起凤南疆秋色秀东西。

三、自撰联

(一)、百业欣荣凭善策；  
九州鼎盛赖贤才。  
(二)、改革舞改革歌改革激流通四海四海皆春春不老；  
丰收诗丰收画丰收喜讯达九州九州同乐乐无穷。

四、生肖联

金鸡闪金辉金瓯永固扬清尚；  
义犬增义气义士常歌激浊声。

湖南 詹白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四海归心八荒瞩目万千赤子竞腾飞气象峥嵘。

二、嵌字联

域中四化发奇花春风得意；  
旗个五星扬特色秋月增辉。

三、自撰联

文化肇中原五千年薪火相传光前裕后；  
风流看今日九万里鲲鹏正举地惊天。

四、生肖联

国富民殷畜圈家家鸡犬豕；  
天高云淡草原处处马牛羊。

河南 王幼甫

一、征下联

三江呈瑞五岳献珍十亿神州兴改革春潮浩荡；  
六合增辉九天流彩万千玉树透玲珑腊雪纷飞。

二、嵌字联

祭炎帝谒黄陵四海龙的传人同来问祖寻宗承前启后；  
弄春潮逐秋水一代天之骄子共揽斜风细雨雨鼓棹扬帆。

三、自撰联

万里同归南国惊雷苏大地；  
百花齐放东风时雨笑群山。

四、生肖联

日月居诸酉年大展鸿图喜看金鸡招凤至；  
干支轮转戌岁又交新运迎来神犬助鹰扬。

江苏 闵绍景

三 等 奖 获 奖 名 单

北京市：戴月 徐兰如 谢超远 田子钦 李梦白 杨法陶 方萍 李玉方

河北省：崔从里 周澄 李敬 齐希 尚德洲 沈雨高 马西堂 宣全德 刘明魁 曹永生 李瑞君

黑龙江省：董鸿印 赵世昌 秦云岚 杜承林 林涛

贵州省：李泽远 范灏 夏子鸣 杨秀锦 余运文 卢振开 金志湘 潭德明 王常茂 江少良 胥思林 黄润珊

胡格非

乌鲁木齐市：王洪甲

吉林省:丁绳南 孙伟华 吕凌 刘福臣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许永俊 李光旦

辽宁:王伊宙 王世君 程之远 培英 国佰成

江苏:李永性 楚声 李中柱 曹颂康 陈和平孙万义 张耕余 陈春庆 陈和平 官格龄 孙默飞 郭怡风 关岳华

吴以春 赵开亚 王爽襄 张玉安 倪佰荣 张秋苹 严应福 曹仲刚 王桂如 囊天语 张元生

山西:王增盛 肖佑实 陈青林 张烁光 朱少云 薛庆隆 杨金烈 郝红文 朱佐宗

江西:郑瑞祯 文先姜 欧阳声思 王启栋 廖龙森 肖忠邦 徐建中 彭定宇 徐建中 丁煌 谢树明 吴拱贵

萧志邦 郑诚 孙祥文 严小琴 谢泳 刘黎权 董孝友 刘冯仙 王建华 许铭生 李金文

安徽:江德成 刘盘 王烈 朱庆庚 钱久成 范俊武 吕贤基 石仁焯 孙长新 鲍家骅 马启章 任明礼 程文中

刘竹亭 岳步台 王德文 王仲平 周游国 王秀翰 王贺臣 鲍天德

云南:严振发 刘定唐 程彪霜 霜重 叶维新 杨学辉 赵鹤啣 邹廷昌 魏所玉 杨俊昌

山东:杨志楨 贺宗仪 李保之 刘忠龙 俊君

广东:梁桥 毛文椅 王志尹 刘明秋 林怀仗 杨英华 黄少鹏 童双清 李世亮 黄桂华 贺建农 杜福卷 许其衡

南京:毛银河 林喜序

浙江:单桂廉 项芹 王念时 钟官荣 王望芹 倪孜耕 陈作英 许亦光 倪耕余 胡芝芳 翟广明

福建:陈营 骆炳南 王磊之 黄如采 张子其 叶连宗 仲达 谢英才 李志明 张诚 罗幼林 黄宝奎 黄赛培

何建胆 潘震欧 黄寿培 李良银

河南:李实 李兴国 李思敏 段曙光 陈税武 李鸿猷 杨文焕 万主德 苏刚达 李兴国 马培芝 王仲勋 刘锡辰

新疆:王启贵

广州:廖柏聘

内蒙古:张元税 赵燕君 于风山 孙庆连 史继料 玖政

陕西:倪长贵 王金辟

上海:郭怡风

昆明市:郭和平

锦州:李子新

极阴县:周知行

广西:文登壁 胡守恒 樊宁光 唐福松 黄向东 王英伦 林秀峰 邓小龙 李运熙 周贤鉴 李治郁 彭宗智 农朝光

黄作佳 钟清良 许德安 潘永宣 朱迎贵 李治恺 沈勇 罗传宗

四川:尹文元 王映维 石德奎 曾俊如 钟书精 熊炬 侯泽远 黄世沛 蔡宏道 罗永松 谢若刚 罗永嵩 黄世雄

徐顽碣 曾昭裕 何杰之 刘可玉 马俊明 黄朝礼 罗怀义

山东:李有枫 鲍大雪 张允德 焦丙海 李保之 刘忠龙 徐子敬 王佩行 申茂湘 孙澍之 武宝林

湖北省:李情露 王磊之 覃胜武 罗万和 魏元俊 刘凰来 张汉宾 陈星拱 李新勒 邹圣兵 朱秋先 曹大举

萧同壁 禾利 蔡梦璋 杨复初 何士斌 金序前 朱秋先 李新勤 朱武 刘士中 李期勤 唐伯仪

胡承海王森旭 张弟烁 严新道 吕申明 程世化 廖煜明 秦志顺 邓启湖 魏和平 石楚璞 陈迪

范升 严镇中张仙 郭劲松 涂沉毅 谢长粹 陆爱苹 付俊英 罗平蔡 秦文韬 郭啸宗 侯义美

袁光宇 李志国 王珊

甘肃省:马扶汉 安其超 周怀仁

湖南:邓锦心 柳子异 张厚志 陈常兴 周世重 姚淑春 欧阳德夫 周道仑 边雪葵 胡小春 谭金刚 王尹思

张厚志 龚济财 刘正洪 邓成根 侯慧贞 张旭阳 罗学景 夏林声 刘谷良 蒋安民 彭承悦 张吉斌

周德安 周敦强 胡静怡 熊莺 朱义轩 范寿宣 兰序长 张思兹 陈明 梁世兆 邱永邦 胡静邦 文钧生

邱水邦 陈新国 姜长荣 曹向群 苗其华 廖建阳 李春华 李枝英 简子安 彭墨光

《炎黄春秋》杯征联比赛,严格按照内容健康,形式完美(对仗工整,音韵合辙,意境深远,语言优美,气势贯通)的原则,经过认真挑选,反复比较,凡四联均为精品者,可入特等、一等,特等则要求更胜一筹;四联中若有三联为上乘之作,一联稍次,可入二等;四联中有两联或一联较好,可入三等。本届征联比赛,承蒙各届楹联爱好者的的大力支持,参赛者近1500余人,分布全国31个省市,征得楹联五千多幅,可谓人数众多,参赛面广,在此特向广大楹联爱好者表示诚挚的谢意。1994年元月10日,评选工作全部结束。

本刊如有缺欠、倒装问题,可直接向印刷厂退换

《炎黄春秋》杂志社 1994年1月12日

# 炎黄春秋



与领袖和革命家的第二次握手

蒋介石八大金刚抗战功罪录

将军作战在狱中

蒙奸德王皇帝梦的破灭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